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人民公仆——周恩来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言

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十多年了，但他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起周总理是如何带领大家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的；每当大家谈起党的优良作风被少数人破坏，党的形象受到损害的时候，大家又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周总理，他那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许多感人言行。每当想起周总理的时候，我总是要翻阅一下十多年来，书报杂志上发表的回忆周总理的文章。这些文章记述了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以及他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生动事例，使我从中受到很大教育。当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大力加强党的建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宏伟目标而奋斗的时候，我将周总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的光辉事迹集录汇编，分类整理出来，奉献给广大读者。我们的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如果都以周总理为榜样鞭策自己，这对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例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等。毛主席在 1945 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于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作风做了精辟的总结和高度的概括。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主席还指出，“三大作风”，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也是由于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决定的。

周恩来同志在树立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作风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坚持了党的优良作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担任共和国总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坚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是我们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他身上体现得最完整、最突出，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他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忘我精神，他那种理论联系实际，不说空话，说到做到，襟怀坦白的品德，他那种平易近人，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典范，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周恩来总理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他在 1954 年就指出：我们要“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19 页，以下几引此书，只注页码）在他担任总理职务期间，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哪里人民遇到困难，诸如发生旱涝、风雪、地震等重大灾害或事故，我们的总理总是亲临现场，临阵指挥，带领人民去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他经常连续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为了向人民负责，无论对大小事情，都做到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只讲奉献，从不求索取。

周恩来总理在一生工作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处理任何问题，都讲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与说假话。 1962 年，

总理说：“要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调查”，但是“要调查研究得好，确实是不易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浮夸风气，不易一下子改变过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就要真正联系群众。”（下卷第 350、351 页）所以，总理经常深入到最基层，深入到群众中去，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从而实事求是地决定政策，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周恩来总理的一生是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一生。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提出：“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上卷第 125 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经常批评那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这种官僚主义是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必须警惕的。”（下卷第 418 页）他还说：“我们犯官僚主义，一方百由于自己脱离群众忙于事务，另一方面是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希望领导同志要自觉，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

周总理在他的活动中时时刻刻实践着他的讲话。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大地。每到一地，或在机关、学校，或在农村、工厂，或在休息的时候，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同广大群众接触。在于部、工人、农民、医生、学生、文艺界、教育界、科技界、体育界等各界人士中，都有他的朋友和熟人。

他时时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千方百计地为群众排忧解难。他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与群众同甘共苦，他把自己完全置身于群众之中，到工厂、机关、学校去，同群众一起排队吃饭。同志们出于安全和爱护，总想对总理加以照顾，而总理却总是要和群众一样。

周恩来总理十分善于同群众商量，博采众议，倾听不同意见。他说：“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又说：“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下卷第 323、 325 页）所以，总理遇事总是耐心和人家商量，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在国务院会议上，总理总是启发每个人发言，倾听他们的意见。早在五十年代初期，他说：“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要开一次呢？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接着又说：“毛泽东同志常讲‘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正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下卷第 103 页）

周恩来总理的一生是艰苦朴素的一生。他经常教育大家，特别是领导同志，要发扬延安精神，不忘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他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下卷第 427 页）总理是这样教育大家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本色。

周恩来总理坚持反对特殊化。“永远不与群众隔离”，“要平等待人”，“不搞特殊”，是总理的一贯思想。他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上至知名人士，下至服务人员，总理都能想到他们的冷暖、疾苦。他日理万机，雨夜

却能想到给站岗战士送雨衣；他乘火车夜间到达目的地，宁可自己在火车上呆一夜，也不去惊动当地的同志。

他是一国总理，但从不自视特殊，始终平等待人。他去理发、照相、买饭时，依次排队。他乘汽车与农民相遇时先让农民走。最为可贵的是，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还绝对不许自己的亲属有丝毫特殊。总理讲到如何正确处理同亲属关系时说：“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力量。”在讲到干部如何对待自己的子女时，他说：“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四百零七个人（注：指当时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国务院七十三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应该做出一点表率。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下卷第426页）解放后，总理就给自己的亲属定出了“家规”：不准专程来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机关招待所，在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拿钱买，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不许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等。总理这样讲了，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

周恩来总理一生严以律己、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勇于自我批评。他在《我的修养要则》中说：“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上卷第125页）在《过好五关》中，他说：“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我希望大家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要认识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下卷第414—425页）在总理的文章中和各种场合的讲话中，都可以经常看到或听到他拿自己的亲身经历作自我批评、严于解剖自己的生动事例。南昌起义本来是我党历史上的光辉一页，总理起了重大作用，但每当谈到南昌起义时，他总是讲他的缺点和错误；谈到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过高时，他也把责任归于自己，主动承担责任。同志们建议总理写书时，他说，如果写书，我要写自己的错误。

总理一生为人民鞠躬尽瘁，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总是那样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不许把他的故居和住过的地方作纪念馆。周总理不许演他，不同意宣传他，平时的活动也不让突出他。

本书集录的只是回忆周总理文章中有关周恩来担任总理以后的优良作风方面的部分事迹。编辑过程中有些地方增补一些未上书的事例。可以肯定他说，书报杂志上已经发表出来的也只是周总理优良作风的一部分，而这里集录的又只是这一部分中的一部分，仅只是总理活动中极平凡的一言一行和点点滴滴。

然而，伟大出自平凡。就从这一小部分，就从这点点滴滴、一言一行中，我们足以看到周总理的高大形象。他的伟大和可贵之处，还在于他的感人事迹，并不仅仅是一时一事，而是时时、事事、始终如一，贯穿到他的整个一生。正如毛主席所说，一个人做件好事并不难，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所以周总理赢得了国内外亿万人民的爱戴和钦佩！

邓小平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的悼词中说：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针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多次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提出，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说：“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

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224 页）

在敬爱的周总理的身上，可以说，处处放射着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的灿烂光辉。他的可贵的优秀品质和不朽思想，实堪称学习典范、为人师表，永远激励着亿万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大道上奋勇向前！

编者

人民公仆周恩来

深入实际　注重调查研究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实事求是地决定方针政策，正确处理问题十分重要。

周总理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每当处理重大问题，他总要深入到现场，亲自调查，和群众商量，听取意见。无论是重大项目的建设，还是发生严重的灾害、事故，他都亲自过问，亲临现场了解情况。对关系到千秋万代的重大工程项目，他总是亲自做调查研究，细心听取有关专家等各方面的意见，最后作出实事求是的决断。

亲临邢台震区

1966 年 3 月，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两次强烈地震。周总理冒着余震的危险，先后三次到震中地带。他深入灾区每个社队，布置抗震救灾，进窝棚，探病房，慰问群众和伤员。周总理来到宁晋县东汪公社临时医院的简易病房里，一个铺一个铺地走过，一次又一次地俯下身子向躺在地铺上的伤员问候，和他们握手。三辈子扛长活的老贫农贺全胜，骨盆严重折伤。周总理蹲在他身边，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又轻轻掀起他的被子，仔细观察伤情。贺全胜激动得热泪不住地流，半天才说出一句感激的话来：“总理呀，亲人解放军把我救出来，您整天为我们操劳国家大事，工作是那么忙，还亲自来看我们，这可叫我们怎么报答您的恩情？”总理听后亲切地说：“为人民服务应该！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还安慰他好好养伤。就是这样，周总理一连慰问了一百四十多名伤员。在隆尧县白家寨大队，周总理踩着震后的碎砖烂瓦，穿过残墙断壁，走遍了整个村落。每见一个人，他总是亲切地问：“家里损失怎样？锅碗瓢勺有了没有？能不能吃上饭？”总理还指示：“老年人家里没人，要帮助他们，娃娃没人带，要帮助带好。”总理在街上看见一个女孩站在倒塌屋的门口，就急步上前把她抱起来，深情地问：“你爸爸呢？你妈妈呢？”当孩子回答爸爸、妈妈都在时，总理才放心地把她放下。在巨鹿县何家寨公社，周总理站在大木箱上给群众讲话。那天午后，刮着六、七级大风，总理自己迎着漫天风沙讲话，而让群众背着风。当讲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时，总理讲一句，群众跟着说一句。会场上，激昂的口号震天响，沸腾的人群如潮涌。已是下午两点了，大家多次劝总理吃饭，总理总是说：“不忙！不忙！”并一再嘱咐身边的同志说：“群众受了灾，已经很困难，不要再给他们添麻烦。”那天，总理从早晨五点到晚上九点，一口饭没吃，一刻钟没停，连续工作了十六个小时。当天晚上，总理的座机落到邢台市郊区驻军营房前的操场上。许多人恳切地请求总理到城里用饭，总理说：“不必了，到营房与战士一起吃就行了嘛！”结果，总理只吃了一点家常烙饼和炒白菜。

在被冲毁的黄河大桥工地上

1958 年 7 月 18 日，黄河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奔腾咆哮的洪峰冲毁了黄河铁桥桥墩，京广铁路中断，南北交通受阻。当天，周总理便乘飞机赶到郑州黄河铁桥工地现场，了解情况指挥抢修。夜里十一点半，总理在

河南省委负责同志的陪同下，从黄河南岸车站，冒雨徒步来到工地现场。他和迎上来的同志们一一握手。在同一位与黄河大桥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工程技术人员握手时，周总理说：“任何桥梁会不会永远不坏？法国巴黎的铁塔会不会几亿年都不倒？要倒的。”总理向在场的人解释自然界事物发展的规律，说明世界上没有永远不死亡的东西，旧桥墩被冲毁了，新桥墩一定会跟着诞生。总理向大家讲了修复大桥对疏通南北交通的重大意义，号召工人们投入抢修大桥的战斗。在场的工人听到周总理铿锵有力的声音，受到极大的鼓舞，纷纷站起来向周总理保证：要日夜苦战，争取提前把大桥修通。这时，夜雨纷纷。总理穿的短袖衬衫早被淋透了，但他仍站在狂风暴雨之中，同广大修桥工人一起研究修桥方案。周总理回到列车上时，已是深夜两点钟了。这一夜，总理一直坐在列车上，聚精会神地听取根治黄河的汇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黄河铁桥按预定时间于八月一日修复通车。

水利工程一点也马虎不得

周总理为了研究三门峡工程的有关问题，曾三次亲临施工现场，调查研究，亲自处理问题。

1956 年三门峡工程开工后，对于工程兴建的必要性和一些技术性问题，还有不同意见。于是， 1958 年 4 月，周总理和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到三门峡工地重审设计。 21 日上午，周总理乘火车在史家滩上面的山崖上停下后，便不顾旅途的劳累，风尘仆仆直达施工现场。他时而登上高高的大坝隔墩，举目眺望工地全貌；时而步往开挖着的基坑，仔细察看工人操作机械施工的情况。总理望着这繁忙的施工景象，对建设者的劳动精神连连称赞。

周总理在三门峡主持召开了施工现场会，鼓励大家各抒己见。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确定三门峡工程以“防洪为主，其他为辅，先防洪后综合利用，确保西安安全，确保下游安全”的施工原则，为工程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在 1958 年黄河下游战胜特大洪水之后， 1959 年和 1961 年，总理又两次到三门峡，调查了解工程情况，处理工作中的问题。

1961 年，当周总理第三次到三门峡时，高达 100 多米的拦河大坝已经巍然屹立在高峡之中。但是，由于对黄河的泥沙认识不足，排沙措施考虑不够，水库使用后，很快发生了严重的淤积，因此仍有可能威胁到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这时，各方面议论纷纭，莫衷一是。面对这种情况，周总理指示水利部门要冷静对待，先做调查研究，找出解决的办法，并于 1964 年 12 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专门会议，邀请了持有各种意见的专家参加．总理每天与会，听取大家的发言和辩论，并多次找主管的同志个别征求意见。会议决定对三门峡工程进行改建，采取加大水库泄流排沙能力的措施，基本上解决了库区泥沙淤积“翘尾巴”的问题。

周总理非常重视我国的水利建设。长江治理是他十分关怀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选择三峡工程的合理坝址，1958 年二、三月间，总理亲自率领国务院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和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以及湖北、湖南、四川省的领导同志，实地进行了调查。

2 月 26 日晚上，总理率领大家从武汉乘“江峡”轮出发，沿长江逆流而上。他们在船上开会，听取汇报，进行讨论。当 28 日轮船到达长江堤防最

为关键和险要的荆江大堤时，总理和随行的领导同志冒着鹅毛大雪，登上堤岸，在冰冻的堤顶上步行察勘，对险要工段大堤外冲刷和堤基渗漏等情况，作了详细了解。

周总理视察荆江大堤后，又亲临三峡视察。在轮船上继续听取汇报和进行讨论研究。总理在三峡坝址亲自了解坝址的地形、岩石情况，在察勘火成岩区坝址时，总理对这个坝址坚硬的地质很满意。当时，总理问：“ 可不可以带一块回去向毛主席汇报？ ”地质人员高兴地回答：“ 当然可以。 ”地质人员告诉总理，这里的岩芯都有编号，总理就在岩芯编号的标签上亲笔签了名，写上年月日。在视察另一坝址时，为了了解这一带石灰岩的溶蚀现象和观察坝址全貌，总理沿着长而陡险的石梯健步登上半山腰，进入石洞察勘，随即又登上山垭，视察了整个坝线的全貌。

为了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总理在听取汇报时，多次强调设计方案要十分可靠、安全，对基本资料要精心校正。总理说：“ 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一点也马虎不得。马虎一点，马上出问题，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怎么能得过且过呢！ ”

和服务员共商节粮办法

1962 年 6 月的一天夜里，在大连宾馆，人们早已人睡，只有市区的点点灯火，和大海的波涛伴随着这深沉的夜色。可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不顾一天视察的疲劳，仍在灯下为国为民忙碌着。这时，服务员小刘给总理送水来，总理便亲切地请她坐下，用拉家常般的语气，从问多大年纪，家里有几口人到做什么工作，同小刘攀谈起来。当总理问到：“ 小刘，你家的粮食够不够吃 ”时，小刘回答：“ 基本够吃。 ”“ 听老人讲，若是在旧社会，遇上这么大的灾害，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目前虽有些困难，但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困难也是暂时的， ”总理对小刘的回答表示满意，对她说：“ 你说得很对。今晚请你坐一会儿就是要同你商量一下克服眼前困难的事。 ”总理满面笑容望着小刘那副惊异、激动的面容，缓缓地说：“ 现在城乡人民生活都有困难。农村就更艰苦些，口粮标准低。目前正是大忙季节，社员们每天起早贪黑，农活很重，又吃不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实在不易呀！小刘你懂吗？ ”“ 懂。 ”“ 那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国家现在有困难，拿不出更多的粮食调往农村，请城市的同志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食支援夏锄，你看行不行？ ”小刘立刻坚定地回答：“ 我们保证做到。 ”总理笑了笑说：“ 你一个人做到能解决多大问题？我是问你，如果城市人民都这样做，是否能行？ ”小刘没有立即回答，低着头，搓着手，沉思着。这时总理接着说：“ 看来，这个问题一时不好回答。这样吧，我给你个任务，请你和家里人、周围同志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可能，但不要说是我说的。商量的结果，尽快告诉我，一定要讲真实情况。 ”

两天过去了。小刘兴高采烈地向总理汇报了调查成果。一天节约三钱多，每餐只一钱多一点，也就是一两口饭罢，但夏锄搞好了，就会迎来千车万担的大丰收，大家说能办到。

周总理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才找旅大市委负责同志商量，对他们说：要把困难情况如实他讲给人民，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共同努力，度过难关。总理还指示旅大市委，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酝酿一下

关于节约粮食、支援夏锄的问题。他要求这一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对重体力劳动工人和家庭人口多的困难户不能动员。

总理的指示，旅大市委通过文件向各级党组织做了传达。并向东北局写了报告。东北局把报告批转东北三省，全区各个城市很快掀起一个自力更生，挖掘潜力，解决农村夏锄口粮不足的群众性的节粮高潮。

为了群众利益，总理抓紧一切机会进行调查研究。

1960 年，周总理陪同外宾瞻仰中山陵以后，请外宾在中山陵贵宾休息室休息，自己却不顾疲劳，来到茶室和群众交谈起来。他问一个青年粮食够不够吃，那位青年回答说：“ 够吃。 ”总理带着风趣而同情的口吻说：“ 撒谎吧？ ”接着他又满怀信心地说：“ 不过这是暂时困难，过二年就好了。 ”

与社员同吃一锅饭，研究食堂问题

1961 年 5 月，周总理到河北省武安县进行调查。5 月 3 日他一到伯延村，就同公社、大小队干部和群众进行谈话，询问庄稼长势和群众生活。中午十二时多了，总理坚持要去视察群众食堂。当他走进先锋街第六食堂时，群众已吃过饭。司务长刘中山，炊事员王三贵等三人见总理进来了，忙迎上去。总理同他们一一握手，询问他们食堂有多少人吃饭，有几个炊事员，工作忙不忙。这时，周总理看锅里还有剩下的玉米面糊糊，就对炊事员王三贵说：“ 在你们这吃点饭行吗？ ”王三贵一听总理要吃饭，看了看锅里的糊糊，为难地说：“ 这…… ”总理和蔼地说：“ 这就可以嘛！群众能吃的我就能吃。 ”王三贵看总理真要吃，就拿起碗来准备给总理盛饭。这时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把碗要过去，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准备要给总理擦碗。总理说：“ 这没关系。 ”又把碗接过来递给了炊事员。总理高兴地喝完了玉米面糊糊。在四天的视察中，总理坚持和群众同吃一锅饭。

经过深入调查，总理对“ 大跃进 ”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偏差，提出了正确的处理意见，向毛主席打电话作了汇报。其中关于食堂问题，总理说：“ 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

要有适合劳动人民需要的布鞋

1956 年的夏天，周总理到拥有六百多户私商和摊商的东安市场进行调查研究。他召集一些干部和职工座谈，了解东城区鞋帽行业公私合营后的情况。调查会是在一家鞋店里召开的。周总理坐在顾客试鞋的椅子上和大家促膝谈心。同志们幸福地坐在总理身边，象和亲人叙家常一样亲切。有位同志迟到了，拘谨地不敢落座，总理站起来亲切地用双手按着这个同志的肩膀连声说：“ 坐下，坐下。 ”窄小的店堂里充满着活跃的气氛。不久，周总理又到王府井大街的同隆和鞋帽店了解情况。他发现商店只经营皮鞋，不经营布鞋，皮鞋也比较瘦小，不适合劳动人民的需要。总理就指示鞋店要增加一些适合劳动人民需要的布鞋和脚型肥大的鞋。从此以后，鞋店增添了布鞋，并把大部分鞋植加肥了，生产出适合劳动人民需要的鞋。

登上公共汽车，体验群众乘车难

1954 年的一天，下午五点半钟，周总理把秘书何谦、卫士赵行杰叫到跟前说：“群众反映现在北京市公共汽车拥挤很厉害，上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今天咱们去乘公共汽车，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告诉保卫部门。”说着，披上大衣，出了国务院北门，来到北京图书馆汽车站，在车站十来米远的地方停下。等了一会，汽车来了，总理见群众都上去了，才最后上了车。车上，果然很挤，没有空座。总理往里走了几步，手握住吊环，站在了中间。汽车开动了，人们在拥挤中顾不上东张西望。一直走了两三分钟，站在总理对面的一个乘客才大声叫起来：“哎呀！这不是周总理吗？”“总理？总理？！”车厢里立即活跃起来，有的站起来让座，有的往中间挤，有的把手伸过来。随行的同志见此情景，心里十分紧张，忙往总理身边凑了凑，恐怕总理被挤倒。总理挥动着一只手臂，劝大家：“请坐！请坐！别挤！别挤！不要动。”乘客们要总理坐下，总理坚决不坐。一个乘客凑上前来，握住总理的手说：“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总理笑着回答说：“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接着，总理就和乘客们攀谈起来。问他们都是那个单位的？住在什么地方？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时间？有的乘客光顾和总理谈话，忘了下车，坐过了站；有的乘客挤不到总理跟前，总不甘心；新上来的乘客向总理打招呼，下车的乘客又都向总理告别。随行的同志劝总理说：“公共汽车上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咱们赶紧回去吧。”总理不肯。后来，下了公共汽车，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

回来后，总理很快将有关领导同志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同时，总理还指示：“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如有条件的话，都要用大车接送职工上下班。”

深入里弄，了解市民居住环境

五十年代初期，有一年周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当汽车驰过肇家浜路时，总理招呼司机停车，说：“我们下去看看。”解放初期的徐家汇肇家洪路，是一个污水洪滩。虽然那里的居民已经就业，再没有过去吃了早顿没夜顿的日子，但是居住条件还来不及改变。晚春季节，污水散发出阵阵臭气。可是，总理深入里弄登门串户，和居民亲切地攀起家常。总理走进低矮的、半截浸在污水里的破旧板房，摸一摸床上的被褥潮不潮，细致地问：在哪里取饮用水？在哪里洗菜淘米？刚会迈步的孩子掉下去怎么办？生病的人多不多？总理走进一间学龄儿童读书的板棚，问老师：这里是私塾还是民办的小学？问孩子们念过什么书？学不学珠算？总理还坐在磨光了的矮凳上，微笑着听小学生朗读：“东方红，太阳升……”。出了这间屋，总理在路上走走停停，和三轮车工人攀谈，和小摊贩问答，还亲切地询问正在家里的夜班工人：白天能不能睡好觉？工厂离家远不远？一家人总收入有多少、怎样安排？总理坐进了汽车，深沉的目光一直凝着车窗外，望着这里的板房、污水、垃圾……总理同陪同的黄宗英交谈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我们有多少工作要做，我们做得太不够了。要看到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还很穷。有毛主席的领导，劳动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是会改变这一切的。”然后总理又向陪同的上海市领导同志详细地询问了一系列数字，研究着如何改善上海工人的居住条件，改善城市的环境卫生。下车时，总理向上海市领导同志说：“你

们再去研究研究，早点把规划告诉我，我带回中央去。”

铁路运输要保证安全

1969 年 5 月 29 日，周总理工作了一整天，没顾上吃晚饭，夜十一点钟赶到北京火车站，调查了解当日站内发生客车相撞事故。总理还同车站的干部、职工一起研究车站的安全运输问题，一直到凌晨一点多。工作人员提醒总理说：“该吃点晚饭了吧？”周总理同意了，派人取来了一些包子，让大家和他一起吃。总理利用吃饭的时间，给大家讲述了中国铁路的发展史。最后，总理又对车站的运输管理作了重要指示。总理反复强调，铁路是国家的主要交通工具，一定要管理好，安全是个大问题，一是避免经济上受损失，更重要的是要对人民负责，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要用机械化减轻劳动强度

1960 年 2 月 9 日，已经是中午了，周总理来到海南岛西联农场了解情况。他饭没吃一碗，茶没喝一口，就深入到橡胶工人中去了。在白兰队视察中，周总理详细询问了橡胶品种、生产情况、产胶能力，割胶辅导员老郑一一作了回答，并选了两棵树给总理作割胶表演。总理认真地看着，说：“橡胶树，我们自己有了，我们要多产胶，产好胶！我们国家很需要橡胶呀！”周总理来到加工厂，询问了工人人数、职工生产生活情况。在膏化车间，总理认真地看了整个生产过程，听了技术员的汇报。在干胶制片车间，总理见工人们操着笨重的压片机，便走近一位工人身旁，关切地问：“能不能改装一下呢？能不能搞个电动压片机啊？”工人回答说：“能”。党支部书记者陈表示，半个月内就能改装出来。总理还嘱咐老陈：“在各个生产环节，都要尽可能用机械和电力来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周总理离开车间时，又问老陈：“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吗？”老陈告诉总理，主要是包装浓缩胶乳的铁桶不够用，影响生产。总理和随行的省、区负责同志商量后对老陈说：“一个月内就给你们解决。”在一个多星期后，大量的铁桶就陆续运到了，积压了几十吨的浓缩胶乳的包装问题解决了。

1962 年 6 月，周总理到黑龙江视察时，对农业的机械化特别关心。当他知道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设计了垅作七铧犁时，于十八日亲自来到农机研究所参观“犁后喘”的表演。拖拉机开动了，七名工人扶着犁杖，紧张地跟着拖拉机打垅。这时正值热天，土壤干燥，拖拉机和犁铧过后，尘土飞扬。周总理跟着扶犁的工人，在新犁出的垅沟里边走边看，泥土灌满了凉鞋，也不在意。当拖拉机开出八十多米的时候，总理看见扶犁的人很累，就让拖拉机马上停下来，说：“这样干农民劳动太吃力了，又累又吃土，质量还不好，一定要解决。”接着，垅作七铧犁表演开始了。周总理又跟在拖拉机后面仔细观察。他看见垅作七铧犁代替了“犁后喘”，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并且质量好、效率高，非常高兴地说：“这个好，应当多生产，解决‘犁后喘’。”

走访土专家，支持科学实验

周汉华，是广东省新会县五和公社一个只读过两年书的 23 岁的青年农民。他刻苦学科学，大胆搞实验，培育出五个水稻优良品种。周总理在 1958 年去广东视察工作时，专程登门访问了他。

7 月 2 日傍晚，周总理兴致勃勃地在田间观看了周汉华搞的水稻和高粱杂交试验，然后登上他家的小阁楼，仔细地了解他育成高产水稻新品种的经过。总理还和周汉华全家及左邻右舍坐在晒谷场上谈心。总理听了周汉华的谈话后，关切地问他：“还有什么困难？”周汉华说：“有时来参观的人很多，一天多的达 700 多人，来信也不少，对试验总是有点妨碍的。”总理说：“这个问题要解决。”接着对省委和县委的负责同志说：“要很快拟订个办法，保证周汉华的试验时间。”

临走时，周总理赠送给周汉华一个空气电池灯，并亲手教他怎样使用，鼓励他好好学习，大胆创造，争取年底到北京献礼。

这年 11 月，周汉华参加了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来到了北京。有一天，周总理把周汉华请到家里吃饭，问他水稻科学试验情况。周汉华向总理汇报，社里成立了农业科学研究所，他和华南农学院下放的师生在一起搞科学研究。总理听后，高兴地对周汉华说：“这个办法好。你在里边要好好劳动，虚心学习，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学习别人的经验，永不骄傲自满，就能永远前进。”最后，周总理还亲自在周汉华的笔记本上题词留念：“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为培育良种，大搞杂交运动而奋斗！”

关心茶叶生产

周总理曾多次深入到杭州梅家坞大队，踏遍茶山路，访问茶农家，关心着茶叶生产。周总理说：“茶叶是珍品，国内外人民都需要它。要多发展些。”“茶树常年碧绿，种茶本身就是绿化，既美观，又是经济作物，再好也没有了。”“适宜种茶的山坡，应开垦出来种茶树，既是很好的绿化，又可多产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增加集体收入。”1957 年秋季的一天，他来到梅家坞，见到合作社干部，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不久要公布了，你们也该有个计划，”并说：“明天再来和你们一起议论议论。”第二天下午三时，总理又来到梅家坞，同干部和部分社员举行座谈。座谈会上，总理十分仔细地询问了梅家坞解放前后的情况和合作化以来的变化，从发展茶叶生产，谈到多种经营，又谈到田地安排、水的利用、山林绿化、畜牧生产以及计划生育等十二个方面的问题，为梅家坞描绘锦绣前景。总理最后语重心长地叮嘱大家：“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要使每个社员都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北海团城得到了保留

横跨于北海与中南海之间的金鳌玉　桥（今北海大桥），在团城脚下。桥的两端原有明代嘉靖皇帝所建的牌坊，桥西为“金鳌”，桥东是“玉　”。解放后，随着城市的发展，这座桥难以适应交通的需要，有人建议拆除团城，另建新侨，把路面拉直；有人坚决反对，认为团城是金、元、明三代形成的重要古迹，同北海建筑构成一组完美严谨的古建筑群，很有历史价值。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周总理便亲自到现场考察研究。

1954 年炎夏的一个下午，周总理冒着酷暑来到团城。他事先没有通知文物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到团城后也不让接待的同志去告知。总理绕团城走一圈，然后站在团城的城墙上，时而眺望北海的琼岛，时而注视着桥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足足两个钟头，他不时地和陪同来的同志交换意见，又亲切地询问陪同考察的文物工作同志的意见。最后，总理决定保留团城，让团城南面的中南海国务院的红墙后移，将桥和马路向南拓宽扩建。这样既保护了文物，又解决了交通问题。

为万人大礼堂提设计方案

在确定建设人民大会堂时，周总理就指出人民大会堂应包括能容纳万人的大礼堂。可是在设计万人礼堂时，专家们都感到为难了。要容纳万人，体积必须十倍于普通的礼堂和剧场。空间这么大，如果处理手法不当，人坐到里面就会感到渺小和压抑。怎样处理这个矛盾呢？专家们意见纷坛。有人主张做成歌剧院式的，挑台上置很多包厢，有人主张压低礼堂的高度。方案提了一个又一个，但是都有不少弊病，谁也不满意。在一次会议上，总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给到会的同志反复宣传建设万人大礼堂的政治意义，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建筑必须“以人为主，物为人用”，使享用它的广大人民群众感到心情舒畅，感到自己就是建筑物的主人。为了解决人与建筑物的矛盾，总理提出了“水天一色”的设计思想，启发大家说：“人站在海边，看海不显远，看大不显得高，人并不显得渺小，这是什么原因呢？”说罢，总理随手用铅笔画了一个不规则的扁圆形的顶棚图，启发大家在设计上利用这个视错觉。总理的话如同黑夜拨亮一盏灯，使搞过几十年设计的老专家豁然开朗，倾身折服。他们多次见过大海，但是从没想到大海与设计的关联。遵照总理的指示，设计师们把礼堂的内部设计成“水天一色”的形状，顶棚与墙面圆角相交，成穹窿形象，从顶棚到墙面，上下圆曲浑然一体，使人感觉既不压抑又不空旷。顶棚上作三圈水波形暗灯槽，纵横密排着近五百个灯孔，灯光齐明时，就象满天星斗。顶棚的中心为红色的五角红星，围以镏金的向日葵花。整个礼堂的构造、装饰和色彩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朴素、明朗、大方的气氛。

登上顶端，察看北京饭店施工工程

1973 年 11 月 2 日上午，周总理送走外宾从机场回来，顾不上休息，就到正在建设的北京饭店工地。当时，饭店主体结构刚到第十六层，只有上下运料的外用电梯，坐人很不安全。周总理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坚持要上去看看。周总理坐上电梯到了第十四层，穿过支满盒板林立的柱子，跨过遍是砖头瓦块的窄道，又顺着脚手架徒步登上了第十六层屋顶，检查施工情况，用望远镜了望全市的高层建筑。周总理把有关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请到人民大会堂，又一起到人民大会堂的顶上观看建设中的北京饭店，观看全市的建筑物。之后，周总理匆忙地吃了一小碗面条算是午饭，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说：“走，咱们一块再到西华门看看去。”初冬时节，刮着凛冽的寒风。周总理身穿单薄的外衣，头上也没戴帽子，又徒步攀上西华门的城台，进行实地观测。经过实地观测和反复研究，周总理对北京饭店及全中建筑物的高度

作出了具体的指示，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首都，规定了正确的方针。

消灭黄烟，保持蓝天

1971 年 10 月 9 日，周总理陪同外宾参观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这一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灿，天空蔚蓝，总理乘车来到凤凰岭下。他放眼环顾这座现代化工厂，忽然发现有一个烟囱正吐着黄色的浓烟，徐徐地飘向天空。总理说：“那黄烟，有毒啊！”站在旁边的同志也都应着：“是有毒啊！”也有的说：“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周总理对站在旁边的青年工人说：“你们青年人要有志气，把黄烟消灭掉，让祖国的蓝天是一个晴朗的天空嘛！”工厂负责同志说：“我们准备想办法烧掉！”总理说：“烧掉是下策，放空跑掉是下下策，应当把它综合利用起来。”

为了解决这个厂的污染问题，总理不顾疲劳，又风尘仆仆地到了污水处理场。他非常认真地询问了污水处理情况，仔细地听操纵人员向他介绍污水的处理过程，还用显微镜亲自观察经过处理的水中的原生物生长情况，并翻阅了原生物图谱。总理鼓励大家说：“综合利用是大问题，要立志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1972 年 11 月，周总理已经七十多岁高龄，且身患重病。但还冒着初冬的寒风，亲自到北海公园检查北京市的烟尘污染情况。总理徒步登上白塔，站在白塔平台上，昂首仰望远方。当他看到远处有烟囱冒黑烟时，不安地说：“首都烟雾弥漫，污染相当严重，要赶快采取措施解决啊！”

向第一线的代表作调查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西省翼城县西梁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春安， 1954、1955 年来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周总理都接见了他，向他调查了解棉花生产情况。 1955 年夏天，总理问吴春安：“你们的棉花搞得好，是怎么种的？”吴春安向总理详细地谈了如何施肥、选种、下种、管理等一套植棉情况。总理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头，有时为了弄清植棉中的一个细节，常常问几次。总理关心地说：“你们还要搞科学植棉，看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斤。”他还鼓励说：“搞科学实验不要怕失败，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准能成功的。”根据总理的指示，西梁村成立了植棉科研小组，经过八年的反复实践，终于总结出一套棉花增产经验，皮棉亩产达到 166 斤 6 两。

向日本来宾询问农业机械化

1970 年 7 月，日本农村青年友好访华团正在我国访问。起初外事部门并没有考虑请总理接见这个团。当总理得知该团成员绝大多数来自日本农村，又是基层的工作人员时，为调查了解日本农村的情况，周总理决定接见这个团。周总理说：“放着这么多人，主动送上门来，你们不调查研究，怎么做工作？今天我把其他工作都放下，反正天也塌不下来，我舍不得这个机会，见他们一次，专干这个事，作调查嘛！”在这次接见中，周总理同外宾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谈话。从日本农村的耕地面积、谷物产量，到使用的农业机械、农民收入等等，都一一详尽地作了调查。总理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

虚心向外国朋友求教的态度，不仅使在场的中国同志深受教育，而且也打动了外宾的心。该访华团团长常山升回国后，又专门找了从事农村研究的菅沼正久教授，重新收集了大批材料，并同菅沼正久教授一起再次访华，向我有关部门作了详细介绍。

实事求是　坚持科学态度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这方面，周总理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工作态度，制定计划从实际出发，搞建设因地制宜。他提倡如实反映情况，讲真话，反对任何形式的浮夸和脱离实际的宣传，更不允许汇报不确实的情况和说假话的恶劣作风。

不要搞脱离实际的宣传

1958 年夏天，周总理到戏剧学院实验剧场，看了师生演出的一个话剧。这个话剧因受当时大刮“共产风”的影响，错误地宣传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到来。总理看后，严肃地指出：“五年后就实现了共产主义？那么容易啊？！你们不要这样宣传，你们这个戏太浪漫，脱离了实际。”总理还指着舞台上设计的豪华的大理石墙壁，问大家：“你们知道大理石多少钱一平方米吗？”大家回答不出来。总理又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国家一穷二白，艰苦朴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你们要宣传这个传统。”总理对这个戏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但对其中唱的《蝶恋花》这首词非常热爱。演出结束后，总理走上舞台，和大家一一握手，并和演员一起重新唱了戏中的《蝶恋花》。最后，总理又仔细地看着台上的布景，指着大理石的墙壁说：“五年以后，将军就能住上这么富丽的房子？我看不大可能。”

反对搞浮夸

1956 年下半年，第一届全国农业展览会在北京筹备展出。展出前，周总理亲自去审查。他指出展览的主要缺点是：只注意了我国解放后的成就，对解放前的和世界各国资料注意不够；只注意全国各地先进的成功的典型，没有足够地注意各地后进的典型；在宣传成就时，多数只讲产量上升的情况，不讲产量下降的情况。这样，没有古今中外的对比，没有先进和落后、成功和失败的比较。农业生产，一方面靠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还得受客观自然条件的影响。这样的展览，不能给观众以全面而深刻的印象，缺乏说服力，还可能造成盲目乐观的情绪。总理这种全面看问题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深深教育了在场的同志。

1958 年浮夸风盛行时，有一个省宣传已解决了全省的水土流失问题。周总理带领有关部门的同志，坐直升飞机视察了一段路程，看到下边荒山秃岭依旧。他感慨他说：“看水土保持，要坐飞机看全貌，不能光看典型。”在 1959 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水利会议上，水利部门曾设想提出三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哈哈大笑说：“三年内要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

1971 年 2 月的一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一位同志，汇报普及针灸疗法的情况。那位同志在汇报中说，某县普及针灸，已达到“家家户户都有一包针”。总理马上插话提出疑问：“有多少公社？多少生产队？多少户人家？”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中西医结合仅仅

是开始，是序幕。应该谦虚，不要吹，要实事求是，不要讲过头嘛！”这时，另一位同志听了总理的批评，站起来接着说：“针麻还存在着‘三关’没有解决，一是镇痛不全，二是开刀时肌肉比较紧张，三是牵拉内脏有感觉。”总理听后表示赞同说：“有‘三关”就比较辩证了，尽写好的怎么行？典型事例也要把缺点写出来。”

不要护短

1965 年 9 月举办的全国农业展览，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道前往审查。周总理从头至尾仔细地看了三个多小时，并作了许多指示。当看到广东珠江三角洲模型时，总理以敏锐的眼光很快发现上面少了三个县，就指着模型问道：“这三个县哪里去了？”回答说：“这三个县受灾了，要都展出的话，整个地区就上不了《纲要》了”。总理说：“不要护短，应该实事求是嘛，都应该展出来！”并风趣地说：“你们不加上去，我就代你们插上这三个县的牌了。”当总理听到说珠江三角洲地区自动排灌网“能排能灌，旱涝保丰收”时，总理说：“今年广东就涝了嘛！怎么能说旱涝保丰收呢？”

1970 年 2 月，周总理在全国棉花会议上，不满足于看看书面材料、听听汇报。他经常利用一切机会，向来自实际、来自基层的同志进行调查研究。参加会议的二三十个粮棉高产的典型，总理都把他们的代表请上主席台，一个一个地询问、调查。江苏启东县年年丰收， 1969 年虽然遇到一些自然灾害，棉花生产抓得不够紧，亩产皮棉仍然超过 130 斤。因此在汇报材料中写了一句“1969 年战胜严重自然灾害”。2 月 13 日，在座谈会上，总理关心地问启东代表：“你们有什么灾害呀？”回答：“有雨涝。在关键的时刻连续下了二十多天雨，有三四百毫米雨量；启来在紧要关头又遇到了 20 多天干旱，虫灾也比较严重。”总理听了后说：“比起人家，你们算不了什么严重自然灾害啦！要把‘严重’二字去掉，主席讲要实事求是嘛！”

拍照要真实

1963 年 5 月间，《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出访印尼等四国归来，受到热烈欢迎的照片。这是人民日报社摄影记者自己拍的照片，但发表时又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和女同志的形象，并用剪贴的办法移动了欢迎人站立的位置。对此周总理非常生气。他指出，人民日报社没采用新华社发的经过陈毅副总理看过的照片，而发表自己记者的没有送陈毅同志或其他中央领导看过的照片，而且错误百出。他说，这件事情不能只从技术上来看，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因为这次少奇同志出访四国意义重大，回北京时的欢迎场面是我亲自同中央有关同志商量安排的。去欢迎的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并且特意组织一个“满堂红”的大合照，以充分体现对这次出访成功的支持。人民日报社任意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就违背了这种精神，缺乏政治敏感。人民日报社又把特意安排的女同志裁去了，这是政治观念薄弱，有大男子主义的味道。人民日报社把原来照片中各人站的位置擅自挪动，甚至把人头像剪下来挪动拼贴，这是弄虚作假，“克里空”作风，是错误的。总理指示，拍照片也要真实。

因地制宜搞建设

1958 年，某省的一个卫生单位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提出，他们那里的医院床位太少，要求国家拨给钢材、木材，增制床位。周总理指示说：你们那里是产竹子的地区，应当多制竹床，建设社会主义要因地制宜。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原则，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死板形式。在建设中，要注意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不可舍本逐末地追求形式；要就地取材，不可舍近求远地强求全国一律，一切要从实际出发。

重在表现

北京某部队文工团有位女报幕员，嗓音圆润，风度大方，特别受观众的欢迎。但是这位女报幕员出身于一个反动军官家庭，沉重的家庭成分包袱，压得她抬不起头来，也严重地影响到对她的使用。 1955 年，这个文工团的领导，从女报幕员的家庭出身考虑，决定让她转业到地方工作。

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立即作了如下批示：“ 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对该同志的转业，应慎重考虑。如只讲成份，那么，我也应辞去总理的职务吗？ ”

那个文工团的领导，接到这个批示，很受震动。他们重新研究了这个女报幕员的转业问题，决定继续留在部队工作，发挥她的一技之长。

1965 年 7 月 5 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新疆石河子农场亲切接见了上海知识青年代表。

周总理一一询问青年们的家庭出身，当问到共青团员卓爱玲时，她羞涩地说：“ 我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里。 ”总理又问：“ 你家里还拿不拿定息？ ”小卓听成自己要不要拿定息，着急地回答说：“ 我不要拿，我不要拿！ ”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总理说：“ 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接着，总理告诉大家，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的人，主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

总理的教导，使卓爱玲前进的方向更明确了，对大家也都是很深刻的教育。

1964 年，淮剧著名演员筱文艳同志为了表示对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痛恨，在去参加四届政协会议时，把名字改成张士勤。这件事被总理知道了，便把她找去问：“ 为什么要改名字？ ”筱文艳回答：“ 我要把名利思想去掉。 ”总理说：“ 名字是一个人的代号，看你怎么对待这个名字。你来开会不是代表你个人，而是代表群众，你把名字改了，连我都找不到，群众更不知道了。”从总理的教诲中，筱文艳明白了思想改造不在于做出形式，而应该脚踏实地地在转移立足点上下功夫。后来，她又把名字改了回来。

反对“ 一刀切 ”的做法

1959 年，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都纷纷报名参加劳动锻炼。周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知道后，在这年 5 月 12 日的全国政协第三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因为有人要求去劳动锻炼，不组织也不好，但要根据实际情况参加。总理具体说：“ 我看可以划五个杠子：（1）

56 岁以上的不参加，特殊要求的特殊批准；（2）有病的不参加；（3）体弱的不去，体弱的标准可以根据医生检查，大家评议；（4）工作忙的可以不去；（5）不适于参加体力劳动的不去，如艺术家、运动员等。”后来， 1960 年 4 月 11 日，总理在政协三届二次会议闭幕会上，又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这些人去进行劳动锻炼，并不是为了使国家的生产指标因此增长起来，可能还有相反的效果，如把人家的机器搞坏，地瓜没有刨净，棉花收不好。我们去的目的在于锻炼，增加生产知识，增加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总理还风趣地说：“要很好安排，不然我们去妨碍人家工作，粗手粗脚。写文章的时候，画画的时候，你的手很细，但到机器跟前、农具旁边，又变成粗手粗脚了。”

1959 年 4 月 29 日，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总理邀请了三百三十多位六十岁以上的委员参加茶话会。会上，总理号召大家把亲身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传之后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会上发言，说到解放后政治运动太多，不能专心搞业务，这是我们知识分子常有的苦衷。总理对这个意见极为重视，对顾颉刚说：“你谈得很好。你并不老嘛！”鼓励他多做工作。

1963 年，北京京剧团赴港澳演出归来后，周总理邀请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等到家里吃饭，陈毅副总理也在座。在谈话中，艺术家们反映，剧团每天搞这个学习，开那个会，弄得人困马乏。总理当即说：“你们不要不务正业！你们晚上要演戏，白天还要开会、学习，你这个戏还能演好吗？不要安排得那么满嘛！又不指望你们去搞政治、搞外交。有个分工嘛！”总理非常明确地说：“你们只要做到‘站稳立场，敌我分明’就够了。你们要努力把自己的业务搞好，这才是主要的。”

周总理还纠正了不许演反面人物的演员向观众谢幕的“左”的错误做法。

有一次，周总理陪外宾看《沙家浜》。戏演完以后， 演员出来向观众谢幕。总理关切地问：“演刁德一和胡传魁的演员为什么没有出来谢幕？”当有人告诉总理，这是“上面”（指江青等人）的规定，反面人物一律不准出来谢幕。总理当即指出：“他们演的角色是反革命，但谢幕是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关系。不让他们谢幕是不对的，必须改。”此后，演反面人物的演员又能出来谢幕了。

发扬民主　倾听不同意见

发扬民主，是团结广大群众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尤其对于重大问题的决策，更需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让各种意见都讲出来，各种方案都提出来，才能从中进行比较和鉴别，把最好的意见和方案集中起来。

周总理在这方面，也是全党的典范。他不仅在重大问题的决策时，召集各种会议，广泛进行讨论，听取各方面意见，而且平时也随时随地，利用各种机会接触干部群众，主动征求意见。他的民主作风，还表现在他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更不依势压人。

启发大家发表各种意见

国务院每月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每周举行一次常务会议，周总理都让与会同志畅所欲言，把话讲完。他鼓励大家大胆讲话，并且全神贯注地倾听每一个人的发言。对于别人的发言，即使只有一点可取，他也表示满意，有时还鼓励几句，或者点点头表示赞许。对于有些不正确的意见，他一般不正面批评，而是采取耐心说服、讲道理的态度，使发言的人自己领会哪些意见不正确。遇到有争论的问题，总理善于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作出大家都满意的结论。

1956 年 1 月，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审议《汉字简化方案》。当讨论到《方案》中用“叶”字代替“葉”字时，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下。总理看见一位姓紊的同志发言表示赞成用“叶”字，于是在作结论时，就风趣地说：“你们看，姓叶的人都赞成了，我们就通过吧。”到会同志都满意地通过了这个《方案》。

建国初期的政务院，当时副总理四人中有一半是党外民主人士，政务委员十五人中，党外民主人士多达九人，每次讨论问题，总理总是一个一个地请他们发言。孙起孟同志回忆说：在政务会议的讨论中，政务委员不论是否中共党员，人人各抒所见，畅所欲言，气氛之热烈和谐，至今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周总理作结论时，对委员们的发言内容之取舍，从来不以是否中共党员划线，而唯真理之是从。民盟的负责人之一罗隆基，也是政务会议中颇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他有一段时间因病住医院治疗，但遇到举行政务会议日子，他竟然力疾与会。别人劝他不宜勉强，他很坦率地说，在此期间他差不多摒绝各种政务活动，唯 独周总理主持的政务会议，他尽管健康情况不大好，还是坚决要求医生同意到会，不仅参加讨论，而且不论会议开得时间多长，他也舍不得中途退席。他认为少听一次周总理的会议结束讲话，就如少上一次极有教益的“大课”，对自己实为无可弥补的损失。他还说，他从周总理主持政务会议的实践中，看到了对他原来很生疏的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真谛及其积极效果。他说，周总理的结论使与会的委员们人人感到“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周总理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演得出神人化，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而又毫无高低之感。

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在周总理领导下进行的。钱学森同志回忆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大家的意

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会上，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在认真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总理最后决定怎么办。有一次会中，总理问大家对一个问题有什么意见，秘书跑过来对总理小声说：“这件事你曾经批过。”总理大声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批了的事大家觉得不对可以改嘛！”

1961 年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有一项议程是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大跃进”中各地上报的工业统计数字，有相当大的虚伪部分，其中既有人为的浮夸成份，也有计算口径不明确和计算方法不科学的因素。这方面手工业产值数字更为突出。鉴于此，周总理指示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一定要把前儿年的统计数字认真核实，去伪存真；同时，要明确解决并统一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科学方法，使统计资料和计划工作能如实地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

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财政部与国家统计局不完全一致。在这次国务院会议上，财政部的负责同志讲了他们的意见以后，杨波同志代表国家统计局发言，讲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听了双方的发言，总理表示基本上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并对杨波同志的发言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的结论。于是杨波同志又站起来发言，再次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这时，总理即指示他们会后再商量一下，尽快把意见统一起来，早日作出明确的规定，通知各地照办。

会议结束后，到会同志都留下来吃午饭。吃饭时杨波同志心情有点不安，心想在总理讲话后不应该再站起来讲不同意见，所以他就坐在饭厅西南角最边的一个桌上。刚开始就餐，总理把杨波叫到身边坐下，亲切地对他说：“你为什么坐得那么远？不要紧张，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这时杨波同志十分激动，深为总理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所感动。

随时注意征求批评

1956 年秋，全国妇联召开女工商业者及工商业者家属代表会议。会后，周总理请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吃便饭。席间，总理征询她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她们在总理面前毫不拘束，谈得很坦率，也很诚恳。有的说，我们的花布没有解放前的好，解放前的花布不掉色，洗到旧了，颜色还是挺鲜的；有的说，解放前棉毛衫质量好，缩水小，现在的洗一次就缩得穿不下去了；还有的说，女同志的衣服颜色单调，没有线条，男的女的都一个式样……意见提了一大堆。周总理对她们的意见听得很认真，可是妇联的几个作陪的同志听着生气，认为她们批评得太过分了，好象我们还不如解放前呢，便一声不吭。总理见妇联的几个同志的态度不大友好，就对一位妇联同志说：“大姐们讲了很多意见，你们也谈谈看法啊！”这位同志没好气地说：“我在解放前是个穷孩子，没有穿过棉毛衫，没法对比。”总理又问另一位同志：“楚平，你的意见呢？”陈楚平同志说：“我从来不穿花衣服。棉毛衫嘛，大就大点儿，小就小点儿，从来不管。”语气也不那么友好。总理当场严肃地批评了妇联这两位同志。总理说：“你们在解放区长期受党的教育，在艰苦的农村环境里受到了锻炼，进城后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现在

是执政党，你们又在全国妇联担任工作，对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不能漠然视之。不能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处理问题。应该经常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向政府反映，向我反映。刚才几位大姐的意见，反映了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指出了我们政府工作中的缺点，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很好，应该欢迎嘛！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周总理对妇联两位同志的批评和对她们所提意见的态度，说明周总理时时刻刻注意听取各方面群众的批评意见，对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工作中的缺点一点也不放松。

虚心接受正确建议

1965 年初夏一个周末的晚上，总政文工团的几位同志应邀到中南海去接受周总理交给的任务——编写一个反映拉美人民革命斗争的话剧。

对剧本的编写，总理讲了许多很好的意见。编剧刘大为同志说：“总理的指示很重要，回去之后，我们一定很好地向领导汇报，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总理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也可以说是一个观众的意愿——很想在舞台上看到反映拉美人民的革命斗争。至于这个剧怎么写，你们要多作调查研究，我刚才讲的那些意见，仅供你们思考讨论，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不是什么指示。我讲的也不一定全对。你们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有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商讨，或者就用你们的作品发言、讨论，请大家再提意见。”

在总理审查彩排时，编剧刘大为心情有些紧张，担心通不过。因为剧的设计和当初总理提示有所不同。演出结束后，刘大为向总理说明了这一情况，并说如果总理不同意，再改过来。总理听了刘大为的阐述后，安祥地对他说：“我前次讲的，我再三说是个人意见，是一人言，你们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创作了这个戏，是众人言。我反对一言堂，提倡众言堂。”

1971 年 9 月上旬，周总理正忙于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天晚上，他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厅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二百人。总理亲自主持一段一段地讨论、修改。讨论中有一个用词总理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他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

还没等大家发言，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总理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应当如何如何修改。但开始总理也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他们就这一用词展开了争论，各抒己见。参加会的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位年轻人同总理争论。

他就是总理办公室的秘书——纪东。

经过争论，最后总理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 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你们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表示赞成。

之后，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更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更能切中要害。你们看，刚才的争论就说明，小纪的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嘛！毛主席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谁的意见对，我们就按谁的意见办。”

说到这里，总理感到很欣慰。他说：“纪东刚到我这里来时，连话都不

大敢说。我花了不少力气，经过三年时间，才使他不但能够同我一起讨论问题，而且可以进行争论，常常能谈出挺有见解的意见。”

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周总理平易近人，与人平等相待，同志们都敢和他争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

1961 年，新侨会议（研究电影故事片创作的会议）期间，周总理去探望生病的黄宗英同志，赵丹也在场。赵丹和总理谈起会上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时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电影好，有人认为小说好，争论相当热烈。总理说：“小说我没看过，谁有这本书借我看看。”赵丹说：“我有这个书，但不能给您看，因为上面写了许多批语。”总理说：“我正要看看你批了些什么？”赵丹心想：“总理工作那么忙，真能有时间去看它吗？”

两天后，总理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到了这篇小说，并同电影做了比较，认为电影改编得比小说好。赵丹还是坚持认为小说好。

七月一日，总理到香山和参加故事片创作会议的代表共同欢度党的诞辰。烈日炎炎，翠谷青青，大家随总理抬级而上。赵丹仍死心眼儿地盯着总理议论《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的问题。赵丹对总理说：“总理，我对你作的报告有不同意见。”总理问：“你有什么意见？”赵丹说：“你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是电影好，我看还是小说好！”总理说：“电影的时代感较强，场景的选择更广阔……”赵丹说：“那只不过是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最后，赵丹还是坚持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

总理略停一下脚步，偏过头微笑看着赵丹，声音洪亮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保留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总理就是这样从不因为自己是总理就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赵丹感慨地说：“我有时很怕部长、书记，但是我不怕总理。”

多讨论多商榷总是有好处的

1956 年 11 月发表了中缅两国关于边界的联合新闻公报。 1957 年 3 月 5 日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开幕时作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总理原计划在这个报告中对于中缅边界问题作比较详细的说明。但是报告前，总理看到人大代表王季范、政协委员于树德、研究中缅边界问题专家尹明德写给他的意见书。总理认为这几位先生的意见提得很好，决定把这个问题推迟另作报告。为了把材料搞得更充分，准备得更好，总理邀请了云南许多位负责的人士来京座谈讨论，同时，还和王季范先生交换意见。根据大家商讨的意见，周总理在 3 月 16 日的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周总理深有体会地说，由这个问题联想起来，我们国家决定一个政策，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凡是关系大的，都应该尽量多讨论，多商榷。中缅边界问题，我们虽然经过了一些法定手续，但在发表后，得到这几位先生的

宝贵意见，提醒我更进一步的研究。总理继续说，我希望不光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政府成员，还有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对于政府的内政外交工作，凡有所见，应该时常提醒我们，使问题研究得更全面，讨论得更详尽，设想得更周到，这对于事情总是有好处的。

一丝不苟　严肃认真负责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唯一宗旨，但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应体现在各个方面的实际行动中。周总理对经办的一切事情，不论大小，都做到了对人民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经他手审批的文件，他都习惯于用墨笔逐句、逐字审阅批改，不放过任何一个错别字句或标点符号，尤其是对于数据，更是仔细，决不放过一点差错。

主持会议周到详尽

周总理主持召开会议，都严格遵守时间，准时开会，决不让大家等他一人。偶尔，因去毛主席那里，或处理紧急事情，来晚一点，他除事先打招呼外，来到时，总是要说一句："对不起，让同志们久等了！"

在国务院开会，总理一到会场，首先对议程、出席人名单，以及与会议议程有关的列席人名单，都要仔细过目，如果发现名单中漏了谁，或者某项议程还应该有谁参加，他便立即指示会议工作人员打电话请该同志来参加会议。当发现名单中有不认识的人时，总理便会叫这位同志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认识，并问这位同志原来在哪个单位工作等。

对国务院会议上正式通过的各项决定、指示等重要文件，总理更是认真负责，决不会有丝毫马虎。在会前审定议程时，他必问清楚提交会议的文件是否研究得成熟了；在会上讨论每项重要议程之前，他总是要起草的部门详细说明文件的来龙去脉，与其他有关文件的规定有无矛盾，是否向有关部门征求过意见，等等。总理对工作精益求精，从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有时，由于事先准备不周，起草文件的部门和组织会议的同志，被问得答不上来；有时为了查清一个问题，当场就要查找某些有关文件资料。有一次，讨论征收农业税的问题。当讨论到文件中的税率时，总理想起政务院时期发布过类似文件。他说，政务院的那个文件经过会议讨论，由他修改后报请毛主席审阅定稿后颁发的，他还记得文件上规定的税率是多少。这时，总理问：档案带来了吗？回答：档案没找到，只带来了文件副本。总理说，我要看原始档案，主席和我当时是怎样修改的。于是，有关同志分别到总理办公室、机关档案室去找。没有找到，经向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查询，原始档案存在他们那里，税率跟总理记得的一致。向总理报告后，总理说："税率没有错，不必去取档案了。"总理这种严肃认真的负责精神，对有关的同志教育极大。在总理的教育和严格要求下，组织会议的工作人员会前都注意把会议议程中的问题，通知有关部门作出充分准备，并将与议程有关的资料查到，把其中有关的段落用红铅笔划出来，或另外写个便条，放在总理的座位上，或者待总理询问时及时送上。

在讨论过程中，总理不断启发大家发言，特别是同文件内容有关的部门，总理还指名请他们发表意见。如果遇到对某一重要问题有分歧，或经过讨论、说明，有的问题尚搞不清楚，这项议程绝对不轻易通过，而是请有关部门重新研究后，再提交会议讨论。

审批文件句斟字酌

1952 年在莫斯科，周总理审阅一份有关换聘延聘苏联专家的文稿时，把马列和李越然两位同志找了去，问道：“ 你们说说， 49 加 3 等于多少？ ”一下把他们问愣了。他们两个细细一算才明白，是他们统计的数字算重了一个人头，总共应该是 52，而不是 53。这时，这两位同志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而心里却感到温暖，总理是如此细致，否则，文件一旦送出，连算数都有误，人家岂不笑话。

1961 年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有一次，周总理同粮食部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分省的粮食调拨安排。在印出的表格中，数字相加，发现有 5000 万斤差数不能平衡，一时查不出原因。总理戴上老花眼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笔一笔地计算。过了一会，总理问：“ 当时研究时，给浙江省加上 5000 万斤，加了没有？ ”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是粮食部门的同志漏记了。当即，加上了这笔数，一打算盘，平衡了，这才松了一口气。总理办事认真，工作细致的工作作风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0 年 11 月，周总理在审阅《新华字典》的修订第二稿时，在字典的《出版说明》上，一丝不苟地用铅笔逐句作了圈点。字典《附录》中的《节气表》，没有标明月日是阴历还是阳历。周总理看到后，在《节气表》三字下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写明“ 按公元月日计算 ”。这样就便于查阅了。

1973 年 9 月，北京市起草了一份关于搞好首都防病和饮食卫生工作的报告，送总理审批。总理当夜就作了审批，对报告改得非常仔细，甚至连哪一字哪一句用得是否合适都反复推敲。报告提到要搞好饮食卫生，总理考虑到“ 饮食 ”二字讲得还不具体，就改为“ 厨房 ”。这样，针对性就更强，重点就更明确、更具体了。

有一次，周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有关同志向总理报送去一份宴请计划，其中提到在京专家人数约为 250 至 370 人。总理对在京专家人数了如指掌，他在这个数字上打了问号，并对各类专家具体数字作了计算，在旁边批注：“ 至多 280 人 ”。

周总理在审阅新闻报道时，对报道事实和数字的准确性，要求十分严格。一次，记者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财经预决算报告中的结余数字报错了；有一次，编辑将南海领域的度、分、秒中的一个符号写错了。总理都及时发现，提出了严肃批评。

周总理对有关外事方面的文件、电报尤为细心。特别是对于重要公报、声明、照会和其他公开发表的文件，不仅从方针、政策上反复考虑，就连用语分寸，也要一一斟酌得体，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也要改得准确。他总是用墨笔把有错的地方清楚地加以改正，不容任何失误，以保证文件的质量。总理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极端负责的精神，大家不仅完全信任，而且心服口服。经过修改过的文稿送到中央传阅时，毛主席、刘主席都很少再做增删改动。遇有要对外发表的文件，外交部通常是先得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马上把总理审定稿抄回，先进行翻译、打字，以争取时间。待中央传阅毕，得到通知，就可以很快形成正式文件，准备对外发出。主办起草文稿的外交部地区司在总理改过的文稿退回到司以后，大家照例要认真传阅学习，以便提高水平、改进工作。这就给对外工作建立了一种严肃认真，细致负责的作风。

1970 年底，外贸部起草了一份以总理个人名义邀请一位日本友好人上访华的电报稿。经办同志是用白话文写的，而这位日本友好人士已近八十岁高龄，对中文有很深的造诣。总理审批时，逐句将电文改成古文，文字更加精

炼，也表示了对这位长期努力为日中友好奔走的老人的尊重。把电报稿签发退回来后，大家看着总理修改的毛笔字，无比激动。过了很久，在一次大会上，总理勉励说：“希望同志们提高业务水平、文学水平，不要让我再给大家当秘书了。”

处理问题沉着冷静

在我国准备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前夕，周总理向全体从事原子能事业的同志发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重要指示，并且以他自己的言行熏陶着这支队伍。每次开专门委员会，他总是非常仔细地听取有关专家和负责同志的汇报，弄清每一个关键的问题，经过认真的讨论和科学论证，才下决心。每次核试验时，他总要等现场指挥报告了专家、操作人员和领导同志三结合的研究结果后，才决定是否进行试验。他不但要求核试验本身万无一失，各种应该进行的测量、效应试验都收到应有的效果；而且要求核试验的放射性烟云也万无一失，不仅不会对我国人民，也不会对邻国人民造成损害。因此，他要求现场指挥人员十分注意气象情况，掌握好试验时间。有一次，根据气象预测，放射性烟云有可能在开始流动时即进入邻国上空，周总理命令暂缓试验，让飞机携带核弹在机场等了八天八夜，当气象情况许可后，才进行试验。

试验后，大家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可是，周总理这时已经考虑到爆炸后对人民健康安全的影响和国际影响问题了。敦煌、兰州一带受到放射性污染情况如何？总理很不放心，指示二机部立即去研究这个问题。二机部的同志同放射医学专家研究了一天。在这方面由于我们缺乏直接经验，只能参考国外公布的一些数据加以推断。虽然也怀疑专家对放射性污染的严重程度估计得过分，但事关重大，必须马上向总理报告。在向总理报告时，专家说，根据推断，附近的居民要戴口罩，有些河流的水不能饮用，蔬菜要很好地洗净才能食用，等等。总理问：“根据可靠吗？”专家说：“根据我的推断是可靠的。”总理感到问题太重大了，但是应不应该采取那样的措施还要慎重。他指示先给驻敦煌的部队战士验血，因为他们在最前线，根据他们受到核辐射的剂量的程度再决定下一步措施。经对成百战士抽血化验，结果没有发现异常。后来卫生部各个监测点的数据也证明情况并没有像推断的那么严重。这样，一块石头落了地，总理才放下心来。总理心中装着亿万人民的健康安全，而且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可能发生的问题。当他听了专家的汇报后尽管心急如焚，但还是冷静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从而避免了一场惊慌。

交办工作细致具体

周总理的工作是非常忙的，但对送审的文件电报，从来都是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同时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总参作战部上报的一份文件字写得小了一些，总理亲切地说：“字写得太小，看不清楚，字要写得大一点，要整齐、清楚，实在不行就打印。”

政务院建立初期，铅印的会议文件，经常发生错别字，周总理就提出建立责任制，让会议科的同志亲自校对，并在文件后面印上校对人的名字。这

样就大大提高了铅印的文件质量。总理还要求打印的文件整齐、美观，没有错别字，让人看了心情舒畅，给人一种美的享受。文书科打字的同志们按照总理的指示采取措施，制定制度，定期进行考核评比，提高了打字效率，降低了错字率，提高了油印质量。打印出来的文件既规范，又美观，曾受到总理的表扬。

1968 年，国务院信访室收到一位省领导同志写给周总理的一封亲启信，有关同志报送总理时延误了时间。总理没有批评，而是非常具体地指示信访室如何办理来信的方法。周总理可能认为由于对信件打字或打印份数多，耽误了时间，所以他让秘书告诉信访室：“有的信，篇幅不长，字又清楚，不必打字，要及时送；篇幅长，又有机密性的，可摘要一下，把字写大些，也不必打字；如果有的信还要抄报其他有关人，一般打三份就可以了，一份送我，一份送有关同志，一份存档。这样区别办理，既快又节约。”

总理交办工作时，总是想到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有无困难。 1956 年 3 月 2 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有几位副总理提出请周总理给各部委正在召开的专业会议作一次国内外形势报告。总理计算了一下他的时间安排后，决定四日（星期天）下午在怀仁堂作报告。当场交待国务院会议科立即准备。散会后，个别领导同志和总理仍在会议厅谈事情，会议科的同志便离开会议厅回办公室进行准备；有的与有关部委联系出席专业会议的代表人数；有的与中南海招待科联系怀仁堂会场。这时，总理在离开会议厅回西花厅时，特地绕到会议科办公室问会议科的同志：四日报告会的时间紧了一点，准备工作是不是来得及？有没有困难？会议科负责人告诉总理没有困难，怀仁堂会场没有问题，专业会议代表住得集中，都好通知。总理听后点点头，放心地回西花厅了。

审查方案疏而不漏

1958 年周总理调查长江三峡坝址时，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汇报长江建设规划。开始前，总理先看挂图，一眼就看出船闸上没有桥，就问：“这车子怎么过去？”原来是画漏了。又有一次，一张地质挂图与另一次汇报会上的挂图，画得不一致，总理马上看出来了，说怎么又变了？当即问清了原因。在另一张建筑设置图上，总理看出了问题，指出了错误，但总理不是责备大家，而是严肃诚恳地向有关同志说：“你们画错了，粗糙，有点赶时间吧！”

有一次，总参作战部机关在处理一项紧急工作时，耽误了时间。周总理知道后，亲自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详细地查问了处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对机关层次多、业务不熟悉、作风拖拉，进行了严肃批评。周总理还经常教育大家，办事要有科学态度，要实事求是，不能用“大概”、“差不多”、“可能是”这种含糊不清的词，使用概念要准确。有一次，总参机关向周总理报告情况，提到“江南岸、北岸”，总理立即指出，这个概念不准确，河流走向迂回曲折，“南岸、北岸”不能正确反映地理位置，应该是：“左岸、右岸”。

1950 年，财政部代政务院起草了一个税制改革的通告，送总理审批。总理看了以后把财政部主管税务工作的同志叫去，问他这个通告你看懂了没有。回答说，看懂了。总理说：“光你看懂不行啊，这个通告是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得让群众看懂。你们不是叫我批吗？里面行话太多，连我都看不

懂。”他当场就让去的同志进行修改，然后总理又逐字逐句审改，修改了一些行话，纠正了不妥当的标点符号，才正式签发。

文字表达要准确

1971 年 8 月 10 日晚上，周总理在广州观看了《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颂歌》的演出。演出结束后，总理跟省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省歌舞团的部分同志进行了座谈。一位同志把歌词一段一段地给总理朗读。总理一边听，一边给大家逐段逐句地分析。当谈到《毛主席教咱握紧枪》中的“毛主席教咱闹革命，要刀对刀来枪对枪”时，总理频频点头，表示赞赏。当谈到“杀声阵阵如雷吼，打倒土豪，打倒劣绅，杀，杀，杀！”时，总理问道：“‘杀、杀、杀’改掉了吗？”这一问，对在座的教益甚深：周总理对执行党的政策是多么严谨啊，真是做到了一丝不苟！因为在总理观看演出前的一天晚上，邓颖超同志审查节目。邓颖超同志当时发觉“杀，杀，杀！”这一句歌词不妥，就把歌词带回去请总理审阅。第二天早上，总理来电话指示：“要删去歌词中的“杀，杀，杀！”现在总理非常敏锐地发现歌词原稿中还有这样的词句，于是又一次提醒有关同志注意政策。周总理说：“练兵是可以喊‘杀杀杀’的，对土豪劣绅怎么也都‘杀杀杀！’呢？练兵和打土豪这是两个范畴的问题，是两种不同概念，要有区别。敌人在战场上放下武器，我们还要优待，讲俘虏政策嘛！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杀，杀，杀！’都杀光了，就会变成盲动主义，犯方向路线错误。”

1957 年 5 月 20 日晚上，锡兰（现斯里兰卡）大使为周总理举行宴会。宴会正在进行时，外交部有人给周总理送来了一份印度和锡兰两国总理于 19 日刚发表的联合声明。周总理看了之后，在宴会上讲话时，临时加上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我们看到尼赫鲁总理在访问锡兰时同锡兰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我们感谢他们提到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国际事务，以及强调潘查希拉五项原则的重要性。这说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显示出了万隆会议精神、团结精神。”

新华社记者徐熊同志在编写新闻稿时认为，周总理这番话很有新闻价值，应当成为这次宴会新闻的重点，在导语中突出它。可是，如果把它照搬在导语里，那就会太长。因此，徐熊同志便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商量，用转述的形式，把周总理的话概括成了一句：“周恩来总理今天表示支持印度锡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具体内容放在消息的第二版。

周总理在 21 日看到报上登的这条消息后,立即召见了亚洲司负责人和那位记者。他说：“我并没有讲要‘支持’这个声明，也不能‘支持’这个声明。因为在这个声明中有两点我们是不能支持的。其一是，它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严厉谴责了巴基斯坦；其二是，在反对氢弹问题上，它把带有打破美、英核垄断性质的苏联核试验，同美、英核试验相提并论。”总理还对记者说：“我赞成你打破成规，把最新最重要的事放在导语里，问题是导语中把我的讲话精神弄错了。”他还称赞亚洲司负责人与徐熊共同研究稿子的办法很好，“问题是，不该对我的言论轻易地加上‘支持’这样有份量的字眼。你们没有想过，要是声明同我们主张完全一致，我会不用‘支持’这个字眼吗？我又何必仅仅提到‘我们看到’，‘感谢’它如何如何？”

接着，周总理又对这位记者说：“这事说明，你们还缺乏国际知识，对

世界大事还不能了如指掌。而透彻通晓时势这一点，应是外事记者所具备的。”他还谆谆教导说：“要采访什么学什么”，“遇到复杂问题要经常与行家切磋琢磨。”他并热情地鼓励徐熊：“你们搞时事采访，也是做外交工作，因此要懂得外交工作的艺术，并且为外交工作做出贡献。当然，外交工作和新闻报道，各有各的规律，但是，这两者都要服从我国对外政策。”

既严肃地批评，又热情地关怀

1957 年 4 月，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有一项议程，讨论中涉及到一机部的工作，需由一机部领导同志说明情况。当时担任部长的黄敬同志因事请假，由一位副部长列席会议。这位副部长因分工不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不能当场作出说明。这时，总理问会议科的同志黄部长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回答说黄部长请假了，主持部务会议。总理宣布这个议题暂停讨论，等会议科打电话通知黄部长到会后再讨论。黄部长到会作了说明，这才结束了这项议题的讨论。这时，总理当着国务院全体组成人员的面批评会议科的工作不细致。他说，现在我们党正在整风，会议科也要在这次整风中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今天黄部长请假，事先没有向我报告。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到餐厅吃饭，会议科的同志收拾会场上的文件。总理处理完文件最后一人走进餐厅，等会议科的同志进去一起吃饭。由于会议科受到总理批评，都不想吃饭了，就对服务员说，我们不吃饭了，请总理不要等了。服务员又回来说，你们快去吧，总理说你们不吃，他也不吃。别让总理久等了。于是，会议科三位同志便进了餐厅，看到总理一人坐在一张餐桌旁，把他们的饭都盛在碗里等着。他们坐下来一句话未说，光低头吃饭，也不吃菜。这时总理察觉出他们的情绪不对头，便说不能光吃米饭，还要吃菜呀。说着就往他们碗里夹菜。接着总理提出一个问题，问道：“你们想不想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回答说当然愿意多做工作。总理说：好，你们既然愿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为什么吃饭不细嚼慢咽。像你们这样吃法，把胃口吃坏了，还能为人民服务吗？当一位同志很快吃完碗里的饭，站起来要走时，总理说：怎么吃这么少？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吃得多啊！是不是我在会上批评了你们，在生我的气呀！另一位同志回答说：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影响了总理的工作。总理说，你们的工作量不轻啊，我经常看到你们加班很晚才休息。最近需要提会决定的工作较多，每周开两三次国务会议，给你们增加了工作量，你们要注意身体。总理的几句话说得会议科的三位同志心里热乎乎的。餐桌上的沉闷气氛没有了。总理又说，今天你们有点情绪，我看出来了，为什么？过去你们有说有笑，今天为什么不说不笑呀？这时会议科的同志向总理解释说：今天黄敬部长请假，我们事先请示秘书长批准的。总理一听，爽朗地大笑起来，边笑边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错怪了你们。总理的笑声引起其他餐桌首长们的注意，都回过头来看，并会心地一起笑了起来。

平易近人　广泛联系群众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党形成了一条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它是我们根本的工作路线，也是我们根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

周总理在工作中和日常生活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保持同群众的联系。他平易近人，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群众。他不论到哪里，都反对脱离群众或有碍于密切党群关系的做法。

可不要让我们脱离群众啊

1955 年“ 五一 ”国际劳动节前夕，周总理从国外访问归来抵达昆明。听说“ 五一 ”昆明要举行群众庆祝集会和游行，他便高兴地表示要参加。公安保卫部门得知后既兴奋又担心，因为当时昆明的社会治安状况还不大好。为了保卫总理的安全，他们马上组织力量，连夜把已经搭好的主席台又向后挪了 30 米。

节日那天，当敬爱的周总理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欢声雷动。盛大的游行开始了，人们怀着幸福和激动的心情接受总理检阅。总理也频频招手，向群众致意。但遗憾的是，主席台与群众游行队伍的距离远了些。

事后，总理得知原来是为了他的安全而往后挪了主席台，十分生气，马上找来有关同志，严厉批评说：“ 我们来参加‘ 五一 ’节，就是为了和云南各族人民一起欢度节日，也是借这个机会，同群众见见面，表达党中央、毛主席对云南各族人民的关怀。可你们把主席台往后挪，这扩大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共产党要相信群众嘛。你们可不要让我们脱离群众啊！ ”

晚上，周总理又神采奕奕地来到云南民族学院与各族师生员工联欢。学员们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迎到礼堂前面放置沙发的地方，请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就座，观看各民族学员的歌舞表演。可是，总理却绕过沙发走到石阶中间，微笑着向大家招手，亲切地说：“ 同志们，大家都坐到一起来吧！ ”各民族师生最初有些拘束，总理看出大家的心情，爽朗地笑着，再一次向大家招手说：“ 来呀！来呀！都到这里来坐吧！ ”师生们一下拥到了总理的周围。总理和大家坐在石阶上，一边观看表演，一边问这问那，谈笑风生。晚会结束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总理还亲自到学员宿舍里视察，亲自数数床位，摸摸学员的被子，看看床上的垫褥，向学员问寒问暖，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加强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边疆作出贡献。

工人可以在这里，我有什么危险呢

1959 年 10 月 15 日，周总理到包钢为一号高炉出铁剪彩。当时一号高炉刚刚建成投产，现场有的地方还在施工。为了总理的安全，事先安排好了一条参观路线。但是总理看见哪里工人多，哪里忙碌，就上哪里去。陪同的同志劝总理离得远一点，总理说：“ 工人同志都在这里嘛！工人同志可以在这里，我有什么危险呢？ ”周总理还是坚持来到高炉前，视察高炉的生产情况。总理在满身矿粉、满脸汗水的工人中愉快地和大家打招呼，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族职工纷纷同总理攀谈起来。

1959 年 6 月 6 日，周总理到河北省井陉煤矿视察。在视察洗煤厂时，煤楼内煤粉飞扬，煤水四溅，楼梯既陡又滑。总理不顾人们劝阻，徒步走上洗煤楼，同正在操作的工人亲切握手，细致观看了洗煤机的运转，一再嘱咐工厂领导要搞好安全设备，保证安全生产。

1958 年 10 月 17 日深夜十二点多，周总理到北京钢厂新建炼钢车间视察。在冲天炉前，正赶上过铁糟坏了，炉膛向外突突地喷火，铁花四处乱溅。同志们怕出危险，劝总理离远点。可是周总理不但没离开现场，反而走过去，询问发生事故的原因。然后，他对陪同的同志说：“ 领导干部要到基层蹲点。机关干部要下来，帮助工人过技术关。 ”他建议组织工人、技术员成立攻关小组，消灭类似事故。他还把电话号码留下，让工厂把攻关情况及时向他汇报。接着，总理手扶铁栏，脚踏铁梯，登上了六米多高的转炉操作平台。他紧紧握住工人的手，认真问着生产情况。深夜一点多钟了，总理才结束视察。哪知道，总理回去后，还在想着钢厂的事。两个小时后，总理又让他的秘书打电话说：“ 总理刚才有几句话忘记跟你们讲了，写在纸上，这就派人送去。”凌晨三点多钟，打开周总理的信，那苍劲有力的墨笔字映入眼帘：“ 请北京钢厂注意：组织力量，掌握技术，加强协作，消灭事故。周恩来 1958． 10 月． 18 日。 ”

农民在哪里劳动，咱们去看看

1958 年 1 月 6 日，周总理到安徽肥西县肥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总理一下汽车便问：“ 劳动力都在做什么？ ”社主任候守伦指着村北的方向说，都在那边大坝工地上。总理兴致勃勃地说：“ 我们到工地上看看。 ”就在这数九寒天里，总理举步在大坝埂上，同三百多个社员见面。总理握住一双双沾满泥土的手，亲切地说：“ 同志们，辛苦了！ ”并和社员们拉起家常。

1958 年 4 月 24 日，周总理到河南陕县大营农业社视察。他一下火车，不休息就向棉田走去。总理向农业社社长陈启生问道：“ 社员们在地里做啥？ ”回答：“ 间苗哩！ ”周总理便走到社员跟前，仔细地看社员们剔苗，并询问间苗的距离。接着，周总理也蹲下来和社员们一起间苗、定苗。他看到有的叶子发黄，便问是什么原因，还询问种上多少天了，种的是什么品种，以及浇水、施肥情况。社长回答时，总理听得很仔细，并对旁边的工作人员说，好好记记。听说这里正在修水库，总理一定要到工地上去看看。他来到一个有十几米深的大沟旁边，陪同的同志让总理在上边看看就算了，可是总理却非要到沟下边去。这里社员们有的拉土，有的打夯，夯歌声和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周总理看到这动人的场面，非常高兴，便对旁边的省委负责同志说：“ 看，他们的干劲多么大！ ”总理看到有许多女青年也在打夯，便称赞说：“ 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样干！ ”说着， 拿起一个铁杆子和社员一起夯土，干部和群众受到极大鼓舞。这时，社长请总理给水库起个名字，总理想了想，说：“ 就叫胜利水库吧！ ”他在社长的笔记本上亲笔题了“ 胜利水库 ”四个大字。工地上的其他社员听说周总理来了， 马上都聚拢过来，一片欢腾，一个劲鼓掌欢迎。周总理向大家招手，高兴地向大家说：“ 你们干劲大，我已经给水库起了个名字，叫胜利水库，祝你们胜利！ ”这时，掌声、欢呼声响彻整个工地。

1965 年六、七月间，周总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参观了烽火公社

肖尔瓦克管理区二大队。总理看了维吾尔族社员建设的平展展的条田，整齐的林带和水渠、道路，访问了白杨树下、葡萄藤中的一排排新居民点和社员家庭，周总理来到果园，走到正在劳动的维吾尔族社员跟前，和他们握手，一起坐在苹果树下促膝交谈。从葡萄剪枝问到果树品种，从生产情况问到社员家庭生活。周总理笑容满面地和正在为葡萄剪枝的维吾尔族老人买买提阿洪握手，问他多大年纪。回答：“八十五岁了。”总理看见他患有甲状腺瘤，就用手轻轻抚摸老人的脖颈，关心地问：“你患这种病有多少时间了？”买买提阿洪说：“已经几十年了。”周总理嘱咐身旁的干部说，要把这种病认真研究一下，抓紧治疗，还要做好预防工作。

你们能住，我就能进

1962 年，周总理到大庆视察工作时，在大庆北二注水站，看到几个工人正在抢修水泵，就走过去跟他们握手。有个工人手上沾满油污，想往身上擦一擦，可是周总理一把就抓住了他那油手，紧紧地握起来，和蔼地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接着又同围在身边的同志拉家常。走出泵房，周总理看见前面有一个地窝子，指着问：“这里住人吗？”同志们回答：“住人！”周总理要进去看看，有个同志说：“总理，地窝子太矮，不要进去了。”周总理说：“你们能住，我就能进！”这个地窝子，里面高不过五六尺，很简陋，可是总理走进去了。总理在里面看了看，说：“现在简陋，以后会逐渐好起来。”1966 年春天周总理到大庆时，周总理走进灰尘飞扬的弹花房，同大家亲切交谈。总理问一个家属：“你老家在哪里？”她说，在河北邢台。总理说：“邢台地震了，你家怎样？”她回答：“有毛主席、党中央关怀，政府给救济，帮助盖房子，现在很好！”总理放心地点了点头。

一有空就到群众中去

周总理外出期间，在住地只要一有空，就到群众中去。那是 1957 年夏天，周总理陪同毛主席到青岛市。他的工作虽然很忙，但一有空就深入到群众中问寒问暖。他经常到警卫人员中和大家谈话，不止一次地到伙房向炊事员问候，表扬说：“你们做的饭菜很好，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一天中午饭后，负责警卫的同志回到宿舍，有的在睡觉，有的在聊天。这时，周总理慢步走了进来。大家高兴极了，有的忙着下床，有的忙着给总理搬凳子，请总理坐下。周总理亲切地说：“你们不要动，我是随便散散步。”接着关心地问大家：“晚上睡觉有没有蚊子？是不是都挂上了蚊帐？”还说：“天气热，你们很辛苦。”

1958 年 7 月 15 日，周总理在上钢一厂视察工作，中午在职工食堂和工人同志们一起吃饭。这时，食堂外面很多工人闻讯来看周总理。周总理看到工人们晒在太阳下，亲切地笑着说：“同志们辛苦啦，天气太热，快回去休息吧。”工人同志们回答：“没有关系，我们来看看总理。”有的同志要求和总理握手。总理就一手捧着饭碗和筷子，挨近窗户与同志们握手，这时多少双长着厚茧的手，沾满油腻的手，凝结着钢花气味的手，一齐伸向周总理。总理手中的饭凉了，走了一圈又一圈，一一和工人同志握了手。这动人的情景，怎么不使人思潮起伏，激情奔腾啊！

1960 年 5 月，周总理同贵阳人民一起欢度了“ 五一 ”节。他参观了工厂，访问了公社，到工人和社员家里了解情况。总理每到一处，都出现万人争看总理的动人场面。有一次，总理到贵阳河滨饭店吃晚饭，被贵阳的市民发现了，一传十，十传百，不多一会儿，成千上万的市民从四面八方拥到饭店周围的街道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不停地喊：“ 总理——您好！总理——您好！ ”强烈要求见见总理。那天总理在贵阳参观了整整一天，已经累了。但一听到市民们的欢呼声，总理立即放下碗筷，来到门口同市民们见面。那时正在下雨，总理走到饭店门口，踩上警卫人员临时递过来的方凳，站在一张露天的桌子上，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向市民们致节日问候，市民们报以春雷般的掌声。雨越下越大，工作人员急忙撑起一把临时找到的红雨伞，给总理遮雨。总理推开雨伞，连连说：“ 不用，不用。 ”这时，站在后面的市民高喊：“ 我们看不见，请总理站高一些！ ”于是，总理又站在一个高台上面，频频向市民们招手致意。市民们不停地欢呼、鼓掌，站在雨天里久久不愿离开。

1962 年 6 月 16 日，周总理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视察了铸造、总装配、发动机等车间，总理每到一处，都和围上来的工人同志们握手、交谈。但是，还有许多汽车工人是多么想见见敬爱的周总理啊！周总理很理解群众的心情，徒步来到汽车厂一号门前，等候在门前广场上和马路两旁的工人见到周总理，立即沸腾起来，都想亲眼看一看总理。陪同人员担心总理的身体疲劳，总理含笑说：“ 大家想见我，我更想见工人同志们！ ”于是，周总理便站到台阶上，尽量和更多的工人见面。当人群涌向总理时，一个工人跌倒了，周总理看到，心里十分不安，回到住处，特意让秘书打电话到厂里，问那个工人受伤没有。第二天，厂里领导同志到周总理住处，总理又关切地问起那个工人的情况，并说要是受伤了，我这儿有医生。厂领导同志回答说没有受伤，总理才放了心。

在视察装配线时，同志们请周总理坐坐解放牌汽车，总理同意了并亲手去开车门。司机杨春余见总理要上车，马上摘下帽子去擦坐垫上的灰尘。总理连忙制止并亲切地说：“ 戴上帽子开车。 ”车停下后，总理亲切地和杨春余握了手，打开车门，站在脚踏板上，双手叉腰，自豪地对大家说：“ 我坐上了我们自己的解放牌汽车了！ ”

没关系，你们的手不脏

1955 年 5 月，周总理在西安参观碑林休息的时候，总理来到办公室，由于事先不知道，茶水、茶具都没准备，接待同志只好把办公室日常用的旧茶壶、茶杯拿来，给总理倒了一杯水。总理接过来，毫不介意地边喝水边和大家亲切地谈话。

1958 年 4 月 21 日，周总理到三门峡工地调查，看到有一队修路的民工正在路边吃饭休息。总理便向他们走去，详细地问他们一天吃几顿饭等情况。民工们这时都纷纷围拢过来，一边吃饭一边和总理聊起天来了。这一天，民工们吃的是掺有红薯面的馒头。总理从一个小伙子手里随手掰了一块馒头。放到嘴里尝尝，乐得大家亲切地笑了起来。几十双眼睛注视着总理尝他们的红薯面馍馍，觉得总理和他们是多么亲近！

1956 年 5 月 6 日，周总理到太原钢厂视察。当总理来到高炉现场时，

岁的二号高炉值班工长史悠国，一身煤尘来不及拍打，满手油污来不及擦洗，总理热情的手已经伸到他的面前。史悠国看看自己的手，一时有些不好意思，总理说：“小伙子，没关系，来。”总理紧紧握住史悠国的手，和他亲切交谈。

1958 年 7 月，周总理坐船到广东省新会县周郡公社，上岸时和干部、群众亲切握手。这时，有几个社员从广州运肥回来，有个社员怕自己的手脏，躲到人群的后面。总理发现后，主动走进人群和他紧紧握手。后来发现还有两个看牛小孩，总理又立即走过去和他们握手。在场的群众和干部，无不感动。

有一次，周总理在东北一钢铁厂视察，迎面遇到一个满身污垢满手油腻的轧钢工人。总理微笑着向这位工人走去，要同他握手。这个工人一看急了，双手紧往身上擦，可怎么也擦不干净。这时，总理明白了这位工人的心意，便抢上前去，同他握手。这位工人犹豫了，忙说：“总理，手太脏！”周总理立即说：“不，工人的手最干净。”说着，就紧紧地握住了那双油腻的手。

1963 年 9 月，周总理亲临《中国青年》杂志社参加创刊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志们知道总理要来，就在门口等候。总理下车后，和大家一一握手。其中有一个同志因患肝炎，当总理来到他面前要同他握手时，这位同志行了个合手礼，说：“我有肝炎。”总理回答说：“哪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同那位同志握了手。

1965 年 7 月 2 日，周总理视察喀什棉纺厂后，回到住所。这时，外边又来了三个青年人，因为当时工作高不开，没有见到总理，感到很遗憾，想见见总理。周总理立即高兴地说：“好啊！”并走到门口招呼他们进屋里坐，三个青年中有个叫于淑华的，干完活没洗手就来了。她见总理伸过手来，赶忙擦手。总理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们的手不脏。”于淑华紧张的心情立刻消失了。总理同他们进行了交谈。

1964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泮溪酒家点心师罗坤在广东迎宾馆为宴会制作点心。宴会结束后，周总理满面笑容，高举酒杯说：“同志们辛苦了，大家来干一杯吧！”师傅们都有点不知所措了。总理向每个人敬了酒、干了杯后，随即伸出热情的手，要同师傅们握手。师傅们手上正沾着油渍和面粉，就使劲在围裙上擦。总理抢过师傅们的手就握，连连说着：“不用擦，不用擦，不要紧嘛！”总理和每个人都握过手以后，说：“十分感谢大家，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1966 年 3 月，周总理在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有一天，总理在巨鹿县何家寨村头的帐篷里，和干部群众座谈。那天，风卷着沙，沙裹着风，帐篷上下掀动，碗里刚倒上的水，就落上一层尘土和草叶。总理毫不介意，端起粗瓷大碗，轻轻吹了吹上面的尘土和草叶，便喝了下去。4 月 1 日，总理来到宁晋县东汪公社临时医院，在一连慰问了 140 多名伤员之后，大家请总理到一个棚子里休息。群众煮了开水，支部书记董保顺捧上一碗开水敬总理。由于地震的影响，加上刮风，水里有泥沙，水面有草。总理接过水来时，工作人员怕水不干净会影响总理的健康。用眼睛示意总理不要喝。但总理毫不犹豫。端起水碗大口地把水喝完。在场的群众看到总理和他们同甘苦，共患难，深受感动。董保顺同志把总理喝过水的碗，用一层布一层红绸子精心地包好珍藏起来。现在这个碗已作为珍贵的文物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访问工人家属

1956 年 4 月，周总理到辽宁省鞍钢视察了几个大厂后，特意到鞍钢工人家属模范、街道干部王秀兰家访问。那天傍晚，周总理坐在炕沿上，喝着白开水，和王秀兰象一家人似的亲切交谈。总理发现这个街道很偏僻，就问离商店有多远，针头线脑上哪买，吃水方便不？王秀兰说都方便，总理才放心。这时，外面不少小孩扒窗看，总理就问王秀兰有没有小孩？王秀兰说：“没有。”总理说：“你知道，我也没有小孩，外面这些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好好培养革命后代。”交谈一个多小时，最后，周总理说：“你们街道干部做千家万户的工作，很辛苦。我向你们学习。我们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一年后，省委负责人到北京开会，总理还关切地问：“听说鞍钢的王秀兰有病，请替我问候她有啥困难没有。”

1962、 1963、 1966 年，周总理三次视察大庆，共视察了 29 个基层单位，同数万名工人、干部和家属直接见面，同许多人亲切握手、谈话。周总理来到 1202 钻井队，在钻机的轰鸣声中，健步登上钻台，仔细询问设备情况，认真观看工人操作。泥浆溅在身上，也毫不在意。1966 年 5 月 3 日，周总理来到丰收村家属们劳动的地头和大家亲切交谈，他握着家属们一双双沾满泥巴的手，挨个问他们是哪里人，来大庆多久了，什么时候参加生产的。当总理听说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时，就高兴地用毛主席的话来鼓励人家：“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周总理看见家属们正在种玉米，就问她们种了多少地。总理还蹲到地上，用手扒开土，看播种得多深，株距多远。接着，周总理又视察了这个工农中心村的作坊、商店、文教卫生和服务设施，访问了工人家庭，指示要坚持工农结合，城乡结合，逐步缩小三大差别。

访问农民家庭

1957 年 9 月，周总理到杭州梅家坞大队视察茶叶生产以及供销社、学校、幼儿园、食堂，还访问了社员家庭。周总理走进郑秋兰老奶奶家，拉着郑秋兰的手话家常。总理走到堂屋看见桌上放着许多饭盒，就问郑老奶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饭盒？回答说，社员们正在修水库，她儿子是操作组组长，全组的中饭由她集中送到工地去。周总理听了说：“喔，原来是这样的。”说着把饭盒打开看一看，叮嘱郑老奶奶说：“饭要及时送去，社员修水库，出力气，吃了冷饭不好。”三年后，周总理又来到梅家坞。他还记得郑秋兰的家，当他跨进郑秋兰家门时，见到她和她的老伴翁双全正在家里，周总理亲切地和翁双全握手，笑着说：“我是老客，来过你家，老奶奶可以作证，对吗？”全屋的人都笑了。这次周总理还参观了郑秋兰的猪栏。当总理看到五口肥壮的肉猪，高兴地说：“今后要多养猪，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

1958 年 1 月，周总理到安徽省肥西县肥光高级农业社视察。在从大坝工地回来的路上，周总理对社主任侯守伦说：“再到社员家里看看。”社主任就顺手向总理介绍了身边的女社员李延英说：“她劳动好，一家生活过得不错。”周总理立即和李延英攀谈起来，从生产劳动到衣食住行，都一一问到了，并说：“那就到你家看看去吧。”

周总理跨进了李延英家那三间茅草屋内，仔细地察看着屋内的陈设：柜子上放着新热水瓶、闹钟，床上新置的棉被、花布床单，屋梁上还挂着一只沉甸甸的竹篓子。总理问：“你家里可有咸菜。”李延英忙说：“有，有。我家腌了两坛咸菜。”总理笑着摆摆手说：“我问你家腌了多少鹅、鸭？”李延英也笑了，她笑自己没有听懂总理的话，赶忙回答：“有。腌了十一只咸鸭，吃了两只，还有九只。”李延英正要去取下篓子给总理看，总理叫她不要拿了，他自己走上前去，用手掂了掂篓子，说：“是不少。”还指着这篓子风趣地说：“你们这里叫它‘猫叹气’吧？”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周总理还走到门外，看了李延英家喂的一口大肥猪，并对在场的干部和李延英说：“要多养猪，支援国家建设。”临走时，总理对社主任说：“农业社要把社员生活安排好。”

1958 年 4 月 24 日，周总理到河南省陕县大营农业社视察，总理在田间、工地转了一个大圈后，一进村，就到了农业社的牛棚里。看到滚瓜溜圆的黄牛，总理对饲养员刘会同说：“你的牛喂得真好呀。”刘会同这个扛了半辈子长工的老贫农，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周总理进了社员朱素妙老大娘的院子里，首先看了厨房，揭开锅盖看了看，称赞院子和厨房很干净；还掀开柜厨看看社员的存粮，满意地笑了。朱素妙老大娘请周总理坐，周总理一定让她先坐下来，自己才坐下，叙说起家常来。

1961 年，周总理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村蹲点做调查工作时，近千名群众云集在街道两旁。总理健步来到群众之中，一面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一面和身边的群众握手。女社员郭仙娥走近周总理，随行人员介绍后，总理握着她的手，亲切地问道：“你家在哪里住？去你家看看行吗？”郭仙娥激动地说：“好，好。”便引着周总理往她家里走。周总理走进屋里，见炕上躺着一个人。郭仙娥向总理介绍说：“那是俺小孩他爹，有点病，耳朵还有点聋。”说话声惊动了郭仙娥的爱人王连生，他睁开眼一看，见屋里站满了人，不知是咋回事。他的大女儿贴近他耳朵说：“周总理来了”。王连生一听周总理来了，兴奋地连连说：“总理快坐！快坐！”他一边说一边到炕沿边准备穿鞋。他伸手从地上拣起一只鞋就穿，这只鞋还没穿好，周总理弯腰从地上拣起另一只鞋，递到他手边。这个旧社会没有穿过一双新鞋，今天周总理亲自给他拿鞋的普普通通贫农社员，激动得半晌才说：“总理辛苦了，我们贫下中农欢迎您。”周总理握着他的手，怕他听不见自己的话，便提高声音，问他身体怎样，找医生看了没有，吃什么药，一再安慰王连生要安心养病。

在伯延村的座谈会上，周总理认识了一位年近五旬的社员张二廷。座谈结束后，周总理特意来到张二廷家访问。一进门，总理十分亲切地招呼：“二廷，二廷，在哪屋住？”二廷急忙迎到院子当中说：“周总理，快到屋里坐。”总理说：“以后不要叫我总理，叫我老周就行。”一边说，一边拉着二廷的手，一同走进屋内，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拉起了家常。第二天上午，周总理一个人又步行走到了张二廷家中，进了门就招呼：“二廷，二廷……。”可是没人应声。总理见门开着，就走进屋内，发现张二廷因劳累在炕上和衣睡着了。总理轻轻拍拍他的腿，说：“二廷，二廷，累了吧，今天下午咱还开会，你准备参加。”当二廷急忙起身，要挽留总理再坐一会儿时，总理已经走出屋门，还关切地回身说：“我不多打搅你了，休息吧。”

周总理多次到二廷家访问，了解到二廷头年失去了妻子，一个人带四个孩子，要料理家务，又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生活确有许多难处。总理就跟

二廷商量：“四个孩子你照管有困难，如果你愿意，我帮你抚养两个，长大了再让他们回来，你看行不行？”二廷打心眼里高兴，但想到总理日夜为国家大事操劳，不忍心再给总理增添麻烦。

周总理在伯延村的六天里，召开了公社、大队干部调查会，深入到集体食堂、商店、农机站，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家庭，调查了解当时公社情况和社员情况。

1962 年，周总理到铁岭县平顶堡公社地运新大队视察。从一户社员家出来，门口正围着一帮小孩，总理俯下身问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你认识我不？”小小子瞪着天真的大眼睛说：“认识，你是周恩来！”总理抚摸着小朋友的头顶。爽朗地哈哈大笑，连说：“对，对！这回我也认识你啦！”社员们边笑边说：“咱们周总理和庄稼院的大人小孩都不见外呀！”

访问商业职工

王府井百货大楼是解放后北京新建的第一座大型百货商店。1955 年 9 月，在百货大楼开幕的前夕，周总理亲临视察，他询问了职工队伍的情况，当看到绝大部分职工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人时，非常高兴。他看到老职工不多，就笑着对商店领导同志说：“象我们这种岁数的人，百货大楼都不要了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商店领导干部向周总理介绍了呢绒部老职工刘志泉。总理到呢绒百货场，就在为顾客裁剪料子的案子旁边，和刘志泉拉起了家常。职工们给周总理搬来了凳子，总理看到大家都站着，坚持不肯坐下。他和刘志泉从解放前谈到解放后。从思想、工作、一　直谈到家庭。刘志泉最不能忘记的是，周总理在详细了解了他一天的作息情况后，关切地问他：你每天下班很晚，回家时谁给你开门？这是职工的切身问题，又是一个连普通基层干部都容易忽略的问题，可是，管理国家大事的周总理却想到了。

与干部战士同娱乐

1966 年 6 月 30 日，周总理不顾旅途的疲劳，到某部导弹发射试验基地视察，和基地广大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儿童见了面。当天参观了导弹发射。导弹发射成功了，总理站起来鼓掌表示祝贺，鼓励大家努力争取新胜利。吃饭的时候，周总理端了一杯酒和一盘切成片的苹果到伙房，向全体炊事班的同志祝酒，不会喝酒的吃一块苹果。总理说：“让我们共同为实现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晚上，周总理来到群众之中，与干部战士同娱乐。总理亲自打拍子，与大家一起高唱《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歌声响彻整个试验区。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1961 年 4 月，周总理在云南西双版纳，十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他来的第二大早上，就到澜沧江畔观看赛龙船和放高升。他穿着对襟布扣的白衫和大腰身的咖啡色裤子，头上扎一根水红色包头巾，一身地地道道的傣族装束。四月十三日，泼水节那天早晨，周总理来到曼厅寨视察，看到一群傣族农民在荔枝树下跳象脚鼓舞，他便接过一只象脚鼓，和农民合着拍子一

起跳起来。在开始泼水的时候，周总理和各族群众都用一根柏枝条蘸着银碗里的水互相洒。傣族有个风俗，泼水节水泼得越多，越热烈，就表明彼此越亲热，越尊敬。各族群众觉得只用柏枝蘸水洒，还不能表达对周总理的感情，于是就改用大盆来泼水。总理的警卫人员担心首长的健康，就用雨伞去挡水。周总理立刻要他把雨伞收起来，并说：“不要紧的，要到群众中去，和大家一样。”总理放下银碗，拿起一只脸盆，把一盆盆清水向群众泼去。大片大片的水花在天空飞舞，晶莹的水珠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一道道彩虹，把周总理和各族人民紧紧地联在一起。

1962 年 6 月 23 日，周总理冒雨到吉林省延边自治州，看望朝鲜族社员。总理到了社员金再洙家里，按朝鲜族的习惯，进屋就脱鞋上炕，盘腿坐下。人们拿出招待尊贵客人的花坐垫请总理坐，总理摆摆手表示不用，翻译同志告诉他这是朝鲜族的风俗习惯，客人不坐，会使主人扫兴。总理亲切地笑着说：“尊重，尊重。”说着就拿来坐下，和社员们攀谈起来。这时，外屋传来一阵开心的笑声，总理也站起来凑了过去，问是什么事这样高兴，一看原来是邓颖超同志正和妇女们在厨房里谈笑着，学着拉烧火的风匣呢！总理也兴致勃勃地掀起明光锃亮的铁锅盖，连声夸奖炊事用具洁净卫生，还询问造这种锅的铁料够不够？周总理的来临，给山村带来一片欢腾。晚上人们弹起伽倻琴，敲着长鼓，唱啊，跳啊，热情地歌颂党和毛主席对少数民族的关怀。

支持爱护服务人员

周总理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在北京，北京饭店、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是总理接待宾客的主要场所。每当遇到服务员、理发员，总理总是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叫出对方的姓名，热情打招呼，问长问短，亲如一家。人民大会堂女服务员刘桂兰同志结婚时已 28 岁，总理知道后，点头赞赏，并表示一定要参加她的婚礼。刘桂兰结婚那一天，总理和邓大姐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东厅，赠送新婚夫妇一束鲜花。婚礼开始了，大家请总理讲话。总理笑咪咪地说：“大会堂的服务员响应号召，实行晚婚，这样很好。今后哪位服务员也是 28 岁以后结婚的，不管是谁，我都要来参加婚礼。”总理的话音刚落，参加婚礼的人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1958 年成都会议期间，一天早上，服务员张谊贤听说毛主席请周总理早饭后去研究工作，就连忙到厨房去端饭菜。她刚把早餐送到门口，就碰上周总理跨出门来。小张请总理吃饭，总理说：“我不饿，我到主席那里开了会回来再吃。”小张立即意识到是自己把饭送迟了，心里非常难过，赶忙请人把总理的早餐送到毛主席那里去。周总理还是未吃。小张心里多么内疚啊！她伤心地哭了好久。中午，周总理沿着林荫道从毛主席那里健步走来了。老远见到小张正等在门口，就亲切地叫起来：“小张，听说我没吃早饭，你把眼睛都哭肿了吗？我有事嘛！中午我多吃一点补上好不好？别哭别哭，来来来，我们照张相好不好！”小张听说立即高兴得跳起来，连声说：“好，好，好！”说着，周总理就象慈父般地把小张牵到自己身边，合照了一张相片。

一天下午，招待所花工肖光才正在路旁的袖子树上搞嫁接，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叫：“师傅，休息了吧！”老肖回头一看，啊！是周总理。这突然来到的幸福，使他不知所措，慌忙爬下梯子。总理连说：“慢点，慢点。”已把手伸上去握着肖光才满是泥污的手了。接着，便象老熟人一样，和他谈起

家常来。

1962 年总理到长春视察工作，住在南湖宾馆，服务员刘忠耀肤色黝黑健壮，总理亲呢地称他小黑同志。1963 年周总理再次来长春，又住到南湖宾馆。当来到餐厅时，一眼就认出了小刘，主动把手伸过去和刘忠耀同志握手，高兴他说：“小黑同志，一年了，你还在这里工作哪！”当时，小刘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总理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领导重任，每天不知要接触多少人，却还记得自己这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服务员！总理临走那天，又和楼里的每个服务员握手告别。当时刘忠耀执行任务没有在场，总理就对别的服务员说：“我要走了，来不及和小黑同志告别了，请你们代我转告他一声吧！”

云南昆明服务员马丽雯曾在总理来昆时多次做过服务工作。 1972 年，总理再次来到昆明住地，四下一看，不见小马，便问：“小马呢？”当了保管员的小马知道总理问她，很快前来看望总理。

周总理非常尊重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们的劳动。他削的果皮，从来是放在一起，方便服务员收拾。每次宴请外宾后，总理总是亲切地对全体工作人员说：“同志们，辛苦啦！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我敬大家一杯酒！”总理同大家告别时，发现一位炊事员同志没有来，便说：“我还不走呢，大师傅还没来呢！”炊事员同志顾不得解围腰，急忙赶来和总理告别，总理这才离开。

1964 年 3 月，周总理在广州山庄旅舍接见电影演员。东方宾馆服务员刘英被派到那里当服务员。当时小刘刚从农村出来参加工作不久，第一次见到敬爱的总理。当她给总理斟茶时，总理看出她工作生疏，心里紧张，就和蔼他说：“不要紧张，慢慢来。”随后，就象亲人一样跟小刘拉家常。总理见小刘不大会讲普通话，就用广州话跟她攀谈。客人走后，小刘和小金收拾桌面上的东西，总理在旁说：“不必忙着收。”他从盘子上拣起两个大苹果：“来，你们每人吃一个。”总理对小刘说：“你是南方人，喜欢吃甜的、粉质的，给你这个红苹果。”总理又递给小金一个青色的苹果：“你是北方人，喜欢吃脆的、酸味的，你吃这个吧。”小刘和小金手里捧着苹果，心里又感动又惭愧：总理多么细心和在行！自己是服务员，招待客人时，考虑得还没有这么周到哪！

我们都是服务员，我是总服务员

1960 年，周总理陪同外宾到南京参观。在宴会上，周总理热情接过服务员端来的菜和餐具，主动地为客人分菜，并十分自豪地说：“我是总服务员！”还反复地对服务人员说：“我们虽然分工不同，但都是为革命，我们都是同志。”又说：“服务工作很重要，你们要好好干啊！”

周总理经常协助服务员工作。服务员为外宾削苹果，他也帮助削；为外宾递烟，他就帮着擦火柴。有时他拿着他削好的苹果，对服务员开玩笑说：“来，来，来，同志，请检查一下质量，看符合不符合要求？”过去，给外宾上菜有一定规矩，因此每逢上菜思想上很紧张，总怕把油汤滴在外宾身上。周总理最了解服务员的心，关切地说：“不合理的规矩可以改嘛！今后你们上菜从自己人这边上，油汤滴在我们身上没关系。”

1961 年夏天，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有一次同服务人员亲切谈心。周总理问大家：“你们知道服务员倒茶有什么意义吗？”经他这

么一问，服务员同志们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都楞住了。于是，周总理就微笑着说：“这里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服务员主动热情地招待外宾，外宾往往把它看作是我们国家对他们的尊重、有礼，有时候比我们说几句话还有效。所以，你们一定要从业务里看政治，把政治和业务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旁的陈毅副总理也说：“你们决不能轻视服务工作，你们是服务员，我们也是服务员，是‘大服务员’，我们大家都要把服务工作做好，这就是政治。”

1965 年，周总理陪同外宾在长江轮船上，航行了三天两夜。一天晚上，江风阵阵，细雨濛濛。周总理从舱内缓步走出来，问周围的服务员，船上有什么文体活动。女服务员叶龙春回答、可以打乒乓球。总理高兴地说，好，你领我去。小叶陪总理进了乒乓球室，只见两张乒乓球桌各自东西，上面堆放着不少书报、杂志。小叶要总理先歇一会。周总理微笑着，亲自动手同小叶一起搬书报，拼桌子，安球网，接着同服务员打了一会乒乓球。然后，总理又回到舱内继续工作。

向放牛娃问路

1961 年 9 月的一天，周总理在党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下庐山去南昌途中，路过周家湾，走到一个三岔口，随行人员不知向哪个方向走。眼看前方不远处，站着一个农家小姑娘，周总理便上前请她当“向导”。周总理拉着这位小姑娘的手边走边问，从她的姓名、年龄，问到她干什么活。当周总理知道她叫周桂花，是个放牛娃时，风趣地问：“小姑娘，你是放黄牛呢，还是放水牛呢？要是放水牛，还可以骑在牛背上嘛！”一路上，小姑娘和总理亲密无间叨个不停。一会儿，到了观音桥。在庙边休息时，周总理拿过湿毛巾，把小桂花的手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递给她一个大苹果。小桂花接过周总理给她的苹果，快活极了！接着，周总理又和光着脚丫的小桂花一起照了像，并问：“小桂花，你家住在哪里呀，我到你家看看好吗？”桂花手一指：“就在前边！”周总理来到这个普通的社员家里，亲切地问寒问暖，和小桂花的爸爸周时中攀谈起来。

同少年儿童在一起

1957 年 6 月 1 日的下午，北京市少年宫在景山公园举行盛大的少年儿童游园联欢会。下午三时左右，周总理到景山公园，看望孩子们。他事先没有通知，当游园指挥部的同志闻讯后高兴地赶到东门迎接时，总理已经来到景山脚下。他边走边亲切地询问游园的规模，详细地了解孩子们的活动情况。

在景山顶上的万春亭中，总理听取了少年宫负责同志的介绍和汇报。这时，山下不时传来阵阵孩子们欢快的歌声、笑声。周总理指着在松林中欢腾雀跃的孩子们说：“你们担负着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任务，很光荣。你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孩子们，要按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让孩子们在德、智、体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

周总理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园。孩子们沸腾起来了，五名红领中代表，奔跑着上山来欢迎总理。总理和他们一一握手，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上什么学校，读几年级。在半山腰一棵白皮松树下，总理和五个孩子一起照了相。接着，总理又亲切地问孩子们记不记得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怎样教导你们

的？五个孩子齐声回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周总理高兴地点点头，勉励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在孩子们和少年宫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总理来到山下。游园的孩子们见到周总理走过来，都高兴地欢呼起来：“总理来了！”“总理来了！”节目也顾不得看了，游艺也顾不得玩了，紧紧地簇拥着周总理。

周总理亲切地对孩子们频频招手。

周总理来到少年宫“国际礼品展览室”，观看了这里陈列的许多国际友人赠给北京少年儿童的礼品，亲切地对少年宫的负责同志说：“要对孩子们进行国际主义教育，让他们从小知道支援世界人民革命的道理。”

从展览室出来，周总理站在刘胡兰纪念亭边，仔细地端详着刘胡兰烈士的半身塑像。塑像底座上写着毛主席题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红色大字。少年宫的同志汇报说：“少先队员们常常在这里集会，缅怀革命先烈，学习革命英雄。总理听后，满意地点点头说：“这很好，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当总理来到院内游艺区时，看见几个孩子正在聚精会神地“钓鱼”，便轻轻地走近他们，兴致勃勃地观看孩子们游戏。过了一会儿，总理也和孩子们一起玩起“钓鱼”的游戏来。周围的孩子们都围拢过来看周总理“钓鱼”，欢乐地鼓掌。

最后，周总理来到体育场。总理看到少年宫的体育场很宽阔，就关切地说：“你们在市内有这样一个体育场很不容易，应当多组织一些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周总理一直关怀着孩子们的成长。此后，他又多次让邓颖超同志代表他去少年宫参加“六一”儿童节活动。“五一”节游园，景山公园常常是少年儿童游园区。周总理在参加了其他公园的游园以后，有时，还要特意到景山公园来看望孩子们。

1971 年 4 月 30 日下午三时许，周总理陪同外宾到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参观。在接待室，校领导介绍了学校的概况后，指着身边的一个同学告诉总理：“这位同学经过针灸和语言训练恢复了听力，已经能说话了。”总理听了很高兴，亲切地问这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我说话你听得见吗？”这个同学一一回答了总理的问话。校领导又介绍，有个毕业生经过治疗恢复了听力，送到普通小学去学习，1970 年参加了海军。总理很关切地问：“他在部队干什么工作？现在情况怎样？”接着又说：“今后要把听力好、说话好的同学送到普通小学去。”

周总理和外宾仔细地参观了手势教学班、针灸班、发音训练班、语言训练班等教室。总理在手势教学班，看到师生通过比比划划的手势学习文化课很有兴趣，看到同学在黑板上演算试题特别认真，字写得十分整齐美观，不住地点头表示赞扬。总理在发音训练班教室，从东头走到西头，从北面走到南面，听每个同学练习发音。总理问坐在边上的一个同学：“你几岁了？”这个女同学告诉总理：“十岁半。”总理侧着耳听懂了她的回答，高兴地说：“噢，噢。”总理走进语言训练班。这节课学生要练习说话，内容是朗读毛主席“五·二〇”声明的一段话。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正在齐声朗读。总理满面笑容，从椅子上站起来，健步走上讲台，拿起教鞭，用铿锵有力的声音，教同学们朗读了毛主席的号召，同学们跟着总理高声朗读。在学校的小院里，总理还合着歌声的拍节，轻轻地踏着脚，听了同学们唱的两首歌。

革命干部后代不能脱离工农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有不少同志英勇牺牲。组织上把这些烈士的子女，集中在一个学校里，过着供给制的学习生活，学政治，学文化，参加劳动。全国解放后，学校搬到北京，仍过着供给制的生活。北京市一〇一中学的前身，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校。

周总理非常关心这个学校学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革命传统教育。

1953 年 5 月 24 日下午两点多钟，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来到这个学校，同学们闻讯从学校的四面八方汇集在总理的周围。一个同学指着廷晓说：“这是我们学生会副主席。”总理拉着廷晓的手说：“噢！你是副会长。今年多大了？”“二十。”“上几年级了？”“初三”“上学晚”总理沉思地自言自语。总理又问：“你们的伙食费是一个月十元钱吗？”回答：“是啊。”总理又问：“每月还给你们零花钱花吗？”回答说：“发两元钱。”“衣服呢？”总理说着，朝周围同学们的身上看了看。“衣服也发。”“多少钱你们知道吗？”同学们作了回答。“单衣两套十七元，棉衣十二元，加上伙食费，那就是说，每个月每人平均是十四、五元哪！”总理说着推开高一（二）班教室的门看了看，又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工农群众的子弟？”“现在还没有。”“你说说，你们要是和工农群众的孩子在一块好不好？”总理停下脚步，象是要考一考廷晓，考一考同学们。廷晓不自然地笑了笑，吞吞吐吐地说：“有一定的好处，也有一定的不好处。”“你说说有什么好处？”总理直视着他，态度亲切但又有些严肃。廷晓半天答不上来。总理又转向大家说：“他回答不上来，你们谁能回答？”

同学们开始感到总理提出的问题有着某种深刻的含义了，都认真地思索起来。因为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没有人回答。

“年纪不小了，二十了。”总理打破了沉寂，象是责备，更象是鼓励地说。廷晓又想了一下，说：“为了领导上好照顾我们。”“为什么要照顾你们？”总理接着又问。廷晓又答不上来了。总理说：“道理很多，也很简单，你们应该会说了。”总理为了使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听见，便提高声音说：“党中央和人民政府一向就认为干部子弟不应特殊化，应该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在同一个学校里，一起学习。你们的父兄，是从劳动人民中成长起来的，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是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你们自己也应该这样做。让你们住在西郊，和社会上几乎隔绝开来；又有多少好处呢？”总理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到大家都在认真地听着、想着，又说下去：“建国四年了，我以为这样的学校已经改变了。今天才知道还没有改变，所以特地来看看。”

“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总理洪亮的声音，在楼道里回响，“毛主席是人民的主席。你们要是变得特殊化了，脱离群众了，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毛主席是不会同意的。人民的领袖，人民的政府嘛。我们也是听人民的。”说到这里，总理拉开初三（一）班教室的门看了看说：“你们头脑里千万不要滋长特殊化的思想。你们应该为人民好好学习，将来为革命做更多的贡献。”总理抬起右手，加重了语气说：“如果说要特殊，你们就只能在多做工作这一点上特殊。”同学们向总理抬起来的右手望去，只见那白布衬衣袖口上，精心地补着一圈几乎看不出来的补钉。

“你们听说过满清的八旗子弟吗？”总理亲切地问，“八旗子弟，就是满清的贵胄子弟。你们会写贵胄的‘胄’字吗？”总理接着说：“‘胄’字，就是胃字出头那个‘胄’。这些贵胄都是立有战功的满清开国功臣，自小骑马射箭，能征善战，以后带兵灭了明朝，建立起满清帝国。可是到八旗子弟就不行了。他们从小娇生惯养，不骑马了，要坐轿，整天提着鸟笼子东游西窜，游手好闲，坐吃俸禄，不劳而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直至成了一群腐败的大烟鬼。后来，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他们束手无策，一败涂地，屈膝投降，最后丢了天下。当然，这是一切剥削阶级必然的下场！你们是无产阶级的后代，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们的父辈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既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总理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无产阶级应该是一代胜过一代，”

总理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校园。走进宿舍，看到屋里是泥土地，睡的床是用木板搭起来的，大通铺、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一床紧挨着一床，在阳光照射下，排成一条直线。总理点点头说：“标准不算很高，生 活还不算特殊。”从宿舍出来，总理又向用席棚搭成的食堂走去。这时，欢乐的人群跳跃着，鼓着掌，要求总理给大家讲话。总理说：“我的话都讲了。”掌声更热烈了。总理望着一张张热烈期待的面孔，向高处走了几步，站到一个土坡上，用洪亮的声音说：“我的话都给你们副会长说了，就是希望你们不要特殊化，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要向劳动人民学习。”接着又重复讲了满清八旗子弟如何腐败的故事，并强调说：“我们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生的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一代胜过一代！”又说：“过去，因为是战争年代，你们的父母投身于紧张激烈的斗争，需要公家照顾你们。现在情况不同了，这种性质的学校将来是要改变的。你们拥护不拥护？”这时，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响成一片。

下午四点钟，开饭钟声响了。总理让大家去吃饭，可是有谁肯走呀！总理看大家都不走，就走进伙房看望正在忙碌的炊事员，还亲口尝了尝饭菜。临走，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慈祥地微笑着，亲切地向大家频频挥手。同学们目送着总理的汽车在热烈的掌声中缓缓驶去。

请运动员到家里作客

周总理多次亲切接见乒乓球运动员。 1961 年，有一次总理邀请乒乓球运动员到家里作客，在总理和运动员合影时，工作人员为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安排了椅子，让运动员站在后面。当请总理坐时，总理说：“为什么老让我们坐。”他坚持要让运动员坐着照。争持不下，直到有人提议把椅子撤掉。总理才站在中间，和运动员一起照了像。七十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首都体育馆看完乒乓球表演比赛后，在休息室接见运动员。为了使运动员都能清楚地看到总理，在运动员坐的椅子前面，为总理安放了一个沙发。运动员们知道总理看完表演后还要给大家作指示，尽管汗流泱背，也顾不上把湿衣服换掉，早就安安静静坐好，等总理来作指示。周总理走进休息室时，运动员们高兴得热烈鼓掌。这时总理却没有坐下来，而是十分亲切地让运动员往前坐，围着他身边坐好，其实大家都愿意和总理在一起，靠得越近越好，可是谁也不好意思上去坐。周总理一看大家都不动弹，就要走过来拉运动员

上前坐。这时，总理发现玻璃窗敞开着，早春的夜风，带着凉意一阵阵地往里吹。总理笑笑说：“你们不往前坐，我就在这儿给你们挡风吧！”运动员们一听，都感动得不知怎么办好了，大家急忙往前挪动，围着总理坐，有的干脆席地而坐。这时总理爽朗地大声笑了起来，连声说，这就好嘛！

热情接待归侨

1949 年，周总理代表党中央邀请一位归国老华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这位老华侨最初表示谦辞，周总理对他说：“华侨有爱国的传统，人数又不少，应该有代表来参加讨论建国大计的会议嘛！”这位老华侨说他不大懂得普通话，恐怕在会议上语言不通。周总理对他说：“语言不通可以通过翻译来解决，最要紧的是大家的心能够相通。例如我们同蒋介石谈判，语言是完全通的，可是彼此的心不相通，所以双方过去谈判了那么多年，总谈不拢来；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语言很多也不相通，但是只要有共同目的，彼此心连心，那就什么事情也好讨论协商。”周总理这些话，使那位老华侨十分感动。

1955 年，周总理在印尼参加万隆会议期间，关崇涧曾组织了许多爱国华侨成立了一个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委员会。为了代表团的食宿安全，他把自己开的餐馆停止了对外营业，专门用来接待总理等中国代表团的同志吃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对他的这种爱国行动，给予了热情的赞扬。两年后，关崇涧回到了祖国，周总理对这位作过贡献的爱国归侨，依然惦记在心上。

1958 年 7 月 5 日，周总理到广东台山县视察工作时，向县委查问这位老归侨的下落。当总理得知关崇涧定居在开平县塘口公社后，马上派车把他接到台山会面。周总理见到这位老华侨，非常高兴，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使劲地摇啊、摇啊，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又见面了！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回来后习惯不习惯？”总理还关切地对他说：“你年纪大了，可要注意休息呀！”

周总理的亲切问候，使这位老归侨热泪盈眶，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总理对爱国人士、爱国侨胞的亲切关怀，象喜讯一样，迅速传遍了台山、开平的侨乡，人们奔走相告，赞叹不已，更加激起了侨乡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敬慕之情，许多归侨和侨眷纷纷给国外的亲友写信报喜。

关心下放干部

周总理非常关心机关干部的锻炼。 1958 年 1 月 28 日晚国务院机关在紫光阁为首批下放干部举行欢送联欢晚会。总理闻讯后赶来参加，并同下放的同志一一握手表示欢送。他询问了同志们的情况，鼓励大家下去好好锻炼，取得“劳动、思想、身体”三丰收。这个时候总理兼外交部长，他还到外交部参加了欢送下放干部的大会，并讲了话。

1965 年春节期间，国务院机关到农村搞“四清”的同志回京过春节。春节后，当同志们要返回农村时，总理赶到集合地点紫光阁前，为大家送行。总理说：“听说你们今天出发，我特地赶来送你们。”

1958 年 7 月 2 日，周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时，还专门看望了在那里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总理同他们促膝谈心，问他们来自哪个单位，劳动、学习如何安排，生活习惯不习惯等等。畅谈中，下放干部把自己种的菠萝切

开给总理品尝，总理高兴他说：“大家一起尝吧。”说着，用牙签挑起一块给身边的一位女同志：“你代表女的尝一尝。”接着，又挑起一块给身边的一位男同志：“你代表男的试一试。”然后，他自己也尝了两块。

总理去看了果园、猪舍。在路过下放干部的宿舍时，总理带头走进用葵棚盖的、光线较暗的宿舍内。当时，学员叶鹏飞因胃病躺在床上休息，认出带头进来的是周总理，便急忙爬起来。可是总理已经来到他的身边，轻轻按住他的肩膀，和蔼地说：“不要起来，不要起来。”并抚摸着叶的前额，关切地问他得了什么病，请医生看病没有，吃些什么药，现在感觉怎样。最后还叮嘱叶好好休息，早日恢复健康。

1963 年，周总理陪同外宾到上海市郊马陆公社参观，听说有电影厂的一批同志在这里参加劳动，他便利用空隙时间特地到田头看望了大家，热情地和大家握手，并一一问了姓名，还看了一些同志的手掌，亲切地问：“有了老茧没有？”

同档案员、打字员交谈

1950 年，有一天周总理来到国务院秘书厅档案科，同做档案工作的同志亲切交谈。总理对工作人员说：“档案工作很重要，应该干一辈子。”总理一一询问了在场的同志是不是有决心这样做。当大家回答一定干一辈子的时候，总理很高兴，但又风趣地说：“你们都是从心里对我说的吧！”然后，总理还看了档案库房。他在档案库房，一边看，一边细心地问：“你们查一份档案，平均得要多少时间？”总理的亲切关怀，使同志们受到很大的教育。1954 年的 12 月，国家档案局成立不久，只有五六个人在西花厅旁边的三间屋子里进行筹备。这个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周总理还来到档案局办公室看望大家，询问了筹备工作的进行情况。

1953 年 12 月 15 日下午，周总理来到国务院秘书厅文书科，同文书人员亲切地交谈。总理走进打字房，正在打字的同志都站起来鼓掌欢迎总理。总理微笑着说：“你们辛苦了，打字是机关不能缺少的一部分重要工作。”并挥手要同志们坐下继续工作。总理环顾了一下全室的打字机后，问：“有几个打字员？”回答：“现在有五个。”总理接着问：“过去不是有十几个吗！为什么减少了？”当听说由于精简编制调走了几个以后，总理微笑着点了点头。接着又问：“谁打得最好？”文书科负责同志指着正在打字的朱克勤同志说，她打得最好最快。这时，总理走过去，站到朱克勤同志的身边，聚精会神地边看打字边问：“你打得最好最快了？”

总理日理万机，还抽空到机关里最基层的单位，和下级工作同志又说又笑，关心地问这问那，对大家是个极大的鼓舞。

夜访公安派出所

1956 年 4 月初的一天夜晚，周总理陪同外宾在大众剧场看完戏后，来到前门公安分局打磨厂派出所。这里多数同志已入睡，只有 22 岁的民警张杰正在户籍办公室值班。小张看见是周总理，连忙迎上前去，说：“总理好！”并向周总理敬了礼。周总理和蔼地点了点头，和小张亲切握手。小张想去把已睡的所长王士林等同志叫起来，周总理连连摆手说：“同志们很辛苦，夜

深了，不要惊动他们了。”

周总理亲切地询问小张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家住在哪里，又问这个派出所管界有多少户，多少人口，多少男的，多少女的，治安情况怎么样，跟群众关系怎么样，等等。

“你这么年轻，群众听你们的吗？”周总理拍拍张杰的肩膀，微笑着问。张杰想了一下说：“我们给群众办事，他们是很喜欢我们的。”听了回答，周总理满意地笑了。

“你们见了老百姓，怎么称呼呢？”总理问。张杰回答说：“上岁数的，叫大爷、大妈；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叫老张、老李；再小一点的，叫小王、小刘。”周总理满意地点点头，说：“这很好。你们跟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有话就愿跟你们谈了。公安工作也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只有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才能做好，对不对？”小张听了这些体贴入微的谈话，会心地点了点头说：“对！”

早春的夜风带着凉意，一阵阵吹来。张杰怕周总理在院子里谈话会受凉，请总理到办公室里坐坐。周总理说：“不必了，不必了，我们该回去了。”说着，总理又首先伸手和张杰告别。

小吃店里的会见

1958 年 8 月 21 日上午，北京无线电器材厂的技术员小王和统计员小陆等同志到北京市委去办事。当她们走出市委大楼时，已经十二点多了，便信步走进台基厂一个门面不大的小吃店吃午饭。当她们走进店门寻找座位时，突然愣住了，禁不住轻声地说：“周总理！”果然是周总理，还有陈毅、贺龙副总理。小陆她们激动极了，老是望着周总理笑，直到服务员走过来问她们吃什么时，才找了座位坐了下来。

正当小陆她们直望着总理傻笑时，周总理转过身来，主动和她们打招呼，问她们是哪个单位的。她们回答说：“是无线电器材厂的。”总理微笑着说：“在东郊？”她们点头称是。总理又问：“你们今天怎么到这里来了呢？”回答：“我们今天到市委办事。”总理说：“为了材料问题吧？”

小吃店服务员走过来问周总理想吃什么，总理要了几碗面条，又亲自到柜台前端了两盘菜，与两位老帅一起慢慢吃起来。吃到一半，周总理又走到小陆她们的桌边，站着和她们交谈。小陆不安地站起来回答问话。总理连忙说：“坐着说吧，坐着说吧。”周总理仔细地询问了要解决的是哪些材料？这些材料是北京没有呢，还是供应不上？厂里这几种材料每年需用量是多少？市委今天是如何答复的？等等。

小陆说，供应我们原材料的工厂，要我们替他们解决两辆卡车，才同意增加供应量。

周总理又仔细追问了这种“以物易物”的不正之风，并转身对两位副总理说：“听见没有，向他们要两辆汽车哪！”总理对这种不正之风很不满意，说：“厂与厂之间，应该是互相协作，互相帮助解决问题。”

服务员走过来了，请总理过去吃面条。总理一边吃，一边又与服务员谈开了，问服务员是什么地方人，小吃店的营业情况等等。

周总理吃完了饭，站起来，察看了一下整个店堂。看到收拾得很干净，高兴地说：“你们很辛苦，卫生工作搞得挺不错。这样好，对人民的身体健

康有保障。”总理还建议他们把临街的大门改装好。

周总理要走了，服务员们请总理再休息一会儿。总理微笑着说：“不坐了，谢谢你们的招待。”接着，又走进厨房，和厨师们一一握手告别，亲切他说：“你们辛苦了。”

在地震灾区当“交通警”

1966 年 3 月 8 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后的第二天，周总理即赶到灾区。当周总理来到隆尧县城内西大街路口时，正值救灾的干部、群众、解放军、医生等乘坐的运送物资的车辆挤满了街道。人人心急如焚，谁都想抢先赶到灾区，可是越急越挤，越挤越紧，把交通民警累得满头是汗，仍然难以疏通。

周总理见此情景，走下车，站到高处，详细观察交通情况。他发现城内街道狭窄，交通民警又缺乏指挥经验，便把大衣一脱，穿过几层车队，走到交通民警面前说：“同志，辛苦了。让我来指挥可以吗？”几个交通民警打了个愣怔，没想到是周总理站在面前，就赶快给他让了个位置。

说也怪，周总理往交通岗上一站，汽车喇叭不响了，吵架的不嚷了，争道的不抢了，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立刻静了下来。周总理大声说：“同志们，老乡们，请听我指挥。”接着，他非常熟练地打手势，发号令。不一会儿，满街的人流、车流有秩序地疏散开了。当交通民警重新投入正常值勤时，周总理已经赶到救灾指挥部，谈起工作。人们赞不绝口地说，国家总理当“交通警”，真是哪朝哪代也没见过。

向汽车售票员问好

1958 年 9 月 26 日晚上十点多钟，北京市五路公共汽车从西经路发出了最后一班车。车到天桥站时，正赶上天桥剧场散场，上来了许多乘客。两个售票员车前车后，忙着售票照顾乘客。这时，登上车坐在中间单排座上的一位乘客主动买票。当售票员向他递过两张九分的车票时，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眼前一片光明，不禁失声喊了出来：“周总理！”这时，其他乘客随着喊声也不约而同地朝这边看来。周总理慈祥地微笑着，轻声问道：“小伙子，怎么样，工作累不累，行车习惯了吧？”售票员还没来得及回答，一双双热情的手伸向了周总理，向总理问好。周总理向每个乘客点头微笑，车厢里一片欢腾。周总理还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司机同志的背后，手搭在扶手杠上，凝神地注视着司机的操作。车到北海站时，售票员赶紧跳下车想伸出双手去搀扶周总理，但他老人家已健步走下车去，并伸出了温暖的手，说：“你们辛苦了。”售票员双手紧紧地握着周总理，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和大家三同

1958 年 5 月 25 日，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在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十三陵水库的劳动。不久，周总理又召集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主任开会，逐个查问部长、主任们参加劳动的情况。大家都说，工作忙抽不出时间，参加劳动不多。总理说：“这样吧，我们一起去，我带队。”周总理给毛主席写了信，说明“政府高级干部已经前往十三陵工地开始一周劳动，”他要“随同他们前往”。6 月 15 日和 6 月 22 日，周总理两次亲自

带队，率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主任、司局长等负责同志共 540 余人，到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他同大家一起住在一所学校里，与水库建设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在工地上整整度过了三天。

周总理到工地，只带了随身的一位警卫同志，再没有任何随行人员。当时总理已年过六十，出发前，同志们曾建议带一位医生，好随时护理。可是总理不同意，他说：“到了工地，一点也不能特殊。参加水库建设的，有工人，有农民，有解放军，有广大干部，他们就不生病？不用说经过劳动，我的身体会更好，即使有点毛病，应该和大家一样，请工地的医生同志看看就是了！”一到工地，总理马上打听工地的作息时间和各项制度，他嘱咐随身的警卫同志说：“到了这里，一切都要按这里的规矩办事。”

开始劳动的第一天，工地指挥部的同志来给大家宣布注意事项和分配劳动任务，当他刚说“我们欢迎首长们……”这第一句话，总理爽朗地笑着说：“这里没有首长，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的职务，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王震同志当时坐在总理的身边，他紧接着风趣地对工地负责同志说：“现在你是首长，我们是你的部下。”

在工地上，周总理住的是一间十来平米的低矮平房。他和大家一样，每天劳动八小时，从不迟到早退。劳动中间，有一顿饭就在工地上吃。总理同样地排队去领一块烙饼，或者两块发糕，然后席地而坐，吃一口干粮，就一口咸菜，喝一口白开水。边吃边和大家谈笑着。收工回来，仍和大家吃着一个食堂的大锅饭菜，在一个几十米见方的大澡堂里洗澡。

夜十一点多了，十二点多了，有时都下半夜一两点了，周总理还坐在那硬木椅子上，伏在桌旁，读书、看材料、批文件。

劳动工地离住地有八里路。每天上工的笛声一响，不论是总理、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司局长，都同工地上的同志们一道，排成整齐的队伍，打着一杆红旗，徒步去工地。总理有时走在队伍当中，同部长们边走边谈工作，有时走在队伍前头，打着红旗，率领队伍前进。一路上，当着这支队伍同青年水库建设者们的队伍相遇时，年轻人就大声地挑战：“黄忠队，唱一个吧！”总理他们的队伍，也打老远就争取主动：“小伙子们，来一个！”伴随着呼唤声和酣畅的欢笑声，愉快的歌声就在热风中荡漾起来。当时，那种水乳交融的同志感情，那种亲密无间的热烈气氛，是多么地扣人心弦啊！

周总理他们参加的劳动，主要是为水库建设准备石料。总理又是推车，又是拉车，又是挑筐，又是搬石头，什么活都抢着干，什么活都干得很认真。有一天，劳动是搬运石头，大家排成长队传递。总理一边传一边风趣地笑着喊：“来了一个‘大西瓜’”，“又来了一个‘大西瓜’”。顿时，工地上一片欢腾。有一次，总理运石料，被石头砸破了手，流了血，大家劝总理去让工地医生上点药，包扎一下，休息休息。总理说：“轻伤不下火线嘛！”说完，没有上药，没有包扎，就又干起来了。让他戴上手套，他说：“戴手套干活不方便。”

有一天晚饭后，周总理把各部委的同志集合起来，动员那些年纪大、身体弱的同志在家里休息一下。总理的话还没有说完，李德全部长就站起来说：“报告总理，我不同意，你不让我们去，你怎么还去？”李部长的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大家都以总理为榜样，没有一个人下战场。

关心群众　时刻想着人民

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必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时时刻刻想着人民，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

周总理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他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日夜操劳，可以说是一个最忙的人，但他从不忘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他到温泉，就想到当地群众是否能方便地用上温泉水；搞建设，他想到要妥善处理好搬迁群众的住房；为了便利群众向政府反映问题，他想到接待室应该挂有牌子；就连农民进城走路安全的问题他也想到了，提出应该在繁华的路口设“安全岛”。

要想到人民的便利

周总理有一次去北京火车站送外宾，在候车室大厅里转了一圈，回头问北京市的一位领导，这么大的火车站居然不设小卖部，旅客上下车要买东西怎么办？总理说完后，又到几个厅里看了一遍，批评有关领导缺少群众观点，为旅客服务的项目搞得太少，指示北京市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1972 年 8 月，有关部门考虑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保证中南海进出秩序，曾设想把经过中南海西门的十四路公共汽车绕道改线。周总理知道后，立即指出：“不要改动，不要影响群众。”总理还教育有关部门的同志：“不要只想到自己的便利，要想到人民的便利。”

周总理考虑到城市交通安全，指示公安部要在街道上标明人行横道线。为了汽车司机的行车方便，指示把快车道、慢车道之间的白线加粗标清楚，并在地上写明哪是快车线，哪是慢车线。总理还想到农民进城，对城市马路宽、来往车辆多的情况不大习惯，指示光划人行横道线还不够，还要在繁华路口的马路中间设“安全岛”，好让行人走到马路中间时也有个地方躲车。周总理对这些具体工作，比专门搞这项业务的人都考虑得周到细致。

1965 年 10 月，周总理提出把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室设在西长安街原北京市一个机关的旧址，这里交通方便，人民群众来访就好找了。信访部门的同志考虑到这里作接待室不合适，提出另选一个更适当的地方新建一个接待室。总理和主管国家计委的李富春副总理很快便批准了新建接待室的计划。当时，正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三令五申不准建楼堂馆所的时候，而且总理也一贯不主张国务院盖办公楼，但是他为了人民群众来访的方便，例外地批准了这项投资 100 万元的工程（当年中央国家机关基建费总共才有 500 万元）。1966 年 7 月 23 日，总理在听取几位同志汇报学校情况的时候，问国务院信访室的负责同志：“人民接待室挂不挂牌子？”这位同志说：“没有挂牌子。不挂牌子来访还这么多，挂了牌于来的人会更多。”总理听后说：“哪能这么看呢！你们接待来访不就是要人家方便嘛！使人家好找嘛！”总理接着指示说：“接待室门口要有牌子。”此后，接待室门口便挂了牌子。

让老百姓能洗上温泉澡

1959 年 1 月 11 日，周总理到广东省从化县温泉大队视察工作。他视察了温泉小学之后，又向幼儿园走去。听说周总理来了，小朋友们一个个欢呼

雀跃，向总理问好。总理高兴地向小朋友们频频招手说：“小朋友好！”然后又弯腰同小朋友握手。在幼儿园里，总理向老师询问了幼儿教育和孩子们的健康情况，又看了课堂、卧室、儿童活动场所和伙房，并且亲口尝了孩子们的晚餐。总理说：“儿童的伙食一定要办好！”又问：“孩子们有洗澡的地方吗？”老师答：“洗澡房眼下还没有建。”总理又转过头问陪同的大队干部：“老百姓有没有洗澡的地方？”回答说，“社员们有的在塘边洗，有的打水回家洗。”总理听后，严肃地对大队干部说：“一定要建些房子供社员和孩子们洗澡用，使老百姓都能方便地用上温泉水！”

这一天，周总理还视察了保健站、公共食堂等单位，逗留了三个多小时。离开温泉大队时，他再三叮嘱有关同志，一定要注意人民健康，要建一个洗澡房，让群众方便地用上温泉水。

周总理离开温泉后，一直记着这件事。在回京途经广州的时候，他特地向广东省有关部门建议，给温泉人民兴建一座温泉浴室。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有关负责同志说：“你们在温泉修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们住，随时可用上温泉水。温泉地区的老百姓祖祖辈辈住在那里，却很不容易用上温泉水洗澡，我和小超都感到不安！”总理又说：“我们倡议，凡到温泉休养的同志，向他们募捐，给温泉人民建一座浴室。我和小超带头，每人捐一百元。”总理这番充满无产阶级感情的话，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受感动，表示要马上把这件事情办好，并说：“总理的钱不要拿了。”可是，周总理在临走前，仍然派人把钱送来了。不久，广东有关部门就拨出一笔款和建筑材料，帮助温泉地区人民建浴室。经过温泉人民奋战一个春天，一座崭新的温泉浴室便建成了。

要把搬迁户的住房盖好

1958 年 3 月 29 日，十三陵水库工程刚刚上马不久，大坝正在紧张施工。这天下午，周总理来到施工现场。指挥部负责同志拿着工程图纸向总理汇报工程的进展情况。总理从图纸上看到有五个村庄要搬迁，就关切地问：“这些村庄的群众搬到哪里去？”当指挥部负责同志说明情况后，总理又说：“能不能帮助迁居的群众把房子盖好一点？”

1958 年 9 月至 1960 年 9 月，密云水库工程施工期间，周总理先后六次到工地视察。他每次来视察，都要了解库区移民搬迁工作的情况，对移民的生产、生活、盖房等问题，都作了重要而具体的指示。

1959 年 5 月，周总理第二次来水库视察时，看到水库沙盘模型和图表上都没有移民的标记，就对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说：“你们的模型图表中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修密云水库有 5 万多人需要迁移，你们对这 5 万人作了安排没有？你们这是见物不见人呀，是一条腿走路。”接着，总理又对在座的水库修建总指挥部副政委、密云县委书记闫振峰说：“你是县委书记，老乡的房子盖了多少？你要赶紧盖，不然老乡要对我们有意见的，也会影响他们的生产与生活的，以后我每月都要问你，你要是不盖好，我就月月催你。”周总理最后一次来水库工地视察时，听说仍有一部分移民的房子还没有盖好，便严肃地批评说：“你们就是见物不见人，你们不把移民的房子盖好，我再也不来了。”

五十年代后期，在搞首都“十大建筑”的时候，人力、物力都十分紧张。

但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仍想着人民群众。总理指示说：“一定要同时注意解决人民居住问题，今年北京建住宅的计划少了，应增加二十万平方米，八个月搞起来，不搞科学馆、美术馆，也要盖住宅。”他还多次指示：盖机关一定要和宿舍、商店配合起来，要克服光投资在机关办公楼、工厂，不管宿舍的现象。在兴建天安门前建筑工程时，有一千多户居民要搬迁。总理曾几次指示要关心拆迁户的居住问题。有关部门根据总理的指示，专门拨了三千万元为拆迁户修建住宅。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总理又指示邀请原来住在天安门地区的拆迁户参观人民大会堂，并请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看一场电影。

要解决好炼钢工人的防暑降温

1956 年 7 月，周总理冒着盛夏酷暑，到上海第一钢铁厂视察工作。当他走到铸钢工场时，向车间负责人问道：“你们这里温度有多高？”回答说有四十多度。总理风趣地说：“我到过热带地区，那里最高气温也有四十多度，可没有你们这里这么炽热。”于是，他回过头来对当时的厂长说：“你们要关心工人的健康，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就在周总理视察不久，国务院就发了一个《工业企业必须认真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紧急通知。从此，炼钢厂里的降温风扇多了起来，有了冷气休息室，工人们喝上了冰镇饮料。 1958 年 7 月 15 日，周总理再次到这里，看到车间里布满了降温风扇，车间的劳动条件有了改善，满意地笑了。

1958 年盛夏，周总理陪同外宾到新建的北京钢厂参观。正在炼钢炉前操作的几个炉前工是刚进厂不久的新手，技术不熟练，使足了劲也没捅出钢口，脸烤得通红，汗水直往下滴嗒，看样子十分焦急。这时，总理健步走上前去，用手比划着，告诉他们捅出钢口的要领，并指出：“这下面应当开个小出钢口，要不，出钢时容易烤伤工人。”听着总理的耐心指教，这几位青年炉前工抡起大锤，舞动钢钎，几下子就打开了出钢口，滚滚的钢水奔腾而出。周总理站在炼钢工人之中，打着手势，指挥天车快点往炉里灌铁水，让转炉快点吹炼。同年 10 月 17 日深夜。周总理又走进了新建的炼钢车间。他看到车间里仍有许多工人在忙碌着，就关心地问：“怎么班上还有这么多工人？”当得知他们是中班的工人主动加班多作贡献时，总理高兴地点头称赞说：“很好，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又叮嘱工厂领导：“要关心职工生活，爱护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把交通民警的冷暖记心上

1956 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北京市交通民警龚桂云到国务院出勤。六点多钟，周总理吃过晚饭后，到大院散步，健步来到交通民警值勤岗位，问道：“你冷吗？”龚桂云答：“不冷，只要能保卫好首长行车安全，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周总理又说：“我看你像冷。”一边说一边伸出右手去摸他的左手。总理温暖的手和他的手一接触：“啊！石头疙瘩似的还说不冷。”龚桂云解释说：“胃不好，有慢性胃溃疡病。”总理说：“胃不好，还是着凉得的呀！”周总理上下打量他穿的警服，问道：“为什么不穿皮衣。”他说：“我们穿的皮衣都是解放前留下的，又大又破，一穿上领子上的毛根就扎脖子。”周总理笑着点点头，说：“是啊！是啊！”便往回走了。

周总理对这件事，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时隔不久，交通大队通知大家去领护腿。大家穿上护腿以后，下肢暖和多了。

一天下午，周总理又来到交通值勤站，关切地问道：“这回比以前暖和了吧！这是救急的暂时办法，穿上虽然不大好看，但是能御寒。”

第二年冬天，交通民警又都穿上了新栽绒大领的皮衣和毡靴。周总理的音容笑貌时时刻刻都牢记在交通民警的心中。

他们淋雨了，要给点姜汤喝

五十年代“五一”、“十一”都搞庆祝游行，有几次，都遇上下雨。周总理看见群众队伍冒雨游行，有的全身淋透，很关心，亲自给北京市领导同志打电话，告诉他们：“游行的同志淋了雨，要注意，不要着凉了，不要感冒了，要给同志们熬点姜汤喝。”参加过庆祝游行的同志都记得，游行完毕，全身淋湿，回到机关后，喝上了滚热的红糖姜水。同志们谁也不会想到，这红糖姜开水，竟是总理亲自让准备的。

还有一次，是 1973 年 9 月，周总理在上海虹桥机场为外宾送行。当时下着大雨。送走外宾后，总理又绕场同前来欢送的群众挥手告别。他这时的健康状况已不好，但大家每次为他打伞，都被他谢绝了。可是他想着群众的健康，特地嘱咐有关的工作人员，一定要让淋雨的群众多喝点姜汤。

公园是人民的，不要占用

北京首都体育馆落成前的一个深夜，周总理到馆内检查。他检查了比赛场内的灯光、音响后，还要上去看看观众的座位。同志们想到总理已是七十多岁高龄，就劝他不要上了。总理风趣地说：“要勇于攀登嘛！”他一直上到第四十排座位，坐在观众席上，试试观众能不能看得清楚。首都体育馆的停车场，有的同志原先考虑扩展到紫竹院公园。向总理请示时，总理说：“公园是人民的，不是大了，而是小了，不要占。“总理拿起铅笔，亲自在设计图上划出了现在停车场的位置。

孩子们缺奶，应优先照顾

1962 年周总理到沈阳。辽宁省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曾提到市场上买不到女同志的发卡子。总理听后，指出：“辽宁是钢铁基地，怎么连个发卡都解决不了？请你们从工业用材边角料中挤出一点儿，生产发卡子。”还有一次，当宾馆服务人员给总理送牛奶和饼干的时候，总理立即想到了小孩的牛奶、饼干问题，问：“沈阳的小孩子有牛奶、饼干供应吗？孩子缺奶怎么办？”服务人员说：“不太好办。”于是，总理指示辽宁的同志：“孩子们缺奶，订牛奶应优先照顾，还要考虑供应婴儿饼干。”这些事，辽宁的同志遵照总理的指示很快进行了落实。

剧团演出要有群众观点

1959 年 6 月，周总理到石家庄视察工作，观看了丝弦剧团演出的《白罗

衫》。他一进剧场，就按剧场的规定，摘下帽子，以免影响后面观众的视线。那天总理一连视察了黄壁庄等两个水库，奔波劳累了一天。为了让总理早休息，市委负责同志和剧团研究，把剧目开头的一大段唱腔改成几句简短的对白，紧缩了演出时间。可是一开场总理就听出来了，问剧团的同志：“怎么开场没有唱呀？应当让观众一开始就知道是什么剧种。”当把上述考虑向总理说明以后，总理说：“那没有必要，要照顾广大观众。”

1962 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歌剧《白毛女》又一次公演了。那一天，总理来看演出。只见总理从一楼走到二楼，又从二楼走到三楼，在每个不同的位置上都坐了一会儿。当时，大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事后才听到了总理的批评。原来是管弦乐队出了问题。总理说：“台上的演唱听不真切，开始还以为是剧场建筑上的问题，结果发现是乐队在演员和观众之间筑起了一堵‘音墙’”。总理说：“如果让大管弦乐队把演员和观众隔开，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总理指示说：“你们要为观众着想，这么响的乐队，人家听不见演员在唱什么，这个‘音墙’一定要拆掉。”

周总理对戏剧舞台上乐队过于庞大，在观众与演员之间形成一堵“音墙”的情况，曾不只一次地提出批评。有一次，总理对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说：“我和你们斗争了十三年，还要和你们斗几个十三年？”

不要忘记人民的支持

1961 年的冬天，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到革命圣地延安慰问演出后，回到了首都北京。一大晚上，剧团领导通知一部分演员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一个周末晚会。

晚会上，周总理亲切地询问了北影演员剧团赴延安演出的情况，问得非常具体，很多细节都问到了。当演员们谈到延安人民给大家吃了大红枣、南瓜小米汤时，总理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总理问道：“你们到延安，住过窑洞了吧？”这一问，把大家问得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半晌，一位女演员才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有一部分演员住了，一部分没住……”总理的脸色顿时严肃起来，说：“到了延安，怎么能不住窑洞呢？”

总理的批评多么含蓄，但又多么尖锐！大家都低下了头。是啊，为什么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竟忘了住窑洞，而以照顾演员的休息为名，把部分主要演员安排到招待所的楼房里呢？

1956 年，总理在一次报告中提到了话剧《霓红灯下的哨兵》里老班长的一段话：“他们用小米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上，就让她（指春妮）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总理说：“我每次听到这段话就要流眼泪。”总理的声音微微颤动，他是多么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有一种血肉相连的感情啊！

真诚相待　尊重人关心人

我们的党和政府同广大的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要巩固和加强这种关系，就要最广泛、最密切地联系群众，就要与群众真诚相待，尊重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

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体贴人，是周总理一生的自觉意识。正因为这样，他的朋友遍天下。在国内国外，城市农村，各行各业，党内党外，上层下层，男女老少中，都有他的知心朋友和熟人。他能时时想到他们，主动接近他们，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从生活上关心他们的冷暖。

位高不忘师生情谊

高盘之是周恩来上小学时的史地老师。高盘之一生忧国忧民， 1907 年在济南高等学堂读书时，曾领导轰动省城的高等学堂反清斗争，遭到通缉而逃亡东北，到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任教。周恩来于 1910 年春，随伯父周贻赓来到东北，成为该校的住校生。盘之先生常向学生宣讲救国救民的真理，介绍国内外进步书刊。受他的影响和辛亥革命的鼓舞，周恩来率先在全校剪辫子，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13 年 2 月，周恩来随工作变动的伯父南迁天津，离别之际，高先生斟酌忖度，赠他“翔宇”二字，衷心祝愿这位 15 岁的大志青年如鲲鹏翱翔宇宙……

周恩来参加革命后，在延安时，外国记者问他是为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周答道：“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得山东高盘之先生教诲与鼓励，对我是个很大的促进。”

1949 年 6 月，在台湾做雇员的高肇甫（高盘之先生的儿子）从台湾回到济南后被拘留。高肇甫无论怎么解释也难释对方的疑窦。这时，他想起父亲 1941 年死时的遗嘱：“不管何时何境，你尽可去找周恩来，他会照顾你的。”便当着公安人员的面，给周恩来修书一封，济南公安局当即派人送京。周恩来见信，高兴地回函请肇甫进京。

高肇甫来京后，周总理曾派人送给他 50 元生活费， 并安排他到华北人民大学读书，因肇甫有病未成。 1950 年 2 月，高肇甫被安排到政务院秘书处档案科工作。1950 年 12 月，总理接见了肇甫，详细询问了盘之先生情况，情殷意切，细致入微。总理动情地说：“没有高老师的教导，我不会有今天。”

1953 年秋，一天，总理又把高肇甫叫去，说：“党和政府动员干部充实基层，参加建设，咱们亲朋要带头哟。”高肇甫答：“我报名啦。”总理听了很是欣慰。 1953 年 12 月，高肇甫举家从北京迁到山东淄博矿务局。临行时，总理叮嘱：“下去后踏实工作，莫要以为是政务院下去的，高人一等。”

1961 年，高肇甫给周总理写信表述思念之情，总理回信邀他来京。叙谈中，总理十分关切地询问高师母的健康情况和肇甫的工作、生活情况。听说肇甫的岳母因粮食不够吃，向农民借了 60 斤粮食，总理很快就派人送去了 60 斤粮票，还让高肇甫给高师母捎去燕窝、白糖、咖啡等营养品。此后，总理又给高师母寄去人民币 100 元，并有书信问候。

1962 年，高师母病故，总理给高肇甫夫妇写信：“惊悉师母病故，……希节哀，注意身体，努力工作。随信寄去 100 元丧葬补助。”

对知识名人，应多一份关心

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在 1956 年初搬家时，遇到一些麻烦。在这年 3 月 16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位同志提起这件事。周总理聚精会神地听完介绍后，讲了很长一段话，他批评有些同志缺乏认真细致做工作的精神，满足于听汇报，做表面文章，工作深入不下去。总理动情地说：“ 像齐白石先生这样的画家，我们在他的生活上为什么不能管得好一点，多给他一份关心！ ”

溥雪斋先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古琴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器重。朱德委员长经常找他探讨书法艺术，同时很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周总理也很关心他。1957 年，总理参加北京画院成立大会，当全体人员合影时，总理特意将他拉到自己身旁，并风趣地说：“ 咱们来个满汉联欢吧！ ”还有一次，总理给文艺界作报告，会后得知他没有车子，就用自己的车将他送回家。

要请顾颉刚到北京来

1953 年冬天，中央有关部门要调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顾颉刚是在上海听到这个消息的。不久，他因事来京，便有朋友问他在沪挣多少钱。那时，他除了书店业务外，还在几处兼课教书，每月可得 500 万元（指旧币，1 万元旧币等于新币 1 元）。顾颉刚如实地将自己的收入情况告诉了这位朋友。但不知怎么回事，这话后来被误传了：说顾颉刚先生要求每月薪金 500 万元，不然就不去北京。周总理知道这件事情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在一次会议上说：“ 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 500 万就给他 500 万嘛，一定要请他到北京来！ ”顾颉刚听到这个情况，被总理的博大胸怀深深感动，他马上要爱人来北京，向有关领导说明他自己并无要求高薪的意思，表示他愿意马上进京工作，工资按国家的规定，该得多少就是多少，决不多要。 1954 年，顾颉刚先生刚从上海调到北京不久，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见到周总理，虽说他俩是第一次见面，但他同周总理却一见如故。

以后，顾颉刚谈起这件往事时，曾感慨地说道：“ 总理对社会各阶层的情况，都十分关心，了如指掌；对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体贴入微，知人善任。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

老舍病了，要向我报告

1959 年的某一天，周总理突然出现在老舍的院子里。

叙谈中，周总理亲切地询问老舍的健康情况。当老舍夫人胡絜青告诉他，老舍前些日子得过一场严重的气管炎，他马上询问老舍进过医院吗？现在痊愈了吗？对周总理的问话，胡絜青都一一作了回答。随后，总理说：“ 我现在要批评你啦，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胡不好意思地承认，她没有想到这一点。总理严肃地说：“ 以后，不管老舍得了什么病，你都要马上向我汇报。 ”

那一天，总理和老舍叙谈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还没有离去。

胡絜青请总理在他们家吃饭，总理爽快地答应了。可是，什么也没准备，拿什么来款待总理呢？总理笑着说：“不要专门准备，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当总理看见胡絜青只端上一盘炒鸡蛋和一碟干鱼之后，笑着对胡说：“你也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不会炒菜。”

“宰相”串门看“五爷”

1962 年，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一个撑着油纸雨伞的人，敲响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大家的门。

盖叫天应声开门，一看是周总理，连忙乐呵呵地说：“‘宰相’进民宅，欢迎总理！”盖老给总理沏了一杯茶，又说：“从前宰相出门，前呼后拥，又是鸣罗开道，又是放鞭炮；你这个‘宰相’，怎么一个人来，也不事先通知我一声啊！”总理笑着说：“我是来串门的，看看你五爷嘛！”（注：盖叫天五兄弟，他排行第五）总理从盖老的练功情况一直问到饮食起居，这使盖老动了感情。

盖老 8 岁进入大津隆庆和科班学戏， 11 岁以“小紧斗子”艺名在上海老天仙茶园登台， 14 岁在上海玉仙茶园第一次用“盖叫天”的艺名和观众见面。 1934 年， 47 岁的盖叫天在上海演《狮子楼》，在舞台上摔断了右腿，得不到名医治疗，被江湖医牛把腿给接反了。他为了能演戏，自己忍痛将接反却已长牢的腿，一拳打断，重新接上长好。由于他几十年苦心钻研，表演上自成一派，享有“活武松”之称。可他一生走南闯北，在旧社会受尽欺压。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各方面的关怀和照顾。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

这次总理来看他，他不禁又回忆起一件往事：在 1949 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总理问起了他在杭州的生活情况。盖老说：“我生活得很好，就是住的地方没接上电灯，不方便。”他随门说的一句话，谁知总理却记在心里了。等他开完会回到杭州，他住的地方已接上了电灯。

为程砚秋作入党介绍人

程砚秋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是我国四大名旦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为人正直，洁身自好，具有强烈的事业心。

1949 年夏天，刚解放不久的北京城，阳光明媚灿烂，到处生机勃勃。一天下午，身负重任的周恩来，在繁忙的国事中，挤出时间登门拜访了程砚秋。周恩来缓步走进北京西四报子胡同程砚秋的家中，和蔼地问道：“程先生在家吗？”这时，程砚秋的弟子王吟秋出来答道：“我师傅出去了。”周恩来见来的不凑巧，拿出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留言：

砚秋先生：

特来拜访，值公出，不便留候驾归为歉。

周恩来

不多时，程砚秋回家看见周恩来的亲笔留条，心情无比激动，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想：解放前，艺人被歧视，艺术是那些达官贵人取乐的玩物；今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亲自登门看望我，真是社会变样了，共产党了不起呀！

不久，程砚秋在北京饭店见到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周总理，感到全

身热乎乎的，为了祖国的艺术事业，他身上涌出了用不完的劲头。这天，是他生平中最难忘的一天。

有一次，程砚秋随以彭真为团长的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又和率领政府代表团的在苏访问的周总理相遇了。总理利用这个机会，同程砚秋促膝交谈。他从交朋谈起，详细地了解程砚秋的思想情况，耐心地启发教育他，要他积极上进，并亲切地问他：“你为什么还没有入党呢？”程砚秋惭愧地说：“我缺点太多了，不够资格。”接着，周总理诚恳地说：“缺点是可以克服的嘛！如果你入党的话，我愿意做你的介绍人。能否入党要经过党支部、党的组织讨论决定。”

周总理的一席话，鼓舞了程砚秋，给了他信心和力量。回国后，程砚秋就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他写道：“我体会到，真正好的党员是全心全意为国为民，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认清楚了党就是好，真正是好的。所以我热爱共产党。我愉快，我兴奋，现在我要求入党了。”

程砚秋提出入党申请后，周总理又约他进行了一次诚恳的谈话。总理肯定了程砚秋的优点，但也说明他性格有些孤僻、清高，指出在旧社会不愿与旧势力同流合污是个优点，但到了新社会，不顺应历史潮流，心胸狭窄，不注意团结同志，就和新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了，必须加以克服。总理希望他能很快地克服这个缺点，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周总理的帮助，在程砚秋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动。他向总理表示：永远忠诚遵守党的一切纪律，有信心为人民去努力工作，决不会使总理失望。

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在周总理直接教育帮助下，程砚秋进步很快，不久，由周恩来和贺龙两人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总理还把他在程砚秋入党志愿书上写的意见，诚恳地抄给了程砚秋。砚秋同志：

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这样一段意见：

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现在把它抄送给你，作为我这个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周总理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对广大知识分子那种关怀爱护，平等相待，循循善诱，以诚相见的事迹，成为人们广为传颂的佳话。

举行宴会要设记者席

1957 年以前，规模不大的中型宴会一般没有记者的席位。而在这类宴会上，常常有很重要的即席讲话。记者如果站在屋子里听记，实在有碍观瞻，只能站在门边或窗外听记。这些情况总理都看在眼里。

有一次，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宴客。宴会结束后，总理走到记者面前问道：“你们吃饭了吗？”记者回答说：“不要紧，等工作完了再吃。”总理很不高兴地说：“你们工作，外交部的同志也是工作。他们有饭吃，你们就没有饭吃。”说着，把当时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叫过来说：“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饭吃？！大家都是一样工作。你们有饭吃，他们就没饭吃，对吗？”那位司长有点惶恐，不知怎么回答好。从那以后，一般的中型宴会甚至小型宴会都有了记者席位，记者的工作就方便多了。

在宴会进行中，周总理知道翻译忙，吃不好饭，因此，他经常亲自把菜夹到翻译的盘子里。一次，总理宴请日本外宾时，发现翻译同志只顾讲话，无暇吃饭，他就多次给翻译夹菜，并亲切地说：“要翻译好，更要吃得好。”又说：“刚才我讲话剥夺了翻译同志吃饭的时间，现在建议在座的亲自动口，以保证翻译同志吃好，你们同意不同意？”这些话是多么感人肺腑，多么动人心弦啊！可是就在这次宴会上，由于总理忙于处理党和国家大事，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批文件，还要做外宾的工作，他自己却没有顾得上吃饭。

1962 年盛夏的一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西藏上层人物。那大天气非常热，服务员送来了擦汗毛巾，给参加谈话的人每人分发一条，但分到翻译李佐民跟前时恰好分完了。总理当即向服务员说：“今天在场的人最辛苦的是翻译同志。谈话的人都有休息的机会，唯独他要不停他说话。没有翻译，我们的会就开不成。”随即，总理请服务员给翻译补送了一条毛巾。李佐民还回忆说， 1954 年国庆节后不久，有一天毛主席接见西藏去京的国庆观礼团，我去担任翻译。接见开始后，周总理要我坐在毛主席身边，并十分亲切地解释说：“这样便于翻译。”当时，由于我过分激动，再加上那时自己藏话翻译水平低，心情很紧张，毛主席讲的第一句活，我就没有听清楚，又不便于问，于是卡了壳。就在这十分尴尬的刹那间，周总理觉察到我的困难，轻轻地拍了我的肩膀，低声在我耳边讲：“你是不是没有听清毛主席的话？主席问他们好。你不要紧张，听不清主席的话，你就问我。”这一下，我真象吃了一颗定心丸，紧张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在整个接见过程中，周总理始终看着我写下的记录，对于记错了的地方，那怕一个字，也及时给我纠正。就这样，在周总理亲切关怀指导下，顺利完成了任务。

为摄影记者提供方便

天安门城楼上的前沿，以前是没有栏杆的。那时候要拍主席台正面的镜头，摄影人员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而且也很不安全。有一次，徐肖冰正在城楼侧身拍摄毛主席镜头，总理一把攥住了他的衣襟，怕他摔下去。这以后，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在城楼上安装了卫护栏杆。

有一年，周总理陪同外宾到沙石峪参观，随同执行摄影任务的是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记者，由于缺乏经验，开头有些镜头拍得不够理想。周总理知道后，亲切地安慰他说：“不要紧，我来替你安排。”接着，总理就在参观点上亲自帮助记者组织场面。拍完之后，总理微笑着问道：“这次拍好了吧？”

1957 年 4 月 25 日晚上，周总理在杭州一家普通剧场——新中国剧院里，和四百多群众一起观看金华越剧团的演出。演出结束后，总理走进一间很窄的化妆室，同演员们一一握手；又走上舞台和演员们一起照像。记者找到一

个高一点的地方拍照。这时候，总理看到记者站在椅背上，关怀地说：“小心！”并叫台下的一个同志帮助扶一下。照了一张，总理说：“再拍一张。”

1956 年 9 月，周总理和毛主席到北京西郊机场，迎接来访的一位外国元首。当毛主席同外宾握手时，上百名中外记者纷纷拥上前去。为了赶拍这珍贵的历史镜头，我国的一个摄影记者，把长镜头往前一伸，恰巧从一位领导同志的后肩上伸了出去。为了让他拍好毛主席的镜头，这位领导同志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那位记者十分从容地喀嚓喀嚓地连续按起快门来。记者拍完镜头，这位领导同志才回过头来，朝他笑了笑。“啊！是总理！”摄影记者大吃一惊，不好意思地刚想说什么，周总理却向他点点头，表示说：“没关系，这有什么呢！”

1965 年 6 月 8 日，周总理结束了对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的友好访问，乘中国民航专机返回北京，采访记者也随机回国。经过几天的辛劳，采访记者顺利完成了总理出访的新闻纪录片的拍摄任务，感到心情格外轻松愉快，坐在舒适的机舱里，不知不觉打起盹来。朦胧中，觉得有一只手在李振羽的肩上轻轻拍了两下，他张眼一看，是一位女服务员站在他和王瑜本同志座位旁，对他俩说：“总理请你们二位到他的座舱去”。

他们走进后舱，看到总理安详地坐在机窗旁的软椅上。总理微笑着跟他们打招呼，让他们坐下，说：“你们这次工作很辛苦嘛。”他们连忙回答：“不辛苦。”总理说：“在达累斯萨拉姆，我看到你们抱着电影摄影机跟着敞篷汽车跑前跑后，够辛苦的。”他们听了总理的话，一股热流顿时涌上心头。

这件事的起因是，总理在 6 月 4 日刚到达坦桑尼亚时，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成千上万的坦桑尼亚人民聚集在路旁夹道欢迎周恩来总理。为了真实地把坦桑尼亚人民对总理热烈欢迎的友好感情纪录下来，李振羽和王瑜本同志从记者乘坐的敞篷汽车上跳下来，抢拍群众热烈情绪特写镜头，再追赶上行进的汽车。没想到总理竟把他们的一举一动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了。

接着，总理指着机舱外的云海说：“外面的白云多么漂亮，怎么不拍几个镜头！”

他们立即回到机舱拿来摄影机和照相机。总理座席旁的窗子是个比较好的角度，李振羽站在总理身后，依托着坐椅靠背拍摄窗外的云海。总理却站起来，把他的坐椅让给他，叫他坐下来好好拍。

拍完镜头，总理叫他们坐在桌旁，聊起家常，问他们两个人的工作情况，又问起新影厂的情况。总理非常关心新闻纪录电影摄影装备轻便化的问题，他说：“你们的摄影机太笨重， 35㎜ 摄影机改换 16㎜ 摄影机一事怎么还没解决？”两位记者赶紧报告总理，厂里正在办理购置摄影机的手续，其他洗印、录音、剪接等设备也在落实。总理听后点头表示满意。

总理对他们说：“当个摄影记者要不怕吃苦受累，要思路敏捷，眼急手快，一旦发现好的东西就要拍下来。你们要把摄影机经常带在身边，像战士带着武器一样，时刻准备着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

要关心他，感动他

1961 年 5 月，周总理在河北省武安县伯延村调查时，在座谈会上，听说有一个最近才结婚的老人，一直在搞单干，便登门前去访问。周总理来到他

家中，看到虽说他是新婚，但屋子里并没有添置什么新东西、小农具、粮食，柴禾，放得乱七八糟的，墙壁被烟熏得漆黑，炕上铺的席子漏着窟窿。总理就坐在炕上和老汉攀谈起来：“听说你新婚，来向你祝贺。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老汉皱着眉头认真地想起来，突然一拍脑袋，走到门后，拿出个锄头来，对总理说：“这个锄头断了，叫他们铁工厂接一下，他们就是不给接。”总理把在场的一位公社干部叫到跟前，让他将锄头拿到铁工厂，很快给他接上了。老汉看着放了多时都找不着人修理的坏锄头，被主动上门来关怀他的周总理派人拿去修理了，脸上深深的皱纹舒展开来，拍着胸口激动地对总理说：“你这么关心俺，俺以后也参加集体劳动。”离别时，老汉乐呵呵地把总理一直送出了他的家门。总理一边挥手向老人告别，一边神情严肃地对身边的公社干部们说：“你们要关心他，感动他，连这个锄头都不给他修，怎么能使他感到集体的温暖哟。”大家听了深受教育。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周总理自己成年累月地通宵达旦地工作，但对身边的服务员却十分关怀，总要他们早点睡觉。每当服务员由于总理还在办公而不肯先休息时，周总理总是劝说：“你们的工作已经完毕，我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了，应该休息了。”

1963 年，周总理和邓大姐在上海过春节。农历年三十那天下午，总理对服务员说：“今天是‘大年夜’，按中国人的风俗习惯都要在家里吃‘团圆饭’，你们都回家去，高高兴兴吃顿团圆饭，我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了。”但服务员们怎么忍心不照顾总理呢？谁也不肯回家。周总理再三动员，最后不得不下命令才把服务员赶回了家。第二天大年初一，总理和邓大姐亲自招待服务员们吃午饭。总理举杯向大家敬酒，说：“我在这里过年很高兴，大家一起吃顿新年饭，你们都很辛苦，祝你们新年愉快，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大家都感动得心潮翻滚，含泪欲滴。

1964 年冬天，周总理到广东，住在迎宾馆，经常在晚上工作到深夜。他担心值班的大师傅为做夜宵而影响休息，总是预先吩咐值班的师傅说：“今晚上我们要开会，你们给每人准备一杯酸奶、一块蛋糕就行了，先去休息吧！”

不能让服务员累着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设计能接纳五千人，这就需要附设庞大的食品加工设施和复杂的传送程序。对此，周总理专门指示有关设计人员说：“你们不能只替参加宴会的人着想，还要考虑服务人员的方便。宴会厅的设计要听炊事员、招待员的意见，他们说行就行！”总理还叮嘱送菜时要做成小车，减轻服务员的负担；房间里的沙发不要设计得太重，让服务人员搬动起来方便。总理事事处处替宴会服务人员着想的精神，使设计人员深受感动。为了减轻宴会厅服务人员今后的负担，设计部门邀请了北京几个大饭店的服务人员参加了对人民大会堂附属设施的设计工作。

1960 年，周总理在南京，有一次招待外宾，宾馆事先研究搞几个小吃。结果菜多了些，总理看到服务员忙得满头大汗，严肃地说：“这是谁出的主意，以后谁出谁来忙，让他来体验一下。”

向厨师道歉

1957 年，周总理陪外宾到杭州，在楼外楼举行宴会。菜肴上过三分之二后，就在上“双味脆梅”这道菜的时候，总理照例站了起来，他将菜肴一一夹给在座所有外宾和各位首长，然后自己夹了一块慢慢咀嚼起来。突然，听见总理嘴里发出“咋嚓”的响声。当时在座的各位来宾都惊讶地停下筷子，有的关心地问道：“怎么回事？”但是，总理神情安详，他把嘴里的一口菜肴吐在盘子里，若无其事说：“没事，没事，一粒小砂子。”他把盘子递给了姜师傅，又照常夹了一口“双味”吃了起来。

这时，姜师傅着急了，他瞅着这只盘子，心里七上八下的，用手揉捏了这口东西，发现里面有一颗扁形的硬块，可一时又看不清楚。姜师傅赶快用手帕包了起来。等总理和外宾走后，姜师傅立即把这小包东西交给领导，并汇报了事情经过。

当天下午，公安处派人找姜师傅说，经过检验，这是半颗金属镶牙的碎片，并问姜师傅镶牙有没有脱落，姜师傅摸了摸自己的牙齿，一时说不准。后来，又仔细地摸了摸，却感到自己的镶牙有点异样了。自己讲不清楚，公安部门的同志也认为这镶牙是姜师傅的了。出于责任感，姜师傅主动承担了责任并表示愿意接受组织上给予的任何处分。

对于这件事，省公安厅立即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总理的秘书。那天下午，总理就要离开杭州，因为忙，秘书来不及向总理汇报，上了飞机后，秘书才向总理汇报了这件事情。总理一听，思索了一会儿，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牙齿，发现自己的一颗镶牙缺了一块。总理十分着急，马上指示秘书，从飞机上发了一封电报给浙江公安厅，回到北京又催促秘书发了第二个电报，要公安厅派人去慰问姜师傅，并向他表示歉意。

后来，周总理再次到杭州，来楼外楼时，一进门就问：“姜师傅，姜师傅在吗？”总理见到姜师傅，迈着大步，向前紧紧地握着姜师傅的手，声音朗朗地说：“啊，姜师傅，你好呀！那天，我不知道那镶牙掉了，回去后才发现，这事非常抱歉，你可受到委屈了吧？”边说边拉他上了三楼。总理让姜师傅坐下，说：“你不要走了，今天我请你吃饭！”

幸亏你刀子躲得快

北京饭店理发员朱殿华师傅给周总理理了 20 几年。一般情况下，总理都是自己来饭店理发。有时工作太忙或者急待迎送外宾，才通知朱师傅来总理家里。每次朱师傅来，总理见他，总是和蔼、亲切地说：“老朱，又让你跑一趟，该耽误你的工作了。”理完发，总要说一声“谢谢！”

有一次，朱师傅来总理家里给总理刮脸，刚刮到一半，总理突然咳嗽一声，朱师傅没有提防，将总理的脸刮了个小口子。朱师傅心里一阵紧张，忙说：“我工作没做好，真对不起总理。”可总理反而宽慰地说：“这怎么能怪你呢！怪我咳嗽没和你打招呼。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总理刮完脸，就上车去飞机场了。临走时，总理亲切地挽留朱师傅吃了饭再回去，并对邓颖超说：“你陪老朱吃饭，我走了。”

周总理生病住医院后，朱师傅仍常去医院给总理理发。理发时，总理很

少对朱师傅谈自己的病情，总是询问北京饭店服务人员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总理逝世前的一个月，朱师傅算算己有 20 几天没给总理理发了，多次托人捎信要去给总理理发，总理知道了，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 20 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让他来吧！”总理自己病得那么厉害了，可他还这样关心和体贴群众。

雨夜给警卫战士送雨衣

1955 年 7 月，战士郭义刚在北戴河担任警卫任务。一天深夜，敬爱的周总理还在紧张地工作着。突然，下起了大雨。不一会儿，邓颖超来到郭义刚站岗的地方，她右手打着雨伞，左手拿着一件雨衣，亲切地对郭义刚说：“总理让我给你送雨衣来了，快穿上吧！”接着，邓颖超又说：“总理让我转告你，打雷下雨，不要在树下站岗。”郭义刚接过雨衣，心潮起伏，热泪滚滚而出。这不仅仅是给我送来了雨衣，而是送来了一颗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警卫战士热滚滚的心啊！

还有一次，也是 1955 年夏天。农业劳动模范吴春安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天，下着濛濛小雨，吴春安急着上车去会场，忘记带雨具，下了车顶雨往会场走。走了没几步远，突然感到不淋雨了，抬头一看，原来已有一把伞撑在自己头上，转身望去，啊，是周总理！刹时，吴春安浑身热呼呼的，不知该用什么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吴春安对总理说：“你一个人打着就行了。”说话间，总理的半个身子都淋在了雨里。

雪天给值勤人员送苹果

1955 年初春的一个晚上，首都北京纷纷扬扬地下着雪。警卫战士陈惠正在总理办公室站岗，这时，雪越下越大，周总理掀开门帘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然后健步来到战士小陈跟前，高兴地对他说：“这场瑞雪下得好啊！今年农业大有希望。”

接着，周总理便和战士拉开家常，从连队的政治学习、军训、伙食到家乡情况、家里还有什么人等情况都一一问到了。当总理知道小陈从小是个孤儿后，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坚毅地说，万恶的旧社会象你这样的孤儿不少呀！卖儿卖女，逃荒要饭。我们无产阶级搞革命就是要解放全人类，使全世界的孤儿都过上幸福的生活。随后，总理回屋里拿出两个又红又大的苹果，硬塞在小陈手里。小陈很拘束地说：“报告总理，我们警卫战士有纪律规定，不准接受首长的礼物，您很辛苦，苹果留着您自己吃吧。”总理笑盈盈地说：“拿上，明天我给你们指导员打个电话说明一下就行啦！”战士接着两个大苹果，热泪盈眶，心情无比激动。

第二天，周总理又把两箱苹果送给了警卫连。指导员激动地向战士们说：“同志们，这两箱苹果是朝鲜同志送给中央首长的，总理舍不得吃，送给我们连了。”顿时，全场一片欢腾，掌声不息，每个警卫战士眼里噙着泪花，沉浸在激动和幸福之中。

深夜到代表住处查铺

1966 年国庆节期间，有一部分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住进了中南海。9 月 30 日晚上，周总理惦记着他们的冷暖，亲自到代表们的住处查铺。

9 月 30 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邀请四川泸州气矿 32111 钻井队的 8 名代表到中南海去住。这天当晚他们参加了国庆招待会回来后，躺在床上谁也睡不着，回想着几天来周总理接见的情景。大家想着，想着，忽然门开了，敬爱的周总理来到他们身边，总理看到他们都没有睡着，就亲切地问大家冷不冷？并亲自给他们盖好被子，嘱咐他们安心睡觉，以饱满的精神参加明天的国庆观礼。

9 月 30 日中午，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山东省临沂县太平公社东张屯大队老贫农李法瑞随同其他观礼代表从宾馆搬到了中南海。大家象当年老八路一样睡地铺，两人合盖一床被。就在这天深夜，正在梦中的李法瑞忽然感觉到有人把他露在外边的胳膊慢慢地放在被窝里，又轻轻地给他往上拉了拉被子。当他睁开眼一看，啊！原来是敬爱的周总理。他急忙要起身，周总理用手按着他的肩膀说：“不要感冒了，好好休息。”说完，迈着轻轻的脚步，又到别的房间查铺去了。

1961 年夏初，河南省济源县留庄“英雄民兵营”教导员薛平华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兵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周总理作了重要报告，和大家共同回顾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生涯。那天夜里，他怎么也睡不着，心想：旧社会我这个雇工出身的穷孩子，地主老财从不把我当人看。今天我能睡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里，心中感到非常幸福。夜已经很深了，民兵代表们都激动得难以入睡。午夜十二点左右，周总理又来到了他们身边，轻轻地走动着，发现有的代表的衣服滚到一边，就给拾起来重新盖好，发现有的代表露出了手脚，就给重新裹好。当周总理走到薛平华身边时，发现附近几个代表还没睡着，就亲切地说：“快睡吧，我给你们站岗。”

要给她买件新衣服

1972 年 8 月 3 日傍晚，北京低压电器厂青年工人刘秀新骑车进入了快车道，挡住了周总理的汽车的去路，司机紧急刹车，避免了人命事故，但车边轻轻擦着了小刘的后背，挂破了衬衫，蹭破了一点皮。总理拉开了轿车后座的窗帘，用关怀、爱护的眼光亲切地看着小刘。司机下车问他：“同志，碰着没有？”小刘回答说：“没事儿！没事儿！”但总理还不放心，当即作了 3 点指示：“一、马上送医院检查；二、不要告诉她我是谁，不要批评她；三、要给她买件新衣服。”并留下工作人员处理这件事。

这位工作人员，赶紧脱下自己的衬衣给小刘穿，并用小汽车送她到医院。检查快要结束的时候，总理又亲自打电话到医院询问伤情。随后，总理又让工作人员给小刘送来了一件新的的确良衬衫。

第二天，总理又派几位工作人员到小刘家里看望，关心地问她：“伤势怎样？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需要什么？”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刘秀新全家深受感动。

别让小王行百里半九十

1968 年，北京礼花厂青年工人王世芬被烈火烧伤。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

十八。周总理闻讯后，非常关心，指示医院尽全力抢救。在他的直接关怀下，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护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昼夜奋战数十天，精心治疗，精心护理，使王世芬获得了新生。

在王世芬继续治疗残余小创面和为恢复健康进行肢体功能练习的时候，总理两次嘱咐医院说：“别让小王行百里半九十，今后的治疗决不能有丝毫放松。”在王世芬度过第一个夏天时，总理又问：“病人已不能出汗，是否受得了？要采取措施，使病房的气温能同病人适应。”邓颖超同志还问：病人的鼻子里汗毛受伤没有，呼吸受影响吗，病菌是否容易侵入，能否影响身体健康等等。当同志们向王世芬讲述周总理的关怀和邓颖超的这些感人问话时，王世芬激动了，热泪夺眶而出！

关心他人胜过自己

1959 年 6 月 30 日，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由武汉乘江峡轮到九江参加庐山会议。当时天气闷热，朱委员长搬了一张行军床到餐厅纳凉休息。服务员张定兰要到餐厅去给周总理取毛巾，总理连忙制止说：“不用了，不用了。”并告诉小张：“朱委员长在餐厅里休息，不要去打扰。”

1962 年，周总理到辽宁开会时，开始住在辽宁宾馆的三楼，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住在他的楼下。总理日理万机，工作非常辛苦和紧张，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谈话，汇报工作。当总理得知欧阳钦同志住在楼下后，几次提出自己要换一个地方住。大家不了解总理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解释说：“欧阳钦是老同志，又患有神经衰弱症，大家到我这里来进进出出谈事情，会影响他的休息。”

也是这一年，周总理从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坐火车到吉林市的时候，正是深夜。为了不影响吉林市市委负责同志和宾馆招待人员的休息，总理决定天亮后再下车。市委负责同志上车请总理到宾馆休息，总理说：“深夜了，不要惊动同志们了！”就这样，我们的周总理在火车上度过了后半夜。清晨，在车上吃过早饭，就直接到丰满发电厂视察去了。

在首都体育馆落成的前一个深夜，周总理到馆内去进行检查，事先没有通知，馆里的负责同志已经睡了。总理来到后，当有人要去叫他们时，总理制止了，并说：“不要影响他们休息，我们自己看就行了。”总理有时夜里有事到北京饭店，他怕电梯开动的声音影响别人休息，就不肯乘电梯，自己走楼梯上楼。

还有一次，那是 1955 年，周总理到印尼参加万隆会议。为了让周总理住得舒适一些，当地爱国华侨事先布置了一所宽敞而又舒适的屋子给他。可是，周总理不住，却把那所屋子让给了一个兄弟国家的领导人住，他自己住在一所比较简朴的屋子。周总理这么谦逊，这么照顾兄弟国家的代表，使广大华侨受到一次深刻的国际主义教育。

宽以待人，循循善诱

1950 年政务院机关从江苏招来一批中学生当服务员，集中训练一段后便走上服务岗位。有个服务员分配到总理身边工作，开始表现不错，后来情况熟了，就有些顽皮了。

一次总理外出开会，这位小服务员便在总理办公室里闹腾起来，把茶几上的玻璃板给打碎了。值班人员发现后，严厉批评了小服务员，并打算把他调离工作岗位。小服务员沮丧万分，低头认错。总理回来知道后，没有说一句重话，还为这位小服务员打圆场，说：“小孩子嘛，不懂事，何必这么计较！”

在广州交易会上，有一次周总理在休息室休息时，给总理倒茶的服务员因心情过于紧张，不慎把茶倒到桌子上，这位服务员心里非常不安。周总理看了她不安的心情，便主动亲切地同她拉起家常，问寒问暖，还拿起摆在桌子上的桔子请服务员吃，并详细询问桔子的品种、产地、质量，使她感到亲切和温暖。

在上海锦江饭店，有一次宴会上，一位翻译人员翻译错了菜名，周总理就亲自加以纠正。事后，他要这位翻译向服务员，厨师好好学习业务知识，更好地提高翻译水平，使这位翻译很感动。还有一次，一位服务员缺乏洗涤化纤衣物的经验，不小心把周总理一件已穿了多年的混纺衣服洗破了，他知道总理十分俭朴，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按照饭店的规定，损坏客人的物品应该赔偿。饭店领导便买了一件新衣服赔总理。但总理知道后，丝毫不责怪服务人员，说：“衣服穿的时间长了总是要破的，怎么要赔呢！”还特地叮嘱秘书：“新衣服要付钱，也不能批评服务员。”

1961 年，周总理曾几次观看《雷雨》的演出。有一次，他看《雷雨》时，指出于是之的台词听不清，剧场经理为之解释说：“总理坐的第七排的座位是声音效果不好的地方，后边十排左右的座位反而好些。又一个晚上，总理再次去看《雷雨》，他就执意坐在十一排，并向剧场经理说他一定要坐在这个位置听听声音效果如何。演出中，总理还指着台上的于是之问旁边的观众，他的话你能听清楚吗？身旁的观众也反映听不清楚。戏演完后，为了体谅演员，总理并没有一开口就批评，而是说了许多自我批评的话，然后才批评于是之读词声音太轻，使观众听不清，影响演出效果。同时，总理还正面提出一个演员在台上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的精辟见解。总理说：“眼睛老看观众就忘了戏里的环境和人物关系，但只顾自己的真实，心里忘了观众，声音小得叫人听不见，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

勤俭建国　处处厉行节约

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本色。在革命战争年代，它是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奋勇前进，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建国后，“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成为我们搞建设，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全国人民又万众一心，战胜了前进路上的一个又一个困难，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周总理继承和发扬了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严格遵循“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的方针。他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事事精打细算，处处厉行节约。他以自己的不丢一粒米、不浪费一杯茶的实际行动，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艰苦奋斗，努力去创造幸福的未来。

国务院不能带大兴土木这个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国务院（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叫政务院）就在中南海办公，都是老式旧平房。

国务院会议厅，是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 商议和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但是这个会议厅也是栋老式旧平房，光线阴暗，面积狭小，开会时非常拥挤。五十年代中期，有关方面就建议通过改建扩大这个会议室，总理不同意。为了解决开会时的拥挤问题，国务院机关的有关部门的同志，自己动手，将室内隔断打掉，稍加修理，增加了一些会议桌椅。总理看到后，非常满意，说：“ 这不是很好嘛！ ”后来，有人提出了盖一座政府大楼的建议，把国务院开会用的会议厅和办公室一起都予以解决，总理坚决不赞成。他曾对薄一波讲，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花厅、西花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府大楼。

在筹备建国十周年的“ 十大建筑 ”过程中，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有关部门又提出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并且还提出了在府右街西侧，从西安门大街到西长安街之间修建大楼的设计图纸。总理看到盖大楼方案以后，有一天晚上把国务院主管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秘书长高登榜找去，了解盖大楼的情况。高登榜把盖办公大楼的几种设想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听后又一次严肃他说：“ 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 ”

对这件事，周总理还征求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说：“ 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办公大楼。如果要盖办公大楼，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 ”总理马上说：“ 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 ”总理又说：“ 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 ”他当机立断，把国务院办公大楼这项建筑计划撤销了。

以后，总理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一有机会便要以有人建议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的问题为例，告诫大家要经常警惕和反对“ 贪大 ”、“ 铺张 ”，讲求“ 排场 ”的思想作风。

国务院有个小礼堂，是建国初期为机关工作人员做饭厅兼礼堂而修建

的，又矮又小，只能容纳五六百人。后来，国务院召开重要会议经常使用这个礼堂。国务院行政部门曾几次提出重盖礼堂计划，报告送给总理后始终没有批准，就拖了下来。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有的同志认为重建不行，就采取小修理，这样就不必报总理了。于是，未经总理批准，行政部门便派工人动手拆房进行修理。刚拆了一个房角和窗户，有一大总理路过礼堂，发现礼堂房顶拆去一个角，随即吩咐有关同志停止拆房，只好把拆掉的地方又按原样修起来了。

必需建筑的要节约

1956 年，筹建我们国家的广播大楼，周总理亲自审查模型。他看得十分认真、细致，凡是广播、电视工作必需的建筑，他都予以批准；不实用的或可有可无的建筑，就坚决砍掉。 1959 年，广播大楼落成后，总理作了全面的视察，他语重心长地说：“ 广播大楼建成了，比起延安的窑洞来条件好多了，一定要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 ”

1959 年建国 10 周年，因为水利工作有了一点成绩， 水电部在密云水库附近修了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听到后，追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有没有这回下。当听说确实在修建这座展览馆时，总理摇摇头表示反对，并且还说了一句：“ 没有想到你们会做这样的事。 ”当时，这位负责同志感到辜负了总理关于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一贯教导，内心非常沉痛，决定把展览馆移交给其他单位改为研究所。

自己能制造，何必外购

建国初期，对于必需进口的军事装备和物资，周总理都要亲自审查，一些重要订货还按品名逐项批注；并一再指示总后机关“ 要严格审查，尽可能少订，能造者一定自己造。 ”有一次，总后要求从国外订购一万辆自行车，总理没有同意，在报告上指示：“ 津沪均出产自行车，何以必须外购？ ”

对于一些必须使用的经费和物资，总理在审查批准的同时，也都要求精打细算，尽量节省。 1952 年 6 月，总理在批准总后关于筹购一批防疫药品时指示：“ 一控制药品器材的种类和数目，疫苗如保存过多，易失时效，如分配过多，则转成浪费，消毒药品如易保存并能作其他用处的，可照此数制购，否则应减少数量；二、其他经费亦应尽量节省。 ”1953 年初，总后请示给沿海边防部队修建营房，追加一笔预算，总理指示同意，同时要求“ 应将单价再行核算一下，力求节省 ”，把追加数目控制在总预算之内，“ 如不可能，则须提请中央决定 ”。

不掉一粒米，不浪费一杯茶

周总理吃饭从不丢掉一粒米饭，有时不注意掉了，便拣起来吃。他吃完饭，也总是倒点开水在碗里喝下去，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吃剩下的菜，要服务员留下，下顿饭给他吃。

有一次，中央首长在某地开会，总理吃饭时由于右手不方便，掉了几粒米饭，立即拣起来吃了。服务员们见了感动得掉了泪，想到自己平时大手大

脚的浪费行为，很惭愧，决心向总理学习。休息时，大家挖野菜，煮了一锅忆苦菜汤。周总理知道了，高兴地说：“好啊！让我们也尝尝嘛。”大家都不愿让总理吃野菜，可是总理非要吃不可，只好做了一盆野菜。一端上来，总理第一个上去盛了满满的一碗。陈毅同志怕总理吃多了。从总理碗里拨去了一半，总理认真地说：“盆里还有，你怎么要我的？”陈毅同志说：“我帮你吃一点嘛。”总理又说：“那还行！”说着又盛了一勺把碗加满。饭后，周总理高兴地说：“这顿饭吃得很好哇。”

还有一次，周总理在天津招待所吃早点，喝了一小碗豆浆，吃了半套煎饼果子。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理对服务员说：“请你把我早上剩的那半套煎饼果子拿给我吃。”服务员告诉总理说：“早已处理了。”周总理教育服务员，要注意节约，不要浪费。总理还对服务员说，给沏茶不要喝一次就倒掉，一天换一次茶叶就行。

1960 年，周总理陪同柬埔寨贵宾到南京参观。在会客厅会见外宾时，服务员为每一个人都泡了一杯茶水。会见结束后，周总理微笑着对服务员说：“这杯茶还没有喝完，不能浪费掉，我要把它带到餐厅去。”说完，服务员要替他端，总理说：“不用了，我自己来。”

1973 年 10 月，周总理在河南洛阳市洛阳宾馆休息时，护士请总理按时吃药，不慎把药掉在地上。护士说，再换一片算了。总理不同意，坚持把药找出来，就用手绢把这片药擦了擦，照样吃了下去。周总理珍惜的何止是一片药啊，而是我们党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

象这样的随时随地、一点一滴的节约事例不胜枚举。

周总理在居住的西花厅给工作人员规定了随手关电门的制度。他外出也不例外。有一次总理到北京饭店开会，因为天晚了，警卫战士把门外的灯打开了，总理说：“不要开了，注意节约。”说着随手把灯闭了。他在飞机上，从不浪费一个清洁袋，总是到厕所去吐痰。乘务员劝他吐在清洁袋里，他说：“我还没有老到走不动的程度，清洁袋留着还可以用。”还有一次，总理到延安时有次吃西瓜，看见地毯上滴了点西瓜水，就连忙蹲下，掏出自己的手绢把它擦干净，并告诉同志们说：“这西瓜水落在地毯上，如不及时搽掉，以后就不容易擦干净了。

友好重在精神，不在排场

在外事工作中，周总理坚持了“勤俭办外交”的方针。他多次指出：“友好重在精神，不在物质，尤其不在排场。”所以在接待工作中，总理会见外宾的会客室，要求布置得朴素大方，什么鲜花、糖果之类都不要。宴请外宾，也贯彻了“四菜一汤”的原则。

1951 年，随着外宾来访的增多，政务院有关部门草拟了一个《关于接待工作今后的改进办法》，报送给周总理审核。7 月 8 日上午送去，当天下午就批下来了。总理批示：“同意。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对《办法》中的每一项批示了具体意见，例如，《办法》中提出“水果按季节一律用国产”，总理批示：“以少为好，不要多”。《办法》中提出“菜仍中餐西吃，材料用国产”，总理批示：“数量亦不宜大。”《办法》中提出了用酒的品种，总理批示：“汽水亦需国产。酒不要多。”

在实际执行中，总理都是严格按照朴素节约的精神做的。 1953 年国庆节前夕，政务院负责专家的工作部门向总理报送了宴请专家的计划，总理审查时，除对宴请程序和宾主名单作了改动外，并对菜的样数和每人费用标准作了削减。

有的单位在安排外宾到农村参观，从北京带去高级餐具，从大城市订做饭菜去设宴招待。周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种作法。他指示用当地的土特产，按当地的习俗，就地做农村风味的饭菜招待。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 1973 年 9 月 15 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大同参观访问。这之前，邓颖超根据总理的指示，专程从北京到大同，检查接待准备工作的全面情况。在谈到欢迎宴会的准备时，邓颖超嘱咐：要搞得有点地方特色。并顺便说了一句，总理很喜欢吃高粱米。高粱米是大同地区人民几乎每天都吃的家常便饭。宴会上，总理和客人高兴地吃了煮玉茭、高粱米粥，又吃了当地产的鸡蛋和土豆片。

收旧利废，变无用为有用

早在 1952 年,周总理就曾亲自布置总后和有关军区后勤部组成专门小组清理和利用库存物资，充分挖掘潜力，消除积压浪费，保证杭美援朝的需要。1953 年，总理还要求志愿军在前线收旧利废，他指出：“ 在朝鲜战场上，可能有遗弃的军械辎重及铁路运输工具等项废品，应由各有关部门组织回收利用。 ”

1958 年 7 月 6 日，周总理在广东新会县参观废物利用商店和废物利用展览会。在废物利用商店，总理走遍了每一个柜台，询问职工生活和业务情况，鼓励大家多想办法做好废物回收利用工作。在废物利用展览会上，总理对每一种物品的利用，如桔皮、橙皮、稻秆、果核、葵叶、野生淀粉和野生油料果利用，都逐一观看和详细询问。总理参观展览会后，对县委领导和展览会工作人员说：“ 商业工作也要破除迷信。过去有人认为商业工作不过是做买卖，交换，分配，只为生产服务不能生产价值的。 ”“ 要改变这个观念。你们组织收购废物，变废物为有用，这证明打破常规，商业也能增加财富。 ”周总理对新会县废物利用一年可创 700 多万元产值和开展废物利用的经验十分赞赏，称赞新会县人民懂得辩证法，并且亲笔为废物利用工作写下了光辉题词：“ 全国商业部门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应该向新会学习，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把工农商学兵联成一片，密切协作，为全面地发展生产服务，以便更好地实现勤俭建国、改造社会的任务。 ”

周总理到大庆视察时，在大庆缝补厂，总理拿起一件用 160 多块碎旧布拼成里子的棉工作服，仔细地翻看，说：“ 你们这样做很好，要继续保持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

艰苦朴素　与群众同甘苦

艰苦奋斗，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本色，它具体反映在每一个干部和党员的身上，就必须是艰苦朴素，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从而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真心实意的拥护。

周总理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都还不高的情况下，他身体力行，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吃得很简单，从不大吃大喝，还时常到职工食堂用餐；他穿的衣服，有的补了又补，修了又修，一穿就是一二十年；他住的房子，是老式旧平房，设备很简陋。

这样的工作餐既经济又实惠

国务院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以及总理临时召集的会议，有时时间较长，需要准备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即家常便饭，四菜一汤。根据总理规定精神，主食一般是大米饭、馒头，有时吃窝窝头或烙饼；副食，一般大烩菜或四菜一汤。大烩菜也好，四菜一汤也好，都是普通蔬菜和豆腐、粉条之类；有时有一盘肉片（丝）炒菜，最好的时候，也只是一盘鸡或者鱼。总理常讲：这样的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参加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例会吃完饭以后，还必须交钱、交粮票，才能离开食堂。未带钱和粮票的要记帐补交。

方志纯回忆说：

1954 年，我从江西到北京参加国务院召集的一次会议。会议结束时，工作人员宣布说，今天中午周总理请大家吃饭。我们听后，都欢呼雀跃起来。我心想，总理请大家吃饭，没有山珍海味，也肯定是美味佳肴。谁知，当大家走进中南海一个餐厅一看，都瞪大了眼睛，相对愕然。原来，餐桌上除了馒头、煎饼和一大盆粉丝、白菜加肉片的大杂烩菜之外，别无其他菜肴。正在大家疑虑之际，周总理走进了餐厅，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总理，多少颗心在盼望着，盼望着总理能在自己这一桌入席啊！总理走到我们这一桌旁，与同桌的同志握手后，环顾了周围，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坐下来就餐。总理笑着说：吃吧，没有什么好的招待同志们！说着拿起馒头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周总理为我们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楷模。

杨少桥、赵发生回忆说：

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以身作则，同全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在国务院开会，到吃饭时会议完不了，经常同总理一道吃饭，主食是窝窝头、馒头，有时有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还有一次，总理在自己家里同李先念、陈国栋、杨少桥四人讨论粮食问题，到了中午，邓大姐招待他们吃饭，也是四菜一汤，而且盛菜的盘子也都不大。

朱光亚说：

1962 年 11 月，二机部提出了研制原子航弹的两年规划。　12 月 4 日周总理召集专门委员会开会对这个规划进行审议。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总理便留大家吃午饭。餐厅摆了两张普通大圆桌，每桌都是一大盆肉丸子熬白菜、豆腐。四周摆几小碟咸菜和烧饼。周总理同大家同桌就餐，吃同样的饭菜。

1963 年的一次晚餐也是这样的饭菜。大家都入席了，后到的贺龙元帅进

入餐厅后，望了一眼每张桌上的食物，风趣地对总理说：“呀，国家经济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总理笑道：“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沈鸿说：

1965 年 11 月 24 日下午，周总理接见了参加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的 80 位代表。代表们受到了极大鼓舞，认为今后机械产品的设计工作，在思想上、方法上、组织上更加明确了。

那天，周总理同大家的谈话，越谈越多，谈得很晚了，周总理就说：“你们不要慌，今天我请你们吃饭。谁也没有想到周总理会请臼己吃饭。在会议厅， 80 个人坐了 10 桌。一个大锅菜（白菜熬豆腐），另外有四小盘小菜。回来后，许多人问我，“周总理平时就这样生活吗？”我说，“当然是这样。”大家伸了伸舌头，十分惊讶，没想到周总理生活这么俭朴。

钱三强回忆说： 1966 年 11 月，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周总理特地找了专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去他的办公室，高兴地对我们说：“群众都在庆祝胜利，我们也在这里庆祝一下。庆祝方式极简单：只备有一小碟鱼冻作酒菜，并破例充许喝儿口酒。那种简单的庆祝方式，代表了他平日生活朴素的作风，对我们都是极大教育。

我们应该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

总理和邓大姐留朋友和过去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吃饭，饭菜从来都很简单，素菜居多。三年困难时期，有同志对总理说，你们都是老人了，日夜操劳，应该过得好一些。国家再困难，也不能没有首长吃得稍好一些的时候呀，邓大姐接过话茬，说：“今天的生活水平比起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不知好了多少倍，我们很满意了。”总理也说：“为了战胜经济困难，毛主席提出不吃猪肉，不吃鸡蛋，不吃好米，我们应该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

谢冰心回忆说：

我们从日本回国后， 1952 年的一个初夏夜晚，周总理接见了我们。总理亲切地招呼我们在他的旁边坐下，详尽地询问了我们在外面的情况。时间到了午夜，总理留我们和他共进晚餐。当我看到饭桌上只有四菜一汤，而唯一的好菜还是一盘炒鸡蛋时，使我感到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地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在我们谈话吃饭之间，都有工作人员送进文件，或是在总理耳边低声说话。我们虽然十分留恋这宝贵的时刻，但是我们也知道总理日理万机，不好久坐，吃过了饭不久，我们依依不舍地告辞了。

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1959 年新春佳节期间，周总理把几位专管人民大会堂工程的负责同志找去研究工作。总理开门问道：“工人同志们吃过饺子没有？”同志们回答，为了让工人们欢度春节，已经把饺子送到工地，保证充分供应。总理听后放心地笑了。可是当天，总理的午饭只是一锅白菜熬豆腐。

1965 年 10 月，周总理约请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到总理家里谈心。谈完后，总理热情地留他们吃饭。总理客气地说：“今天没有准备，你们就吃顿便饭吧！于是，就在总理陈设简单的会客室里，用屏风挡住

一角，作为饭堂，端上了饭菜。都是一般饭食，只有三菜一汤，而且基本上都是素菜。

不要进了城市就丢了农村

1965 年 12 月，周总理请新疆和田文工团和内蒙古乌兰牧骑文艺战士一起去他那里作客。总理和大家一起吃玉米饼子，大锅菜。他手拿玉米饼子语重心长地说：“今天请你们吃饭，不象招待外宾那样吃珍贵的东西，而是吃家常便饭，吃玉米饼子，大锅菜，就是要大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要进了城就丢了农村。你们大多数是从帐篷中来的，不要忘掉了帐篷。”总理还说：“从马上来的，要回到马上去。”全体演员听了周总理这番话，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个个热泪盈眶，大家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做，一定要学习您的榜样，永远不忘本，永远不脱离人民。”

1970 年 7 月到 11 月，周总理先后四次在中南海接见北京大学及外语院校的师生代表。在几次坐谈会上，周总理和大家共进夜餐，都是一碗稀饭，两个包子和一碟雪里蕻咸菜。

吃点高粱米，回忆度过的艰苦岁月

1963 年 6 月 21 日，周总理陪崔庸健委员长到沈阳参观访问。总理知道这一天是崔庸健委员长的 63 岁寿辰，他亲自告诉接待人员要做寿桃，做寿面，还让做软一点的高粱米饭。接待人员有些大惑不解，总理深情地说：“崔庸健同志和中国人民长期并肩战斗，抗击共同的敌人，在东北就参加过抗日联军。现在，让我们吃点高粱米，回忆共同度过的艰苦岁月。中朝人民有说不尽的战斗情谊啊！”当崔庸健走进宴会厅，看到隆重的情景，弄清楚是周总理为他祝寿时，非常感动。

1966 年 5 月 3 日到 4 日周总理到大庆视察，一到大庆，他就规定顿顿要有粗粮，一律不喝酒，并亲自审定了食谱。这天的午饭，主食是高粱米芸豆干饭，玉米渣子粥，副食是白菜，土豆，萝卜大锅菜。周总理香甜地吃了一碗以后，兴奋地说：“我爱吃你们这种高粱米饭，请给再来一碗！”炊事员听了心里不安，几次提出要把准备好的蛋糕，点心端上来，都被总理谢绝了。

周总理 3 次去大寨视察，每次都嘱咐不要铺张浪费，不要给群众造成负担。 1965 年 5 月 21 日，第一次去大寨前，总理在北京就指示，要吃大寨饭——玉米面窝窝头和小米稀饭。因此，除安排本地的主食外，只配了用大寨农副产品做的四菜一汤。总理吃着窝窝头，喝着小米粥，满意地说：“这个饭很好吃。”1967 年 4 月 9 日第二次来大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到了社员家里，大口大口地吃玉米面烤饼和窝窝头，还用手帕包起来，装在衣兜里带回去吃。离开大寨时，还特意带了一些大寨人做的玉米面烤饼，说要给其他中央首长尝一尝。

1973 年 6 月 9 日，周总理到延安住在第一招待所。他让准备几样简单的菜。要吃陕北的小米饭和荞面周总理吃着延安的小米干饭，荞面饸饹特别香。他常说，延安的小米哺育了我们。地委的同志关切地对总理说：“您年纪大了，吃小米不好消化。”总理说：“很好，高粱米也可以吃。”

1963 年 6 月 10 日，周总理去天津视察水利工作。那天，总理请大家吃

了一顿贴饽饽熬小鱼。总理说：“这是天津人民喜爱的饭菜，烧起来也很简单，锅里熬小鱼，周围贴上玉米面饼子，一下子连饭带菜都作成了。还有一次，在密云水库，总理和大家围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和同志们吃了一顿亲手包的家常饺子。

给我弄好吃的，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

1962 年五六月间，为贯彻党中央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周总理和邓颖超在东北三省工作了一个月。一到住地后，总理就对管生活的同志“约法三章”说：“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按照总理的规定，每顿饭只能给他做两小盘素菜一个汤。

同志们看到周总理日夜操劳，伙食又很普通，都非常心疼，变着法地想让总理吃点肉食。一次，管理员偷偷地买了点香肠，切成碎末拌在咸菜里。总理发现后，马上叫邓颖超到厨房去查看，并说服大家今后再不要买了，还把剩下的香肠分给了工作人员。为这件事，周总理再次对管生活的同志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憋着口气战胜困难，你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

从此后，邓颖超三大两头下厨房，看买的东西是否合乎规定，做菜是否加了肉类。管生活的同志一看把关这样严，含着眼泪恳求邓颖超说：“你就做做总理的工作，让加一点好菜吃！总理担着国家的重担，联着亿万人民的安危冷暖，影响健康，我们于心不忍哪！”邓颖超说：“同志们的心意我们理解。不过，还是按恩来同志说的办吧，做了，他不能吃，你还得挨批评。”

有一天，总理来到鞍山，服务员做了四菜一汤，他亲自端下两个菜，告诉留着下顿热热吃。总理点名要的东西有两样，一个是让弄点地瓜粉，早晨冲着喝，一个是高粱米，保证每天吃一顿粗粮。同志们担心不好消化，总理说：“东北人民能吃高粱米，我当总理为什么就不能吃呢？”

周总理到昆明时，也规定每顿饭的标准，绝不让超过规定的标准，菜多了就叫退回去。有一次，云南省委同志打算请总理尝尝云南名菜“烤小猪”。总理知道了，马上制止说：“小猪吃了可惜，把它养大了可供多少人吃呀！”总理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大师傅总想给他做点爽口的夜餐，可是都被他谢绝了，只是偶乐喝一小碗绿豆稀饭。总理还关切地了解昆明市人民吃不吃杂粮，并且一再问为什么不给他搭杂粮吃。第二天，总理吃到杂粮时，连连点头说：“这就对了。”

1967 年 7 月，周总理去武汉，每到一地，干部、战士也总想准备些丰盛的饭菜让总理吃得好一些，可是总理都一一谢绝了。他经常叮嘱工作人员，一不要超过伙食标准，二要如数付饭钱。总理吃的常常是几小碟白菜、绿豆芽、雪里蕻、豆腐之类的素菜。有时在汽车上吃几块饼干也算一顿饭。一次，总理忙，邓颖超先吃饭，她让工作人员另拿盘子，亲手把每一种菜夹出了一些，留给总理吃，说：“这样免得浪费。”

周总理在飞机、火车、轮船上，吃饭就更简单了。

1963 年 12 月 7 日，周总理到南海前哨视察 846 舰。中午在舰上吃饭，最好的菜是菜花炒肉片和鱼，再加几小碟咸酸菜，酱黄瓜。就是这样的几个菜，总理还嫌做多了，并一再询问：“战士们能吃到这些菜吗？”政委答道：

“战士们都吃得很好。”这样，总理才高高兴兴地和战士们一起吃了午饭。

1965 年 9 月，周总理陪来我国访问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重庆坐长江东方红 32 号轮船前往武汉。在船上，总理明确提出他既不吃高级饭菜，也不吃高级点心，并对有关人员说：“做点普通菜吃好了，不必讲究。”这天，总理只点了豆花，红薯泥等几样普通菜吃。总理早餐也只吃点稀饭，馒头或小包子。一天晚上，总理的秘书请服务员叶龙春转告厨房给总理弄点夜宵。不一会，厨房送上来一碗赤豆汤，小叶心里觉得十分过意不去。第二天早晨，没想到总理的秘书对她说，总理 10 多年没喝过赤豆汤了，夜间喝了赤豆汤很高兴，叫我转达谢意。

多做的菜就留到下顿吃吧

周恩来到上海常常住在锦江饭店，他严格要求每顿饭只能是两菜一汤，决不允许多烧一个菜。有一次，给总理多烧了一个菜，总理说：“你们关心我是好的，但不能超过标准，这个菜就留在下顿吃吧。”在菜的质量方面，总理吃的经常是普通的家乡菜。有一次，总理提出要吃霉干菜烧肉，并说让随员也尝一尝。吃饭时，总理发现肉多菜少，就说做菜的大师傅是外行。其实，大师傅是想让总理多吃点肉，增加点营养。吃到一半，总理若有所思，好象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便端起饭碗走到随员那边去了，一看随员吃的是菜多肉少，就批评有关方面没有“一视同仁”，于是就坐在随员那里一起吃了起来，又说又笑，很有风趣。

1971 年 6 月，周总理在南京，饭店打算每顿给他备四菜一汤。可是，吃第一顿饭时，总理就指着桌上的菜问：“谁叫你们弄这么多的？”饭店的同志说：“总理难得回来，搞几个家乡菜给尝尝味道。”总理说：“正因为我是到了家乡，你们更不能把我当客人，吃点粗茶便饭就很好嘛！”尽管周总理这样说，饭店同志还是舍不得把菜端掉。谁知他仍然只吃一个菜，其余三个菜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1964 年春，周总理出国访问归来来到成都。第一顿饭是四菜一汤，总理就指出：“菜多了，吃不完浪费，要注意节约。”他便叫服务员端了一样下去，晚餐时再热热端来吃。到了晚餐时总理还问：“中午那样菜呢！”周总理还提出饭里要掺些杂粮。邓颖超也多次和厨师商量，如何不超过标准，节省国家开支。周总理工作到深夜，也只吃一小块糕点，喝一杯开水。

有一年，周总理到天津视察工作住在市委招待所，一天，服务员给周总理做了三样主食，总理吃饭时，开玩笑地对服务员说：“你们做这么多，究竟让我吃哪个好呢，不吃就浪费了。”接着，总理便规定服务员每顿饭的主食只能做一种。

1962 年周总理在辽宁期间，辽宁宾馆的大师傅实在按捺不住对总理的崇敬和爱戴心情，一次，试探着为总理做了四菜一汤。总理发现后，耐心解释说：“不是讲一顿两个菜，怎么今天翻了一番呀？”总理一定要服务人员撤下两个菜，留着下顿热热再吃。服务员同志只好噙着热泪撤下两个菜。还有一次，总理和邓颖超先来吃饭，秘书、警卫员还有工作，晚来一会儿。总理就亲自把饭菜拨出一份，通知服务人员留给未吃饭的同志。服务员恳请总理不必留，一会儿再给他们做。总理笑了笑说：“你们是按全员上的菜，人来一半，就该用一半。这样一可使你们免劳，二又不超过标准，两全其美嘛！”

东北局和省委的领导同志曾一再进言，劝总理在生活上随便些。总理总是爽朗地说：“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当前是困难时期呀！我们共产党人，应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人民同甘共苦，共渡难关。”

与工人一起排队买饭吃

1958 年 7 月 15 日上午，周总理到上海第一钢铁厂视察。这天中午，周总理在巡视炼钢生产以后，回到厂办公室。陪同总理的王祖宇说：“就在这里吃饭吧！”周总理说：“这怎么行啊！”说着就拉王祖宇一起向工人食堂走去。食堂的同志把准备好的饭菜端了上来，可是总理怎么也不肯吃。他和工人一起在窗口前排队买饭菜。总理指着一碗卷心菜“这个菜多少钱？”回答：“五分。”“我就吃这个吧！”总理说着又买了二两饭，然后到长桌上和工人同志坐在一起吃饭。总理边吃边对身旁的炊事员说：“这饭烧得很香，菜也烧得很好，味道不错。你们辛苦了，你们的工作很重要。”7 月 17 日上午，总理在钢厂召开座谈会，下午又穿起工作服，跑遍了全厂各个车间和建设工地，并一道参加劳动。总理挥臂和工人一起加料，一起投掷补炉镁砂，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炼钢工人看到总理挥汗战斗，便给总理送来盐汽水，可是，总理笑呵呵地对大家说：“这是高温工人喝的，我不能特殊啊！”大家连忙说：“我们都喝这个。”这时，总理才欢畅地和大家一起饮用。在炼钢空隙时间，总理同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促膝谈心，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不吃熊掌，吃酸菜

1959 年，周总理到哈尔滨“三八”饭店视察。饭店的同志准备做熊掌、海参等二十多样菜。当厨师们正在忙碌备料的时候，周总理派人来通知说，用餐不吃别的，专吃黑龙江的家常便饭，并且点了四样：炖冻豆腐、酸菜粉、土豆炖茄子、炒豆芽。 1962 年，周总理再次来黑龙江省视察，一到北方大厦就宣布，我们国家处在困难时期，伙食不能超过规定标准，不吃肉，不吃过油食品，要吃粗粮。一天，厨师做了一盘油炸豆。饭后，总理让邓颖超传达他的指示。邓颖超说：“事先不是说过了，不吃肉，不吃过油的食品吗？老百姓每个月才几两油啊，全国人民都很困难，我们能吃得下去吗？我们吃这种油炸豆心里难过。希望同志们以后不要这样做了。”邓颖超同志还说：“黄豆本身就有油，搁点咸盐，放点葱花，用水煮煮吃就不错了。”第二顿，给总理上的是黄豆芽炖豆腐，总理高兴地说：“这就很好嘛！”1963 年，周总理陪同朝鲜外宾到黑龙江访问。总理一到就提出要吃高粱米芸豆饭。餐厅服务员陈振兰同志不忍心让总理吃粗粮，开始只给总理盛了半碗。总理几口就吃没了，还要服务员给他盛。陈振兰同志对总理说：“高粱米不太好消化，还是吃点别的吧。”总理笑着说：“没事，我的消化能力很好。”没办法，陈振兰又给总理盛了一碗。这时总理一边吃，一边问身边的人，你说高粱米是红的好吃，还是白的好吃？这个同志回答说，白的好吃吧？总理一听笑了，说：“你说的才是外行话呢，高粱米还是红的香。”

串串门，吃吃家常饭

1959 年冬，周总理来到河北省安国县五仁桥公社视察工作，到社员家与社员亲切交谈。到吃饭的时候，就同社员一起吃红薯。总理边吃边关心地问社员群众：冬天吃凉的怎么行？没有煤，柴火怎么解决？取暖怎么解决？总理嘱托当地干部要关心群众的生活问题，要解决社员吃凉饭和冬天取暖的问题。在场的干部和群众，看到总理和他们一起吃红薯，并对他们这么关心，都十分感动。

1966 年春大，周总理到河北省遵化县当年的“穷棒子社”——建明公社西铺大队。他象久别的亲人回到村里一样，见到街上的孩子，就亲切地抱起来；见到社员，就拉着手问寒问暖。总理拉着老贫农王荣和王生哥俩的手问，身板结实不结实？到吃饭时，总理一看没有王荣、王生哥俩，就叫人去找他们，还让王国藩亲自去找。一个在旧社会要饭的叫花子跟总理同桌吃饭，真不知说什么好。周总理吃小米绿豆粥、玉米饼子，把好饭好菜不停地往王荣哥俩碗里送。饭后，总理提出要到他们家里看看。总理健步走进王生新盖的住房，问新房是哪年盖的。当总理听说还有过去那两间草棚时，总理便起身又走进了在旧社会当长工和要饭时住的那两间破草棚。当时总理说：“我太忙了，不然要在这里住一宿，好不忘本。”

为减少麻烦，宁可吃剩饭菜

1959 年 5 月，周总理到天津视察工作。 28 日上午，总理来到南开大学。午后，总理走进了南开大学的职工食堂。炊事员们看到总理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一个个心情振奋，都笑着跟总理打招呼。周总理走过去同他们亲切握手。

这时，开饭时间已过，炊事员正忙着收拾洗涮，并为晚饭作准备。周总理看到了说：“你们工作很忙啊！”“又在做下顿饭了？”总理走到一个菜桶旁边，俯下身子看着问：“中午的菜没有卖完？多少钱一份？”旁边的大师傅回答说：“这是萝卜，5 分钱。”他又指着另一个菜桶问：“这个呢？”回答：“小白菜粉条，也是 5 分钱。”

周总理看到宠展上有中午开饭后剩下的窝窝头，就过去拿了一个，用手掂了掂问：“窝窝头多少钱一个？”回答：“两分。”“好，我买两个。”总理说完，拿着两个窝窝头走出厨房，在饭厅中随便找了个座位，笑着说：“就在这儿吃饭吧，吃饱了好参观。”总理又招呼同来的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你们忙了半天，肚子也一定饿了，坐下来一起吃饭吧！我请客！”总理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周总理要在这里吃午饭，可把炊事员们急坏了，因为事先没准备，菜差不多都卖完了，剩下的也都凉了。拿什么给总理吃呢？总理看出了炊事员们的心思，便对他们说：“来一盘 5 分钱的萝卜，再加两分钱的咸菜。”总理又告诫说：“千万别给我做菜。”炊事员只好按照总理的意见，给他盛了一盘罗卜和一小碟咸菜放到餐桌上。周总理一面夹着萝卜，大口大口吃着窝窝头，一面对坐在他旁边的同志说：“我就是喜欢吃萝卜。”

吃完饭，总理又一次来到厨房，和大家握手告别，连连说道：“谢谢你们。”还鼓励大家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

还有一次，那是 1964 年深秋的一天，周总理在吉林送走了外宾之后，深夜 11 点来到一个招待所。服务人员准备为总理做牛奶和点心，总理却问：“有粥吗？”回答是没有。总理又问：“有饭吗？”回答是就有剩大米饭。总理说：“把大米饭用热水烫烫，不就成粥了。”他们只好按总理的意思做了。

值班服务员看到总理劳累了一天，夜餐只吃了一点剩饭，心里很不好受，盘算着明天早饭一定让总理吃好。可是，没想到总理刚吃完夜餐就嘱咐：“明天早晨给我做高粱米吧。”厨房的老师傅把高粱米淘了又淘，搓了又搓，为总理做了高粱米粥。开饭时，服务员又把一盘月饼点心摆到餐桌上，总理问：“还上这些做什么？”服务员向总理说：“今天是中秋节啊！”总理微笑起来，但还是只吃了高粱米粥。

同演员一起吃南瓜

1959 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期间，有一次，周总理特地来到为会议演出的江西省赣剧团和省歌舞团就餐的食堂，要求和同志们一起同桌吃饭。全团同志听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但回头一看，桌上只有一般的菜，怎么招待我们的总理呢？这时，周总理一眼就看出了大家的心事，他走到桌边就用筷子夹起南瓜尝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讲：“南瓜好哇，我们红军在井冈山吃的就是红米饭、南瓜汤，‘天大吃南瓜，打倒资本家’，大家吃南瓜呀！”周总理亲切风趣的话语，和蔼可亲的态度把大家都逗乐了，个个都心里热呼呼的。

总理吃完饭，还倒一点开水把碗里剩下的饭粒喝掉， 决不浪费一粒粮食，并且亲自动手洗刷碗筷。剧团离开庐山那天，同志们邀请总理下山时再到剧团来，总理兴致勃勃地笑着说：“一定去看你们，只要准备南瓜、红薯喽！”总理的话又把大家说乐了。

帮助机关食堂改进做窝窝头

周总理向来都很关心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就餐的饭菜质量问题。他经常在吃饭时间，深入到机关食堂，有时转转、看看，有时就排队买饭菜，和工作人员一起同桌吃饭。

1958 年 7 月的一天中午，周总理来到机关大食堂吃饭，买了一个 7 分钱的西红柿豆腐和一小盘凉菜、两个馒头，走到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他边吃边和同志们谈话，询问他们是那个单位的，做什么工作。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周总理更是经常到大食堂吃饭， 了解伙食情况。有一次，总理在大食堂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饭时，听到同志们反映面粉掺红薯的窝窝头做得不好吃，他就回到自己家里和大师傅一起试验改进做窝窝头，每试验一次，总理就尝一次，直到比较好吃为止。总理还到机关食堂去介绍做窝窝头的新方法。

还有一次，周总理要习仲勋和他一同到机关食堂吃饭。总理排队买了几个窝窝头和素炒白菜，他们与工作人员一道吃。总理边吃和边问食堂的情况，还注意大家的脸色和健康情况。回来以后，总理对习仲勋说：“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机关食堂的主食和副食都差，看上去每天热量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改善群众生活。”根据总理指示，机关食堂搞了生产基地，自己动手，种

地、养猪、磨豆腐……生活很快得到了改善。这个办法，迅速推广到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机关食堂，对渡过三年经济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有时周总理还到人民大会堂职工食堂就餐，同志们看到总理来了，都让他先买，可总理笑着说：“就按刚才排队的次序很好，你们要不买，我也不买。”总理每次都是买点青菜、萝卜之类的素菜，买几个馍馍或窝窝头，和职工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谈。当总理把掉在桌上的窝窝头碎屑捡起吃下，把菜碗剩下的汤喝下时，人家心里顿时升起钦佩崇敬之情。

1960 年 4 月下旬，正值中印两国关系十分紧张，周总理为了进一步巩固祖国的西南边疆前往印度进行会谈。有一天中午，周总理由他的住处突然来到我驻印使馆，这时使馆的同志正在吃午饭，大家看到周总理来了，都很高兴。同志们心想周总理白天谈判，深夜还要举行记者招待会，为革命操劳，十分辛苦，想给总理做点可口的饭，正忙着要做饭时，他却早已端起桌上的一碗面条，和大家坐在一起吃起来了。周总理这种平易近人，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使在场的同志无不感动。

破旧衣物修补好还可以穿用

周总理的一套睡衣和睡裤，是 1951 年做的， 20 多年来，穿破了就补，再破再补，白底蓝格的绒布已经磨成无绒无格的白布了。夏天，当总理彻夜工作到第二天晨曦初露，凉意扑来时，就披着这件睡衣，继续勤奋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总理到外地甚至出国，穿的也是这件睡衣。有一次，总理出国访问，我国驻外使馆有位同志，看到总理穿的衣服太破旧了，就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两件新的送给他，总理没有接受。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提出要给总理添置新衣，总理总是和颜悦色地说：“旧的还可以穿嘛！”并教育工作人员：“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总理的一件衬衫，很破旧了，换一换领子、袖口，总理仍穿着它到外地视察，接待外宾。

1958 年秋天，在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周总理的随行人员拿着一件旧衣服，请服务员同志送洗。服务员接过来一看，发现衣袖子和领子上都补了补钉，心想：这位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可真艰苦朴素呵。当服务员把洗好的衣服送还给总理的随行人员时，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您在中央工作，常跟随总理出国，还穿打补钉的衣服，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真值得我们学习呵！”这位随行人员解释说：“不，不，这件衣服不是我的，是总理的。他的衣服不穿到不能再穿的时候，总是舍不得丢掉！”

有一次，总理在沈阳，宾馆警卫人员在总理住的房间附近，发现晾着一条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衬裤，两个膝盖处补着补钉，就问服务员：“谁的衬裤往这搭？”服务员说：“是总理的。”他们靠近细看那补钉上的针脚，看得出是上年纪的人做的活计，猜想一定是总理自己或邓颖超同志缝的，很受感动。

周总理戴的帽子破了，也舍不得扔掉。工人们想尽办法给修理好，总理一直戴着它。有一次，在总理出国访问的飞行途中，机械长看到一顶很旧的米黄色凉帽挂在总理的客舱门口，他感到不大好看，想把它放到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去。当拿下帽子一看，里面写有一个“周”字，他愣住了，心想这难道是周总理的帽子？正在这时，总理的秘书告诉他，这正是总理戴了多年的凉帽。

周总理穿的鞋，夏天穿的是一双黄颜色的皮凉鞋， 春、秋、冬总是穿着一双黑皮鞋。这两双鞋已经穿了 20 几年，鞋底和皮鞋带修补、换过多次。由于没有多余的皮鞋可换，工作人员几次给他换鞋底，都是利用他睡觉的时间修理的。总理穿的袜子，都是织补了又织补。一个补袜板，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用的，他从西柏坡带到北京，一直留着织补袜子用。

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

1957 年，总理在人民服装厂红都门市部做过一件呢料中山服，一直穿了六、七年，先后两次翻旧改新，多次反复修补，连衣服里襟都被剪下来换做领子，袖子上的补钉越补越大，竟占了整个袖子的三分之一，实在应该做件新衣了。

为此，服装厂的师傅精选了衣料样子送请总理选定，总理没有选，却送来了一件几十年前的旧式西服，要求把它改成中山服。工人师傅怀着崇敬的心情，群策群力，精心改制，总共拼接了 20 多处，仅一个衣兜就拼了四小块。为了弥补明显的拼缝，他们又请普兰德洗染店的师傅精工织补。衣服改做好后，总理十分欣赏它，夸奖师傅们的手艺巧夺天工。以后，总理经常穿着这件衣服外出视察和接见外宾。

有一次在沈阳接待外宾，总理幽默地说：“ 今天该穿哪套“ 礼服 ”啦。工作人员拿出来一看，上衣后腰上有一处是刮破后又用线织补上的。这位同志十分感动地说：“ 总理，你这套“ 礼服 ”早该换换啦！总理笑着说：“ 这就满好啦。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 ”又说：“ 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 ”

用三合板和小炕桌办公挺合适

在周总理卧室里有一块三合板与一只造型奇特的小炕桌，这里有着一番动人的来历。周总理工作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随时随地都在批改文件。有时没有桌子，就顺手拿起一本书垫在文件下，书写很不方便。大约是 1960 年，一天，周总理发现用一块小三合板，作为批改文件的垫板很合适。从此，周总理就把一块小三合板放在卧室。一位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 为了总理的健康，我们常常轮番去请总理休息，总理总是笑着说：‘ 你们是联合向我进攻啊！ ’不得已时，总理才答应我们，回卧室去了。但我们到卧室一看，总理却坐在床上，屈膝把三合板放在膝盖上，又批改起文件来。 ”简陋的三合板成了总理每夜在床上工作时不能离开的办公用具。岁月像流水般地逝去，在这简陋的三合板上，不知批改了多少重要的文件；不知浸透了多少总理为党为人民辛勤操劳的汗水！过度的工作，损坏了总理的健康。总理长时间地在小小的三合板上一页一页地批改文件，累得手都发颤了，有时笔掉在被子上就睡着了。邓颖超为了改善总理的工作条件，保护总理的健康，就亲自设计了这个造型奇特的小炕桌，用以代替三合板。这个小炕桌一边高，一边低，放在床上，面向总理呈现一个斜面，使总理可以靠在床上伏案工作。桌面四周还加了边框，使文件不致散落到床上，减少了用手扶文件的力量。这个小炕桌倾注着邓颖超同志对周总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它体现了邓颖超同志对周总理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伟大事业的衷心支持。也反

映同总理为党和人民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带国产手表，坐国产汽车

自从我国自己能生产手表起，周总理就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带着。有一次，总理带的手表坏了，送去修理。有的同志看到总理带着这样一块普普通通的上海牌手表，怀着对总理崇敬的心情，给总理送来了一块外国新型表。但是总理微笑着摇摇头，退了回去。

在我国的解放牌汽车生产出来之后，周总理指示要自力更生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生产的轿车。红旗牌轿车刚研制出来，周总理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坐国产车。”当工作人员劝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说时，他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了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由于红旗车体型大，周总理经常看望一些民主人士，张治中、李济深、齐白石等人都住在北京市的小胡同里，红旗车开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保留了一辆灰色吉姆车。也只是在需要钻胡同时才使用，平时都是用红旗车。

随着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国产轿车渐渐多起来，除红旗车外，还大批生产了上海牌小轿车。从 60 年代始，凡属大的活动，周总理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无论是党的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交活动，总理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

后来，国家又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有关部门想给总理换一辆奔驰车坐，周总理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

居舍简朴，物敝堪用

周总理进城以后，一直住的是老式旧平房，多年失修。墙上的砖有不少斑痕，墙皮老旧出现碱印；柱子上的油漆大部分脱落，有的柱根已经糟朽；地面是大方砖，每到夏天就泛潮；窗户裂着大缝，冬天还要用纸糊窗缝；天花板也很陈旧；厕所不在卧室，总理上厕所还要走一段路。由于房屋潮湿，总理常闹腿病。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和国务院总务部门，多次提出要修缮总理的住房，并且拟定了修缮计划。可是总理就是不同意修，并且对同志们说：“这个条件，比起延安的窑洞好多了。”还说：“我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了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

1959，年趁总理外出，有关部门的同志再次提出了修房之事。总理同意做一般维修，以保护建筑物。主管的同志出于爱护总理的健康，方便总理的工作，实际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对总理的房屋进行了修缮。虽然这次修缮并不出格，也不豪华；只是添设了一些必要的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品，但是总理从外地回京，一进门发现房间里新添的地板、地毯、窗帘、沙发等东西后，便退了出去。并立即找来主管的同志，严肃地说：“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样铺张？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总理指着房间里新添的东西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说后，总理

便住到了他经常办公和接见外宾的一个地方，直到将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和灯具等，凡能搬的都搬走，恢复了原来的旧东西，总理才搬回家住。此后，他的房间再没大修过。

总理对主管这项工作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其实不同的意见肯定也是有的。而且，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为什么不想到。现在呢，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进去住吧，你们不安。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为了这件事，总理还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多次作自我批评。有一次国务院开会，总理说：“这次我在南方读书，到各地看了看，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

总理这样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教育了大家，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一定要坚持勤俭节约，不要铺张浪费。

周总理办公室的陈设十分简陋，室内只有写字台、小会议桌各一个和几把椅子，连沙发都没有。在查出总理得癌症后，毛主席关心总理的健康，送给了总理一个特制的单人沙发。

总理也不允许给他购置办公用品。总理习惯晚上办公、批阅文件，吊灯很不合适。工作人员想给他买个台灯，总理同意搞一个。工作人员见总理同意了，便提议由宾馆送一套。总理说：“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不要麻烦宾馆，我不要。”“我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看。”总理说：“我们有工人，可以自己制做吗？”于是，他请中南海的工人用铁管子、洋铁皮制做了两个落地台灯。总理使用的两个笔筒，一个是价钱最便宜的普通玻璃杯；另一个是乳白色的山水玻璃笔筒，破碎后，里外用橡皮膏粘合后继续使用。

周总理没有专门的餐厅，用餐常在办公室内，餐桌就是会议桌的另一头。餐具中有几个普通的白色兰边搪瓷碗，已经用了 20 几年，碗边已经掉了瓷；盛汤的用具是个普通的陶罐。

以身作则　绝不搞特殊化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谋取私利、搞特殊化的权利。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就不能利用自己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和特殊照顾。这对于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总理身居高位，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谋取私利。他外出轻车简行，反对前呼后拥，不住高级宾馆、饭店；他从不提出额外要求，特别对自己的亲属容不得有一点特殊照顾。他是一生廉洁、一身正气。

不要为了我一个人而影响生产

1962 年 6 月 16 日，周总理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视察。在总装配车间，正当总理看到汽车装配线上的一个工　位时，正巧有一辆装木板的小车挡住了他的视线。一位车间领导怕总理看不清楚这个工位上的装配情况，连忙要把小车推开，总理立即阻止说：“ 不要动，不要因为我们看一看而影响工人同志生产！ ”

有一年，周总理到沈阳，住处靠近有一个飞机场，每天清晨总理刚开始睡觉时，飞机正好开始发动，轰轰声响，声音很大。负责警卫的同志看到总理日夜操劳，担子那么重，好容易才躺下睡点觉，怎么好再干扰他呢！于是，这位同志就和机场商量，能不能把每天飞机发动的时间临时改晚一点。机场的同志认为可以，就把发动时间改为在了下午。过了一两大，总理对负责警卫的同志说：“ 怎么回事啊！这两天睡觉我怎么听不到飞机声啦？ ”这位同志装做不知道这件事。总理说：“ 不对吧，我看是你搞了名堂喽。 ”经过总理再三追问，这位同志只好如实汇报了飞机晚发动的原因。总理说：“ 不要为了我一个人，干扰机场的工作。飞机早晨起飞，能见度好，下午要差一些。我们现在一分一秒都很宝贵啊！ ”当即就通知机场把发动时间又改到了清晨。

任何时候都不能特殊

1961 年在庐山，周总理住处廊道的窗子没有窗帘，招待所的同志为了让总理休息好，就做了几个新窗帘挂上了，周总理从外面回来看到后，对招待所的同志说：“ 没有窗帘有什么关系，别人能住我就能住嘛！任何时候都不能特殊，做窗帘的钱应由我自己来付。 ”

有一年，周总理因病需要手术治疗，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他到上海治病，住在了锦江饭店的中楼。住了一些日子，周总理发现这幢楼除了他和邓大姐以外，没有别人住了，就向饭店的同志说：“ 单独为我们烧暖气，开电梯，是浪费国家的财物。 ”提出要搬到北楼和大家一起住。饭店同志解释说：“ 总理有病，需要安静的环境。 ”同时，饭店还考虑到总理的安全，要求他们住在中楼。但是在总理的坚持下，仍然搬到了北楼。最后，总理病愈回京前，自己还按价付了几百元住宿费。

还有一次，周总理在四川成都，饭后，他在自己的住处散步时，在路边碰见锅炉工人黄克如，总理和他互相问候交谈。当总理知道他是专门给自己

住宿的楼房烧暖气的工人时，便说：“ 暖气可不可以不烧呢？工厂这么需要煤，冷，加被子就行了。 ”

你们不打伞，我也不用

1965 年 7 月 30 日，周总理到上海大中华橡胶厂视察，正好碰上瓢泼大雨。他走下汽车，米黄色的纺绸短袖衬衫和浅灰色的长裤很快就湿透了。望着大雨中的周总理，职工中传出了“ 快给总理送伞 ”的声音。一位厂领导跑上前去给总理送伞，总理抬起手把伞挡开，和蔼地说：“ 你们不打伞，我也不用！ ”一位工人技术员又手持雨伞奔向总理，总理又挥挥手，对送伞的人说：“ 先让后面的群众撑！ ”一位老工人急了，接过雨伞，跃出人群，奔到总理背后为他撑伞，他再一次谢绝了，并说：“ 给别人撑吧！ ”周总理就这样冒着大雨，穿过欢迎人群，视察了一个又一个车间，仔细地询问生产情况，亲切地同工人交谈。

1972 年 4 月 7 日下午，周总理由南京陪外宾去广州参观，灰蒙蒙的大，雨一个劲地下着。在离机场老远的地方，周总理就下了车。这时，有同志赶忙去给他撑伞，周总理连忙制止说：“ 不要打伞了，快放下！ ”同志们说：“ 您不能这样，淋坏了身体怎……。 ”周总理不让说完，指着欢送的群众说：“ 几千人都在淋，我就不能淋了吗？我不能特殊！ ”说着，他冒着风雨，缓步绕场一周，跟欢送群众握手交谈，挥手致意！

还有一次，周总理在上海参观公社，半路上下起了雨，服务员立即送雨衣给总理，总理没有要，并说：“ 很多人都没有雨衣，我穿了好吗？ ”他坚持不穿，回到饭店时，衣服己淋得很湿了。

让别的代表先进大门

1959 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有一天，周总理到北京饭店参加小组会议。当总理坐的汽车快到饭店门口的时候，饭店的一位工作人员怕总理前面那辆汽车在门口挡住总理的车，就让它开过去点，给总理的车让路。总理下车后，便批评那个同志：“ 你为什么让人家的车开到前面去？快去把人家请回来。我是代表，人家也是代表呀！ ”总理站在饭店门口，等那位代表下了车，主动迎上去和他握手，并且还坚持让那位代表先进了大门，总理才进门。

应该按次序，我等一等没关系

1956 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天，中国照像馆的候像室里坐满了照像的顾客。正当紧张地为顾客照像的时候，周总理走进了照像馆的大门。人们顿时沸腾起来。总理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走进照像室。这时，一位解放军战士正在照像。他看到周总理来了，马上向总理敬礼，要总理先照。总理谦虚地说：“ 你先照，我等一等没关系！ ”那位战士就在总理的亲切目光注视下照了像。照完后，总理又热情同他握手，问他是那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位战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照像室，总理才开始照像。

周总理每次到北京饭店理发，理发师傅考虑总理工作忙，怕耽误总理的时间，就请总理先理。总理总是摆摆手说：“ 为什么要我先理呢？大家都一

样嘛，应该按次序。”

我就站在边上照嘛

1961 年“七一”那天，日丽风和。周总理偕童小鹏等同志漫步登临香山，和参加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的一百多位电影工作者一起欢庆党的诞辰，并合影留念。

在拍照时，大家请总理站在前排中间。可总理怎么也不肯，还和蔼地对大家说：“今天主要是你们，我只是你们中的一个。”结果，在第一排正中间竟是以擅长喜剧著称的演员兼导演的谢添；在谢添的左边，是著名女戏剧家孙维世；再左边是著名电影演员兼导演崔嵬。在谢添的右边，是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王为一，这位素来谦恭的中年导演，居然交叉着手，站在他的领导人和长辈的前头；再右边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导演兼演员的田方；田方身旁是中国电影界元老辈的蔡楚生。

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陈荒煤、徐平羽，中央电影局局长司徒慧敏等，都随意地在第三、四、五、六排里。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兼导演张骏祥，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地站在最末一排的最边上。各电影厂的书记、厂长们，也都夹在群众中笑眯眯地伸出脑袋来。

咱们的好总理在哪儿呢？在第四排，左起第三人。总理和大家肩挨肩，心连心，平等地站在一起，回顾昨天，把握今天，面向未来。

象这样的事例很多。尤其是总理观看文艺演出后，为要同演员合影，往往不肯在中间坐或站，而到后排和大家一起。

1955 年观看《明朗的天》时，演出结束，周总理在舞台上同演员一起合影，剧院的同志摆了一个道具小沙发在中间请总理坐。总理说：“那样太个人突出了嘛！”于是，坚持和大家挤在一起拍了照。

1958 年观看《关汉卿》时，演出结束后在舞台上合影，总理请作者田汉，导演焦菊隐、欧阳山尊，关汉卿扮演者刁光覃，朱帘秀扮演者舒绣文，以及舞台美术设计员和舞台美术管理人员，坐在中间的一排椅子上，自己却站在了坐者后两排靠近幕的一个角落里。

1959 年观看《女店员》后，合影时，他虽然同意坐在一排椅子上，可是一定要与几位女演员同坐，他说：“今天演的是妇女戏嘛！”

1960 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了话剧《以革命的名义》。周总理看戏后同演员合影时，大家请总理坐在扮演列宁和捷尔仁斯基的演员中间，周总理笑着风趣地说：“不，列宁和捷尔仁斯基是无产阶级的导师，我是学生。我在十月革命时，还是普通青年，那时十九岁，邓大姐十三岁，瓦夏你也十三岁，我们是兄弟，我们两个坐在一起。”

1962 年观看《武则天》时，最后在舞台上合影，周总理请作者郭老坐在一张道具桌子后边的椅子上，而自己和演员们一起立于郭老的身旁。

在其他场合，合影留念时，总理也总愿意站在边上。

1966 年夏大，周总理出国访问，路经新疆和田县时，在百忙中接见了驻在当地的部队代表。在照像留念时，大家请总理站在当中。总理走到边上说：“我就站在这里，为什么一定要我站在当中呢？”摄影记者就遵照总理的意见，给大家照了像。

1975 年 11 月 1 日，周总理在百忙中亲切接见了中华医学会全国第一届

妇产科学会全体代表，并作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在同代表们合影时，几百名代表请求总理坐在正中间，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肯。他对林巧稚说：“你是学会的主任委员，你应该坐在中间，当仁不让嘛！”最后，总理还是坐在旁边同大家照了像。

还有一次，周总理在一个宾馆同外宾会谈，送走外宾后，总理提出来要和参加服务工作的同志们一块照像，大家的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了，都早早站好等候总理，并给总理留了中间的位置。总理来到一看，就说：“为什么一定要我站在中间呢？边上也可以嘛！”说着，就站在边上和大家一起照了像。当时，来宾馆做饭的北京饭店中餐厨师张荣林师傅激动极了。他想：我们这些厨师，在旧社会是被人瞧不起的、伺候人的下等人，可是今天，国家的总理却和我们站在一起照像，而且还站在边上，总理真是把自己看成和厨师完全平等的普通劳动者啊！

在出访外国，与印度记者合影时，也曾席地而坐同外国朋友一起合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从 1956 年 11 月起，周总理先后访问了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等东南亚七国。 12 月 9 日晚上，总理在即将结束对印度的友好访问前，在加尔各答举行了盛大的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后，陪同总理访问的印度记者和工作人员，要求同周总理一起照一张像留作纪念。总理欣然同意。

当时，在准备合影的宾馆大厅里，事先摆好了 6 把座椅，计划安排周总理和陪同访问的贺龙副总理、中国驻印度大使和夫人、印度驻中国大使和夫人坐着，其他人员站着合影。总理来到大厅以后，印度外交部的礼宾官说明了他们的安排意见，并请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就座。总理笑容满面地对礼宾官说：“请把椅子拿走，我们一起站着照吧。”总理的意见出乎礼宾官的意料，他不同意让总理站着照，坚持请总理就座。正在“争执”之中，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笑呵呵地席地而坐，并要两位大使和他们的夫人坐在椅子上。总理这种打破常规、与普通工作人员平等相待的政治风度，使在场的不少印度友人激动万分，他们再次请总理坐到椅子上，两位大使和他们的夫人也恳请总理就座，但总理还是不肯，他拉着两位大使和他们的夫人就座，自己仍席地而坐。大家说服不了总理，也就只好按照总理的安排合影留念了。

这件事，使参加合影的人都十分感动，在印度的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第二天印度的报纸刊登了中国总理、副总理坐在地毯上与记者和工作人员的合影照片，并发表了赞扬周总理亲切接近普通工作人员的评论。

你们是老师，应坐在前排

1962 年春，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举行。一大晚上，剧作家们去广东迎宾馆小礼堂看粤剧表演艺术家马师曾演出的《问天》，罗品超、红线女合演的《花园对枪》。小礼堂仅二三百个座位，前面放一排大沙发，其余都是小沙发。剧作家们集体入场不久，周总理和邓颖超也及时入场。

总理一来，大厅气氛立即活跃起来，都拥上前去迎接。总理象见了老朋友似的，跟这个握手，同那个招呼，谈笑风生，十分亲切。老戏剧家田汉、曹禺等请总理人座，总理见前面有一排大沙发，就连忙请戏剧老前辈们坐，

说：“今天是招待你们的，你们是老师……。”边说边把田汉、曹禺、阳翰笙等一批老同志，一个个请到大沙发里就坐。直到前排坐满了，总理才找个空位坐下，又和前后左右的同志们亲切交谈，问这问那，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1964 年 6 月 23 日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之际，总理在看演出之前，和全国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谈话，他谦逊、谨慎、亲切、平易近人。他对到会每个人的姓名、性格、思想都摸得十分清楚。当时，曹禺坐在总理身边，有一位领导同志进来，曹禺连忙起身让坐。总理忽然问曹禺：“你这是干什么？”曹禺不好意思，便说：“领导嘛！”总理立刻不客气地对曹禺指出这是旧习惯。

外出要轻车简行，不要迎送

1958 年 7 月周总理到广东新会县视察工作。他只带了三名工作人员，是坐一辆普通的吉普车去的。到达县委后，总理向县委领导同志表示：“我是来新会工作的，是来学习的，不需要接待。”他反复强调说，我们上面工作的人，要到下面来，要象你们一样，到乡里去，到社里去到街道去，不要给我们特殊照顾。我是你们中间里的人。都是普通劳动者。要平等相待，要创造这个风气。总理这样说，也坚持这样做。在新会六个晚上，他一直住在县委书记的卧室兼工作室，不去住新建的招待所。这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旧办公桌和几张普通的木椅子。

总理还谆谆叮嘱县委领导同志说，要朴素，不要同群众的生活有距离，不要搞迎送，不要前呼后拥，妨碍他接近群众，不要公家请客。

1956 年 5 月，周总理到太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考察，这是他在全国解放后首次来太原。他到之前，省里接到电话通知，只要接待人员去接，不许省委领导人去机场迎接。省委再三研究后，决定由第一书记和主管工业的书记池必卿两个人坐一辆车去接。总理走下飞机看到他们，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接到电话通知没有？为什么不执行中央关于不许迎送的规定？还说：即使是两个人，也不应该来。当总理结束在太原的工作离开时，省委决定改变原来常委都去送行的打算，仍由第一书记和池必卿两人去送。

随便找个地方住好了

1967 年，周总理乘飞机去武汉，机上没有床铺，机场的同志便临时抬了一张棕床放在飞机上。总理登上飞机看到后，便对机组的同志说：“不要搞床了，我和大家都一样嘛！”劝机组同志把床抬下去。

有一天，总理突然到某部队机关，陪同总理的部队负责人想让总理到条件好点的办公室去休息一下，总理说：“随便找个地方好了！”说着走进了一个会议室。那里只有一个乒乓球桌子、几把椅子，没有床铺。总理的随行人员说：“你们值班室那张单人床就可以了，总理经常都是这样生活的”。

1973 年 10 月 13 日，周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去洛阳参观，洛阳宾馆精心地为总理准备了房间。可是，谁也没想到，总理的随员一到，便根据总理平时的生活习惯，将一些不必要的陈设全部撤掉，只留下一张木板床、一张写字台、一盏台灯、一对小沙发和茶具等简单用具。

1952 年 12 月，周总理到东北接收中长铁路。在哈尔滨，会议和晚会结束后，己是夜里 12 点。当地领导给他安排了高级宾馆，他不去，他说：“ 我不住宾馆，太冷清了，见不到人。我随便找个旅馆好了。 ”总理乘车到哈尔滨喇嘛台南边看到一个旅馆，便找上门去。旅馆经理不在， 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找到一名服务员，临时找了一个房间住下来。在这里，总理在餐厅和群众一道就餐，同他们聊家常，了解人民的生活情况和社会情况。

1955 年，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回国时路过西安，陕西省委把他安排到过去高桂滋的公馆里。总理喝了一杯茶，不干，要去旅馆住。随从的工作人员劝说：“ 已经安排了，就住下吧，旅馆太乱。 ”总理说：“ 我不怕乱，就怕寂寞冷清。 ”工作人员说：“ 住旅馆，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 ”他说：“ 不要把我同人民群众分隔开，那不是保卫，是伤害，伤害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党是靠人民群众才有了今天。 ”结果，他住到了西安大厦，主动接触群众，吃饭也是在饭厅与群众一道吃一样的饭菜。

1962 年 6 月，周总理到鞍钢，刚好鞍山建好了一座新宾馆，负责接待的同志准备让总理住在那里。可是，周总理一看，执意要换普通的饭店，并批评说：“ 楼盖得这样好，全国还有的地方比较困难，我不能住，住了，就等于国务院承认你们这样做是对的。 ”总理住进了铁路饭店。总理到冷轧厂视察，当看到停工待料的一米二轧机时，还提起这件事。他对工人们说：“ 要是把盖宾馆的钱花在这上，该有多好！ ”

周总理到了沈阳，省里安排他住当时最高级的北陵休养所（即现在的迎宾馆），但他坚持要住辽宁大厦。省里的领导以大厦住外宾、客人比较杂、不安全为由，劝他不要变动原来的安排，他还是不同意。宋任穷、黄火青也说服不了他，结果硬是住了辽宁大厦。

1973 年 6 月 9 日，周总理到延安视察，他也不住宾馆，要住原边区交际处，即现在的延安第一招待所。他不睡钢丝床，不盖缎子被，却要睡硬板床，盖布被。

行动不扰民，反对戒备森严

总理成年累月，从早忙到晚，没有假日，没有星期天，除了工作需要，很少到公园。 1955 年的 7 月 8 日，卫士同志见总理把安排的项目都办完了，就悄悄请来邓大姐，让大姐动员总理到颐和园转转。开始总理不答应，大姐再三动员，并提出：“ 我也陪你去。 ”这才勉强答应了。总理说：“ 既然我们去，不准告诉很多的人来做保卫工作，就咱们几个去走一走。 ”

总理和邓大姐，以及随行的卫士同志漫步在颐和园的氏廊里。总理谈笑风生，异常兴奋。突然，总理停下脚步，指着对面绕开长廊走的群众问随行的同志：“ 怎么回事？你们又来人了，干涉群众，群众走群众的，我们走我们的么，你们要相信群众。 ”于是，随行人员赶紧跑到前面，通知在那里做警卫工作的人员，不要干涉游玩群众自由行走。从长廊迎面走过来的群众热情地和总理打招呼，总理不停地向大家招手致意。

说笑间，来到了昆明湖的一个码头。一位船工请总理乘坐他撑的游船，总理连忙谢道：“ 麻烦你了。 ”船工摆着手说：“ 不，不，这是我们的工作。总理坐我的船，我非常高兴。 ”总理在游船上一边观赏景色，一边说古道今，从颐和园的变迁谈到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还鼓励大家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好

好服务。

周总理曾经多次到过百货大楼。他就象普通顾客一样，有时从东面正门进去，有时从南边的旁门进去，从不兴师动众。

有一次，晚上人、九点钟，商店临近停止营业的时刻，百货大楼接到电话，知道总理要去视察。商店立即广播说：“顾客同志们，今晚商店有任务，请提前退场。”没想到正在广播的时候，总理已经到了。当商店负责同志上前迎接总理时，总理一面同他握手，一面责备说：“这是你干的吧！你看看，你这个人！”很快，要顾客提前退场的广播停了，周总理信步来到金笔柜台前，请售货员给他一支金笔看看，并问道：“我能不能蘸水试一试？”专注低头结帐的售货员，漫不经心地点了头，这时他没有发现这位顾客就是周总理。周总理蘸了墨水，在一张纸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突然间，售货员从纸上看见了“周恩来”三个苍劲的字，抬头才看见周总理站在自己的面前。他没有想到，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竟会这样随和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在刮脸刀片柜台前，周总理笑着对售货员说：“请你替我向工业部门反映，要努力提高刀片的质量，象我这样的胡子就不好用。”总理来到鞋帽部时，职工们正在开班后会，总理怕惊动人家，就轻轻地走到一个商品陈列柜后边，认真听取售货员的发言。一个售货员发现了总理在他们身边，一下站了起来，又惊又喜地喊着：“啊，总理！”周总理很抱歉他说：“干拢你们了，请同志们继续开会！”就这样，总理以一个普通顾客的身份，走遍了百货大楼的一、二、三楼。

1957 年，周总理陪印尼外宾到杭州。在楼外楼举行宴会的这一大，原决定停止二楼餐厅的营业，在请示总理时，总理没有同意。这一天，将近 12 点钟，总理陪同外宾刚登上二楼，在二楼餐厅吃饭的顾客，有人认得总理，高兴地说：“周总理，周总理！”有的热情地向总理问候：“周总理好，周总理好！”霎时间，顾客们刷地站了起来，餐厅里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总理向大家招手，示意不要鼓掌，并请大家坐下。他拉了身旁陈毅的手，对大家说：“我，大家都认得。现在我向同志们介绍，这就是外交部长陈毅同志！”随后，总理走遍餐厅 20 几张桌子，挨桌一一和顾客们握手，总理一会儿站着跟他们交谈，一会儿俯下身听他们说话。好一阵子才离开二楼餐厅。

连群众都信不过，何谈为人民服务

周总理又是党中央副主席。按规定，他的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外出路线、所经路口，住地及重点防备地区等等，有一套安全规定。一般行动，头天就做好了计划， 几点几分到何地， 几点几分经过何路口或何路线，事先要向警卫部门打招呼。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

周总理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认为是“浪费，没有必要！”他强调说：“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象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

卫士、卫士长们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卫车跟着，万一路上坏了车呢？不说安全吧，也要耽误时间，影响工作啊。比如外宾等候接见，你的车坏到半路了怎么办？”总理说：“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宾等候，可你们每次都要搞这种前呼后拥，这种做法很笨，缺少灵活性。我在重庆时做过这方面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活动要有不同的措施和办法。比如我

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总理为了不叫警卫车跟随，有时会突然行动，根本来不及通知警卫，上车就走。车上除了总理，只有卫士长或卫士，加上司机共三人，这时，总理会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群众有困难要帮，行动上应礼让

1962 年 6 月，周总理到吉林省延边自治州农村视察。有一天，总理坐的汽车正在行驶，突然发现前面有一辆马车翻了，挡住了去路，随行人员急忙跑去把车　开。总理却说：“别着急，先帮着把东西装好，咱们再走。咱们是汽车，人家是马车，注意别把马吓毛了啊！”

在四川，有一次，周总理到青羊宫去参观，途中经过一段窄路，正好几位农民推着鸡公车迎面面来，总理连忙指示：“让群众先过。”司机立即把车停在一旁，警卫同志和司机同志还下车帮助农民推车先过去，然后总理的汽车才继续开动。

有一次，北京京剧团乐队同志把乐器放在电梯里，准备运到楼上的礼堂参加演出。这时，总理的警卫员来了，说总理要来乘电梯，请他们立即把乐器搬下来，让总理光上去。正说着，总理和邓大姐到了。总理见状立刻严肃地批评了警卫员，指出应有先来后到，乐队同志应当先上去。在总理和邓大姐的坚持下，乐队同志只好先上去了。

门卫这样做是对的

1967 年 7 月，一天黄昏，在武汉处理解决问题的周总理回住地时，改乘了车子，由于司机不熟悉进门信号，警卫战士让车子停了下来。当警卫同志看到车内坐的是周总理时，感到非常抱歉和不安，急忙让车子开了进去。这时总理从车内探出身来，笑着向警卫战士招手致意，下车后，便告诉警卫部队的负责同志，称赞这两位警卫战士做得对，责任心强，建议给予表扬。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出席一个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乘坐的是一辆普通的轿车。在使馆门前调度车辆的交通民警没有认出来，把总理的车调到了离使馆大门较远的地方停下。当这个民警看到从汽车里走出来的是周总理时，他愣住了，深感自己失职，想马上请总理上车，重新把车子调往使馆门前。周总理微笑着对这个民警说：“这不很好嘛！车子停在这里我走几步有什么关系？这样可以把使馆门前的地方腾出来让别的汽车停嘛！”

总理和市民都是一样的人

1962 年春天，周总理到杭州开会。当时南方的青菜正上市，返回北京时，杭州的同志要随行的同志带两筐新鲜蔬菜回北京，随行的同志向地方上的同志说，总理多次交待过：不准给地方造成困难，不能随便带东西回北京。谢绝了杭州同志的好意。谁知返回北京的那一大，杭州的同志早把两筐蔬菜送到了飞机上。杭州的同志向随行的同志再三解释，说这两筐菜不是送给总理的，是带给中央首长吃的，而且，这两筐菜也不是白送，发票都已经开好了。

随行的同志只好付了钱，把菜带回了北京。

当总理吃到这些蔬菜时便问有关同志，是不是你们把菜带回来的？同志们向总理讲明情况，告诉他：“蔬菜已分给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了，你吃的只是其中的一份并付了款。”总理十分严肃地教育有关同志：“以后即使这样也不允许。这样做，会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你们想想，总理和市民都是一样的人，我要不当总理就没有这个优越条件，就享受不到这种特权。市民能买到这个菜吗？”总理还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同志讲：“你们在我这里工作要懂得，办任何事情都要跟我联系起来，要跟我的职务联系起来，要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要把我和人民联系起来。”在总理的心目中，他和市民应当平等，不可特殊，这是多么高贵的品德！

不随便批钱批物

周总理从来不随意批条子，从不随意许诺给这个地方或那个部门多少钱、多少物。即使十分必要，总理也总是说，很必要，但要同有关部门研究一下。

1958 年，周总理接见江苏省淮安县的负责同志时， 县委负责同志汇报到在发展地方工业中遇到了原料不足的困难，想请周总理帮助解决。这时，周总理指出，要听毛主席的话，以农业为基础，在农业大幅度增产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地方工业，但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面向农业。周总理还指示：“光将铁木农具厂搞起来，然后再及其他。”后来，总理在给江苏省委负责同志的信中，还谈到淮安县要求帮助解决原材料问题，说：“我当然不能这样做。”1960 年淮安县种植了 10 万亩棉花，收成较好，想办一座纱厂。在向总理汇报提出这一问题时，总理一方面鼓励了县委的负责同志，一方面又劝导说：“你们种了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要吃不饱了。”周总理这种顾全大局，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使县委的同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不允许亲属有任何特殊

周总理对待自己的亲属，从来是要求很严格的，他决不允许由于他的关系而有一丝一毫的特殊。

1956 年 10 月下旬，周总理在淮安县老家的婶母患病，县委送到县人民医院治疗。后来，因病情反复，县人民医院便写信向总理汇报。总理立即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回信。信中除表示感谢外，说：“我婶母的病我们知道是无法治疗，今后一切治疗还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贰百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总理的婶母去世后， 1957 年 4 月 19 日又致信淮安县人委，寄去安葬婶母善后费用所尾欠的垫款 25 元，并且还在信中说：“我伯母家现在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此后，总理对弟媳陶华治病期间所花费用也都如数寄还淮安县委。

周总理有个胞弟周同宇，早在 20 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后在工业部门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

务部任参事。周总理为此向内务部部长曾山多次提过意见，又在会上讲了这件事。他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于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总理又对曾山讲：“同宇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有关规定办理因病退休手续，如果他因此在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补贴。……我讲的绝不是客气话，是要你们按规定去办的。”后来，周同宇提前办理了病退手续，总理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钱给胞弟以补贴。

周总理还有一个未出五服的堂兄。抗战时，此人帮助我党建立过电台，解放后仍留在铁路系统工作。 1953 年因历史问题及经济问题判刑劳改。有关部门知道后，想给以照顾，总理也不让照顾，说他有旧思想，应该在社会上好好锻炼、改造。这个堂兄的孩子因家庭关系，入党后一直未能转正。 1958 年这个孩子来找总理。总理帮助他正确地认识家庭问题，鼓励他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并说：“不能因为你是总理的亲属就去干涉你的转正问题。”多年以后，这个堂兄的孩子终于靠自己的努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教育侄儿到基层做普通劳动者

周总理和邓大姐没有儿女，但对侄子、侄女等晚辈要求也很严格。从小就教育他们，要树立长大后到农村、到基层，当农民、当工人，做普通劳动者的思想。并教育他们说：“你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规定，不能利用亲属的职权搞特殊化。”

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侄儿，在我国刚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的制度时，总理就让他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总理告诉侄儿“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侄儿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后来周荣庆当了拖拉机手，在农村成了家。

1960 年，周总理在淮安的一个侄子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 1961 年结婚后，女方仍在淮安县工作。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是亲属关系后，为了照顾他们夫妇关系，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来。周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亲自动员他们夫妇一起去淮安工作，并对他们说：“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总理还说：“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学校里学的东西也可以带到家乡去发挥作用嘛！”之后，总理又说服钢铁学院领导同意，这对夫妇愉快地回到了淮安县。

鼓励侄女两次进草原

周秉建是周总理的侄女， 1968 年中学毕业后，积极报名，奔赴内蒙古大草原。在离京的前夜，总理对她说：“秉建，我坚决支持你上山下乡，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我要求你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下去，一定要迎着困难上，决不能当逃兵。”周总理还嘱咐她说：“你去的是牧区，是少数民族地区，要很好注意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邓颖超同志还给她讲了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故事。然后总理又接着说：“所以，你到了蒙族地区也要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还要学习他们的语

言。”总理知道周秉建在家里不吃牛羊肉，特地要求她到牧区后锻炼吃牛羊肉，过好生活关。

1970 年 12 月，周秉建没有征得总理的同意，参加了解放军，周总理知道后，立即派秘书到部队了解她入伍的情况，并严格提出要求，要她迅速回牧区去。为此事，总理还亲自向总政和有关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求调查和处理。当总理听到她重新回牧区的要求被部队组织批准以后，非常高兴，说：“你回去以后，还要住蒙古包，住到生产队去。”总理还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条路。”总理语重心长地一再叮嘱周秉建说：“要看到旧的习惯势力残余的影响，还是很严重的，对你的歧视可能小，对你的特殊照顾可能人，要防止这一点。”

有一次周秉建回京探亲，周总理和她一起吃饭时，询问了她的年龄和今后的打算后，慈祥和蔼地说：“要在当地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在内蒙古安家。”“就找那里的蒙古族青年，和牧民青年谈恋爱好不好？”还说：“王昭君就是匈奴民族的儿媳妇嘛！你可以向她学习，做个蒙古族的儿媳妇嘛！这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的一种体现，你在这方面要增进蒙汉民族的友谊和团结，做个好样子，起个模范作用。”

周秉建完全实践了周总理对她的嘱咐和教育。二十多年来，她在牧民乡亲们的帮助下，适应了牧区的生活，学会了放羊、骑马、说蒙语，习惯了睡蒙古包，真正成了草原女儿。后来她考上大学，参加了工作，又与蒙古族的一位青年结婚。现在，她作为蒙古族人的妻子和蒙古族孩子的妈妈，正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振兴内蒙古的伟大事业中，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边疆贡献自己的力量。

个人的事，自己亲手做

周总理对于个人的事情都是自己动手做，从不让别人替他做。

1958 年 1 月 4 日，周总理在安徽省视察工作时，住在合肥市江淮旅社。服务员考虑到总理日夜操劳国家大事，要帮总理擦擦皮鞋，总理含笑摇摇手说：“我自己动手擦。”

有一次，周总理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进门后服务员发现总理的鞋带开了，欠下身去准备为他系上，总理急忙弯下腰把服务员扶起来，并亲切地说：“这怎么能让你为我系呢，我自己来。”还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吃饭后，总理摘下假牙放在小杯里，服务员准备替他洗洗，但总理却连忙拿过去说：“这么脏，怎么能让你洗呀，我自己来。”

1969 年 7 月，周总理找文化部和所属文艺团体、艺术院校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几个负责同志汇报情况。当谈到文化部所属 80 多个单位知名人士情况的时候，总理对当时在场的一位同志说：“你来写一下。”说着递给他一张纸。这位同志以为写在纸上就行了，没想到，他一边写，总理一边往自己的本子上记。这位同志说：“总理，我直接给你写在本子上吧。”可是总理说：“不用，我自己来，自己动手印象深。”这位同志只好一个一个地写在纸上。总理又看着他写的，一个一个地记，一直记完了 80 多个单位。

1966 年 5 月 3 日和 4 日，周总理在大庆。5 月 3 日工作了一天，晚上在简朴的会议室里，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汇报。汇报结束，已经是次口凌晨一点半了。周总理毫无倦意，又精神抖擞地去看大庆油田模型、技术革新展品，

并听取关于油田建设规划的汇报。周总理回到办公室，已是 4 日晨二时十分了，他又伏在案头继续工作，办公室里的灯光一直亮到三点多钟。可是，刚五点，周总理就起床了。公务员进房收拾床铺时，发现被子已经叠好，桌于也收拾得整整齐齐。在清晨的曙光中，周总理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

中央机关大院不能搞“治外法权”

1958 年初，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即将公布的时候，周总理在百忙中把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周兴等同志找到他的办公室，亲切地说：“做公安工作要政治挂帅，又红又专。”并且指出，机关大院，部长宿舍，包括中南海的户口也要管起来，不能搞“治外法权”。

1956 年 4 月的一天夜晚，周总理访问了北京前门公安分局打磨厂派出所。派出所对面是解放军某部一个招待所。周总理指着这个招待所问值班的同志：“在你们管界的中央机关，户口归你们管吗？”值班的张杰回答：“上级有规定，因为他们是军事机关，户口不归我们管。”总理说：“那不好，军事人员的户口，可以由他们管，家属、服务员这些非军事人员的户口，还是应该由你们管，你们是当地的治安机关嘛！”

廉洁奉公　坚持公私分明

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廉洁奉公。周总理是一贯遵守各种制度，尤其是遵守财务制度的典范，他从不占公家一丝一毫便宜。

在人们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地方，他也总是要维护公共利益不受损害。他接见外宾，有时途中绕道去理发，他也要把绕道的路程作为自己私事交车费。同时，他还要求有关地方对于北京去出差的同志，如要带家属，家属旅费公家不能开支。他常常说，人民已经给我报酬了，私人的事，不是为公的事，不能随便用国家一分钱。

严守党中央规定，拒收任何馈赠礼物

1956 年 5 月，周总理到太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考察。在考察结束，登机离开太原时，总理发现有人往机舱里送一个箱子，便马上询问是什么东西，随员告诉他，是对降低血压有益的本地产的葡萄汁。总理在机门关团前亲自留下了 30 元人民币。

1960 年经济困难时期，青海省从青海湖捞了一批鱼，派人送给国务院。总理知道后，就让秘书给青海省委打电话批评这件事。因为鱼不便退回，只好作价买下。还有一次，江西省给国务院送来一些桔子，总理立即指示把桔子原封退回去，一个也不能收，并对此事进行了严肃批评。

1961 年春节前夕，淮安县委托便人带了一点当地的土特产，给周总理和邓颖超。1 月 16 日便收到总理委托总理办公室代写的信。信中说：“ 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撒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 100 元寄给你们，作为偿忖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 ” 信中还说：“ 总理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 随着那封信，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总理还亲笔在这份文件上写了指示，要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办。

1958 年 7 月，周总理在广东省新会县视察工作时， 县委同志送给总理两盒当地生产的葵骨牙签，总理不收，最后付了钱才收下。

1973 年 10 月 14 日，周总理陪同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时，见到北魏时期的龙门 20 品拓本。总理一边翻阅，一边说买一套带回去。于是，总理问明每套的价钱，便问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说钱带的不够。总理又问在场的一位省委常委带钱没有。这时，洛阳市一位陪同的负责同志提出送给周总理一套。总理严肃地说：“ 国家的财产怎能随便送人！ ” 当讲解员对龙门二十品拓本作介绍时，总理又问外交部的一位同志：“ 到底带了多少钱？ ” 这位同志也说钱带的不多。秘书看到周总理的心情，问总理：“ 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给一套，以后把钱汇来。 ” 周总理认真地说：“ 不行，那样他们就不要钱了。 ” 就这样，周总理临走也没有叫带龙门二十品拓本。

还有一次，在上海，周总理遇到几位北京来上海开会的，同志，便问起中央国家机关的同志到地方出差开会所需费用由哪一方支付等情况。当他了

解到有些领导干部带着夫人孩子来到地方，所有住宿、伙食、交通费用皆由地方政府支付时，总理很生气。回到北京，在全国第三次交际接待工作会议上，总理恳切地告诉各省来的代表：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责，都要给本人出具帐单，包括交通费在内，由客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

1970 年元月间，邓大姐陪外宾到延安，回京时，当地的同志商量托邓大姐给总理带点小米。有的同志说：“带上 20 斤让总理多吃几次，总理吃着延安的小米就象回到延安一样。”还有的同志说：“干脆多带点，让其他老首长也尝尝。”考虑到带多了邓大姐一定不带，最后决定带 2 斤。当地的一位负责同志土金璋把 2 斤小米用一个小布袋装起来，捧着小米对邓大姐说：“大姐，总理爱吃延安的小米，请您带一点回去，……”没等这位同志说完，邓大姐就笑着对他们说：“延安的小米，恩来同志见了一定很高兴。吃上延安的小米，就象回了一趟家。”说得大家都愉快地笑了起来。接着邓大姐又说：“不过粮票和钱你们得收下。我们党有规定，不送礼。要不我带回去恩来同志要批评我的。”就这样，邓大姐留下粮票和钱，才带走了 2 斤小米。

1972 年 8 月间，中联部的几位同志陪外宾到延安。当时这里种的新品种西瓜刚下来，外国朋友吃着赞扬说：“很好。”在中联部的同志回京时，当地的同志特意挑了两个不大的西瓜托中联部的同志带给总理。可是回京不几天，中联部的同志给延安的同志打电话说，总理谢谢大家的心意，但西瓜退给中联部了，总理说以后不要再带东西。

还有一次，周总理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路过南京，南京的同志托他带点活鱼给总理，这位同志说：“你们知道总理的脾气，他是从来不准请客送礼的。”当地的同志再三解释，这位同志执拗不过，就打电话请示邓颖超，邓颖超开始不同意，后来南京的同志又请这位同志打电话，就说这是饭店全体服务人员的一点心意。最后，邓颖超来电话，一方面感谢同志们对周总理的关怀，一方面又提出两条要求：一是少带点，不准超过 2 斤；二是按市场价格算钱，把发票同鱼一起带来。

看戏、上公园，自己花钱买票

1957 年，北京曲艺团用曲剧这个新剧编排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初次在前门外大栅栏仅能容纳四百人的小剧场公演时，总理非常关心。一天下午四点多了，总理向卫士长和警卫员交代说：“今天晚上咱们自己买票，去看看魏喜奎他们演出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总理还交代：“谁也别告诉，买到什么票，就坐到哪，不许挤群众的座。”警卫员只好买了剧场北边靠门的几个座位。晚上，总理只带了警卫员、卫士长和司机 3 个人前去看戏。为了不惊动观众和演员，总理在场外等到里边灯灭时，才入场，悄悄找到座位坐下来。直到戏散后，总理才走上后台。演员们见总理突然出现在面前，又惊又喜，总理亲切地问候他们，祝贺他们演出成功。并说：“我访问 11 国刚回来，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就来看戏了。”“这是我家乡的故事，我从小就熟悉它。”

1957 年 11 月到 1966 年 3 月，周总理曾五次观看石家庄市丝弦剧团的演出。有一次，剧团正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剧场里为工农兵演出，周总理自己买了 3 张票，同两名工作人员毫无声张地走进了剧场。直到演出结束时，大家

才发现周总理就在观众中间。剧场里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周总理亲切地向演员们招手，然后又同群众热情地谈笑着，一起走出了剧场。

1963 年 2 月，周总理到江苏无锡视察工作，在蠡园参观时，周总理问陪同的市委负责同志：“ 买过门票没有？ ”那位同志根本没有把这件“ 小事 ”放在心上，可是周总理却郑重其事地一一查点人数，当场购票，连同陪同人的门票，都是周总理代买的。

有一次，送走了外宾回来要路过北海公园，总理的随行人员考虑到总理工作忙，难得有机会到公园散散步，便建议总理顺便进去散散步，以消除彻夜未眠的疲劳。为了节省时间，保证安全，有关同志事先买好门票，办好手续。到了公园门口，周总理问：“ 买票了没有？ ”随行的同志告诉总理：“ 已经买过了。 ”总理说：“ 怎么没看见交票呢？再买一次！ ”总理亲眼看着又买了一次门票，才放了心。总理进一次公园买两次门票的事，何止一次！

坐公车办私事自交车费

周总理把看戏、跳舞、到公园散步、到饭店理发，到医院看病以及私人访友，都算做私人用车，坚持自费。他几十年不间断地提醒司机记账。经常提醒司机：“ 老杨，这段路交费了没有？ ”有一天，总理要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中南海西花厅先去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之后再去人大会堂。从北京饭店出来上车后，总理轻轻拍拍司机老杨的肩膀，提醒说：“ 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炒这里到人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了。 ”

每当工资发下后，总理必定要检查是否扣除了费。

绝不占公家的便宜

1956 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总理在中国照像馆照像后，职工们很快把样片印好送给了周总理。总理选了几张，要照像馆再多加印一些。为了表达对总理的衷心爱戴，照像馆职工们特意为总理精心制做了四张十二寸的彩色照片，赠送给周总理。几天后，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前来结帐，开了两班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印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一张是周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像馆赠送的那几张，由总理个人付钱。周总理从不占公家的便宜。

1962 年，周总理和邓大姐一起陪同外宾到苏州参观，地方上的同志为总理代购了一点苏式糖果。总理知道后立即问苏州的同志：“ 这些糖果是否按市场价格购买的？ ”苏州的同志只好如实地回答：“ 是按内部价格买的。 ”总理立即指示：“ 一定要按市场价格结算。 ”这时总理的火车已经准备开动，时间很紧迫，最后遵照总理的指示，在第二大总理返程路经苏州时又重新按市场价格进行了结算。

上海会议期间，锦江饭店设了一个小卖部。有一次，周总理的笔记本用完，到小卖部买了一本，当他按标价付了钱之后，似乎觉得价格比较便宜，就看了看印在笔记本背面的价目，果然发现笔记本上印的价目，比他实忖的价格高。周总理就问：“ 你们是不是少收钱了？ ”服务员回答说：“ 没有少收，我们是按批发价格卖的。 ”周总理严肃他说：“ 这怎么行？价格怎么能随便改动呢？应该买卖公平，一律按零售价收钱，不能搞特殊化。 ”说罢，

周总理就补付了钱，并纠正了小卖部的价格。周总理到理发室去刮胡于，理发员刮完没有收费，因为饭店规定这些费用已经包括在住房费里了。周总理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说：“开会住房是公事，理发刮胡子是私事，应该自己付钱。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家财政纪律的。”经过总理的批评，不仅纠正了收费办法，而且受到一次深刻教育。

1972 年 11 月，周总理到天津，住在天津招待所。临走时，带了 16 套煎饼果子。总理的卫士在结算伙食账时，间服务员煎饼果于要多少钱。服务员心想，这么一点点东西怎么好收钱呢？坚持不要。周总理回到北京以后，在百忙中，还问起了这件事，问卫士交了钱没有？当总理知道服务员不肯收时，指示卫士一定要按价把钱和粮票送到天津去。于是，工作人员便托人给天津招待所送去一封信和一元一角二分钱、一斤六两粮票。

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吃饭都是照价如数付钱。有一次饭店少算了一份小菜的钱，总理发现了，马上让秘书去补上。

1973 年 9 月，周总理陪法国总理蓬皮杜访问杭州。16 日中午，总理同随行人员到楼外楼饭店吃便餐。饭店职工非常高兴，除准备了西湖醋鱼等名菜外，还端上了总理喜欢吃的绍兴霉干菜、豆芽菜等家常便菜。饭后，省里的同志说：“这顿饭，由地方报销。”总理知道了，坚决不同意，饭店同志知道不收费总理不会同意，便收了 10 元钱。总理当即说：“10 无钱怎么够，要收足。”饭店同志商量后，又加收了 5 元钱。不料，总理仍说：“不够的，要同一般顾客一样收。”这样，饭店同志只好又收了 5 元钱。谁知，一小时后，笕桥机场忽然打来电话，让他们去取总理走时留下的 10 元钱饭费。

楼外楼饭店的同志，拿回这 10 元钱，心情激动万分，他们认真地核算了这顿饭，总共只需 19 元多一点，可总理整整留下了 30 元。于是，饭店同志把饭菜清单写好，并给总理写了个详细核算报告，连同多余的钱一起寄到总理办公室了。

公家的钱怎能随便借

50 年代，有一次总理的亲属从外地来京探望总理， 在返回时，卫士长向国务院机关财务科借钱买了车票。总理问卫士长车票是怎么买的？卫士长说是从机关财务科借钱买的。总理对卫士长说：公家的钱怎么可以随便借！职工有了困难怎么办？卫士长向总理解释说：职工有困难可以向机关的互助会借钱，财务科每月向每个职工扣一元钱，一年共扣十二元，作为职工的互助金，临时有困难都可以去惜。总理听了卫士长的解释之后说：噢！机关职工还有互助会，这个办法好！于是，总理也报名，一次交了 12 元钱，便加入了国务院机关职工的互助会。

世界上少有的清廉总理

1964 年初秋，蜜桔收获季节，外交部礼宾司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礼宾司以总理名义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桔。礼宾司在办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感到以国务院总理头衔送欠亲切，便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很快得到总理办公室答复：总理同意礼宾司的意见，并交代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听了这话，礼宾司的同志愕然不知所措，脱口而

说：这要花总理多少钱呀！？当时礼宾司认为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还是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都应由公家报销，因此没有考虑费用问题。蜜桔本身不贵，但运费可观！总理的警卫秘书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 400 元，尽量省着些用吧！’礼宾司的同志心里很不平静：我们出的主意给总理添了麻烦了，周总理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的总理，公与私的界限是那样的分明。后来，礼宾司的同志找了几个同志商量，既要按总理的指示不花公家钱，又要千方百计节省总理仅有的 400 元。人多主意多，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托便人带。这样省却了昂贵的运费。事情办得相当顺利，王后接到礼物后非常感激。

严于律己　不居功不自傲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作风之一。它是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锐利武器。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正是党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表现。

周总理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的品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他从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从不隐瞒，敢于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即使很小的失误和不足，也不放过，勇于承担责任。而他对自己为党为人民建立的伟大功勋，却表现出真诚的谦虚，从不愿突出自己宣扬自己。

这是我的过错

大家知道，周总理批阅文件，从来是句斟字酌，连一个错标点都不放过的。但偶尔也有疏忽的时候，他批发的一个文件，后来证明搞错了，他便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条于，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一日三复，提醒自己。

1954 年 9 月，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原约好了时间送给胡乔木，但由于材料原因，延误了时间。为此，总理专门给胡乔木同志写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我很不安。原想由我先将各方面初稿汇集改好后再送你修改，不料忙了两周，竟不能终篇，而且延误了时间，给你造成极大困难，这是我的工作方法上的错误，严格说，也是思想上的错误。 ”

亚非会议之后，周总理在北京举行酒会，招待有关国家的驻华使节。酒会准备得过于简单，几碟糖果、炸土豆片和花生米。总理不甚满意。散会后，“ 总理没有责备工作人员，而是说：“ 这事怨我布置得不细，首先由我负责。”

作为总理我是有责任的

1953 年，我国经济建设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全国职工群众劳动热情高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生产发展很快，全国工业劳动生产率有相当大的提高，但几年来职工工资增长却比较缓慢，部分职工的实际工资还有所下降。

1955 年下半年，周总理多次听取国家计委、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等有关部门关于工资问题的汇报。他在全面了解情况后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预计都将超额完成。唯独工资计划完不成；五年计划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工资计划完不成将失信于民。所以，总理责成劳动部会同全国总工会及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工资改革方案。

1956 年 3 月 4 日，周总理在国务院各部委召开的 21 个专业会议、 3100 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作了国内外形势报告。他一开始就说，我今天是来负荆请罪的。这句话使到会同志感到意外和震动，不理解总理为什么要这么说。总理接着说，生产发展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而职工工资没有相应增加甚至下降，作为总理我是有责任的。到会同志这才理解他的话的含义，都为总理这种对人民极端负责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深深感动。许多同志觉得由于自己

工作没有做好，而让总理来承担责任，很是内疚。

从 1955 年底到 1956 年初，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中，我国经济建设出现急躁冒进倾向。 1956 年二、三月间，周总理就感觉到了，到 5 月明确提出了要反对急躁冒进。到 1958 年，他受到了批评与指责，并做了检查。后来，发生了“大跃进”，导致了三年经济困难。对于“大跃进”问题，周总理仍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作为中央的领导成员，他承担了责任。在 1962 年 2 月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总理讲话中，郑重地对自己在 1959 年 8 月 26 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调整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中，错误地、片面地规定工农业每年增产跃进的速度问题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这是我的账，要交代。

在“大跃进”高潮期间，许多同志感到有些做法有问题，但不敢公开提出不同意见，只是在背后议论。1962 年七千人大会后，允许大家提意见、谈看法了，不少同志对煤炭部的领导提出许多批评，甚至有许多不满的言论和埋怨情绪。在煤炭系统内部领导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也有了分歧意见，周总理为了维护煤炭工业部门领导之间的团结，主动承担责任。他在 1963 年煤炭工业干部会议上十分严肃他说，煤炭工业出现的问题，要说责任，我也有责任。他勉励大家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战胜困难，为尽快恢复和发展煤炭生产，保证国民经济的需要，竭尽全力。

1973 年 3 月 8 日，在招待外国女专家的茶话会上，周总理出席讲话，走遍 60 张桌子，向在“文革”动乱中受委屈的一些外国朋友赔礼道歉。他代人受过，做自我批评，只管说自己工作没作好，把责任完全拉在自己身上。周总理情恳意切的话语，使很多外国朋友感叹不已。

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

1961 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上海和白杨等同志谈话时，有一位同志热情他说：“总理，您给我们写一本书吧！”总理笑了笑很爽快他说：“如果我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的错误。”又风趣他说：“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要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总理这番话，使在场的文艺工作者，无不为之感动。

1965 年元旦下午，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了文艺界的同志们。在座谈中，有位同志谈到想请总理看看话剧《八一风暴》时，总理却微笑着反问：“听说那个戏还涉及到我？你们为什么不写我的错误呢？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嘛！”“我那次领导失败了，你又不批评我，我就不看。”

1957 年 12 月和 1963 年 1 月，周总理先后两次到上海同参加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和先进生产者座谈。每当回忆到当时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使我党和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遭到重大损失时，尽管事隔多年，他还是感到内疚，认为政治错误属于领导者。

不准把自己的故居作为纪念馆

周总理一生为人民的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受到了广大人民的衷心爱戴。各有关省市都想把总理出生的地方和过去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办成纪念

馆，以便对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但是周总理始终坚决不同意。

早在 1953 年，周总理听说江苏省淮安县要给他的旧居进行修缮，准备建一个纪念馆。周总理就让一位送他婶母回家的同志转告当地组织，对他家的老屋，有坏的地方可以修理一下，不能建纪念馆，如果当地要办医院、托儿所等公共福利事业，就把那些老屋和院子让出来给公家。1958 年 6 月 29 日周总理在给淮安县委的亲笔信中说：“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如再有人问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信中还特别强调说：“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1958 年和 1960 年，周总理在两次接见到北京的淮安县委负责同志时，仍一再交待说：“要把我住过的房子拆掉，不能和毛主席的旧居比。”邓颖超也曾专门找县委负责同志，郑重而诚恳地进行劝说。为了这件事，淮安县委专门作了研究，并向江苏省委作了报告，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爱戴，一直没有拆迁周总理的故居。 1973 年 11 月至 12 月间，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四次扫电话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保留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就行了

周总理在延安时住过的窑洞，就在毛主席的旧居旁边，本来已经开放展出，他知道后，不让开放，只好又关闭了。有一次，周总理陪外宾到延安。外宾提出来要去看看周总理的旧居，周总理不去。

1958 年，周总理到岗南水库工地视察，知道水库蓄水量大要淹没西柏坡村时，他说：“毛主席在西柏坡村住过，在这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一定要把毛主席住过的地方迁移好。”当时有的同志提出，还有周总理住过的地方。周总理当即指示，“把毛主席住过的地方保留好就行了，这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好阵地。我住的地方不要保留。”并对河北省委负责同志说，你们负责监督。

你们演我，我就不看

总理是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曾多次准备用纪录片、故事片等形式反映和歌颂这光辉史绩，但都由于总理不同意而一次又一次地取消了摄制计划。 1959 年，军事博物馆正式展出之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得知总理要去审查，便提前赶到现场，在红军馆陈列“八一”南昌起义展品的地方，布置好灯光，架起了机器，准备为总理拍摄一组镜头。当讲解员介绍红军馆序言部分，提到“八一”南昌起义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举行的时候，总理立刻打断说：“怎么是我领导的呢？是党派我去的嘛，是党领导的嘛！”他严肃地要求把解说词改正过来。接着，就越过南昌起义部分，去看后面的陈列了。八一厂的同志只好失望地收起摄影机。

也是这一年，江西省话剧团来京演出大型话剧《八一风暴》。八一制片厂的同志和剧组商量把它改编成故事影片，多次请总理来审查演出，希望对

如何拍摄电影作出指示。可是总理说：“你们演我，我就不看。”八一厂的同志又失望了。

不要突出宣传我

1961年庐山会议后，周总理下山住在南昌江滨招待所。9月18日在江西省委方志纯的陪同下参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参观时，周总理十分严肃地指出，不要突出宣传我。“八一起义”是党中央决定的。首先是中央决定的正确。“八一起义”是我和朱老总、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共同组织领导的。周总理的这种谦虚精神是一贯的。早在1957年，他在审定《八一起义》提纲时，有一段话的原文是：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决定由周恩来在南昌举行起义。周总理在“举行起义”前加上了：“以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部分为基础”。提纲中还有一段话，原文为：“7月31日晚上……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周总理在“周恩来”三字后面加上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的名字。这些改动，体现了周总理是多么的谦虚和实事求是！

周总理十分关心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拍摄工作，从创作到拍摄，他都亲自过问、审定。总理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在选材和节目的安排上，他力求突出歌颂毛主席。影片开拍前，总理在他特地召开的摄制组会议上曾作了明确指示：“影片一定要突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要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的光辉思想生动地显示出来。”对于其他中央领导的革命业绩，总理也都做了细致周到地安排和表现，可是，他对自己的革命功绩，却不准在影片中表现。有一次，陈毅对总理说：“你这个总导演太‘霸道’了，其他领导同志的事迹你都表现了，唯独你自己的事一点也没有，提意见你还不听！”总理听了只是爽朗地笑了笑，又一次地拒绝了重复提了多少次的这条意见。

少拍我，多拍拍其他人的镜头

周总理到工厂、农村和部队视察工作时，总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随从摄影记者：“少拍我，多拍其他领导同志，多拍人民群众！”有时在拍总理时，他就向记者摆手势，并指向群众。他的意思是：少拍他，多拍群众。有一次，总理接见少数民族青年代表，记者把镜头对准总理，总理说：“照像不要照我，要照少数民族同志，要照其他同志。”

1966年4月29日，周总理陪同外宾去河北遵化县西铺大队参观访问，在陪外宾同王生一家和影时，摄影师的镜头只对着中间照，照完后，总理问他照全了没有，他说照全了。总理说：“你的镜头没有转，你没有照到两旁的群众，你没有群众观点。”这一年的“五一”节，周总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见到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又一次批评记者：“这两天的照片怎么都拍我们几个人？不拍群众？”然后说：“今天你要多拍群众，多拍外宾，还要多拍宋庆龄副主席的活动。今天是考验你。”

1958年7月7日，周总理在广东省新会县参观下放干部的猪场时，摄影记者把镜头对着总理，总理笑着对记者说：“不要老是照我嘛，要有群众观

点，给大家照照嘛。”

我的像不应超过他们

1955 年，周总理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以后回到广州，参观了农民讲习所旧址。他对每件展品都仔细地观看，并亲笔题了“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十六个大字。总理指示整个展出应当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恳切地告诉大家不要过多地宣传他自己。后来，邓颖超参观农讲所时，发现纪念馆内周总理的像比别的教员的像大一些，就向总理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总理委托邓颖超转告农讲所的同志，把他的像放成同别的教员的像一样大。总理说：“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的像不应当超过他们。”

1969 年，周总理审查在国外举办农业展览时，看到有他自己的一张照片，立即指示拿下来，当时陪同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都表示不同意，总理不好再坚持。但是第二大又派邓颖超专程来农展馆，传达总理的指示。邓颖超同志说：“一定要把周总理的照片拿下来，要重点突出毛主席，如果你们要坚持，我就没法完成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了。”

遵守纪律　严格保守机密

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关系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周总理历来重视保密工作，他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一直重视保密工作。他说，机密事情对自己的爱人、警卫人员也不能说。总理完全实践了他的话。邓颖超同志说：周恩来同志是我在党内几十年政治生活中，亲眼看到的一个始终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是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担任了国家总理，仍然是遵守党的纪律，严格保守党和国家机密的典范。

严守机密，妻子、儿女都不能讲

刘西尧同志说：我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是有一定风险的。万一不成功，将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一方面准备了两发弹，第一次不成，再来第二次。同时绝对保密，在没有试成前，不让外国知道。在去核试验场之前，周总理把张爱萍和刘西尧同志找去，嘱咐说：“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同试验直接有关的人员外，一律不能让其他人员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总理接着说：“邓大姐是我的妻子，党中央委员，因为她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张爱萍同志把周总理的话向全体参试人员原原本本地作了传达，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因而那次试验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无一泄密事件。

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同志说：建国以后，我们的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处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任务更加重大了。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更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神圣责任。恩来同志知道的党和国家的秘密多得很。我们之间仍是信守纪律，他不讲，我不问；我不讲，他也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是很多的。例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时，他也向我保密。这件事是我最近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访问材料时才知道的。

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他的办公室，他的文件保管，都订有极为严格的制度。他身边的秘书凡分工联系那方面工作的，就看那方面的文件，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而对他们分工范围内的事情，则充分提供条件让他们熟悉业务。即使秘书分工范围内的事项，属于特别机密的，也要等到必须经办时才告诉有关人员。秘书们都说他是纹风不透。凡是写给他的亲启信，按照规定，别人都不能拆。秘书在经手时不慎误拆了，必须立即封好，并在信封上加以说明，是失手误拆，以后注意。恩来同志的办公室，是他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地方。除有关人员外，别人都不得人内，亲属、朋友如果不是来谈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只有当他出国时，两把钥匙才交给我保管。我象接受保密任务似的把钥匙珍藏起来。有次他走得匆忙了，直到飞机场上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他就封在信封里让一个同志带给我。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接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把钥匙还给他。

在十年动乱中，坏，被践踏得几乎无密可保。有一次恩来同志出去开会，因为会一个接着一个，一天一夜没回来。听说街上的大字报和所传的小道消息里，已经透露了有关会议的内容，我有点怀疑，等他回来，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马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他还如此认真地向我追问。我就开玩笑他说：你参加会议，你有你的渠道，我有我的渠道，我联系群众，我也有我的“义务情报员”哩。此事，我们俩就在一笑中过去了。在那个时候，人们都说，现在还有什么机密啊？可是恩来同志仍然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

现在，我们已经踏上新长征的道路，这条道路也不是平坦的。各种各样的炮弹还会袭击我们。我们仍得警惕啊！我们更需要恢复和端正我们的党风，加强我们党的纪律性，特别是认真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制度。我对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的简介，想来对同志们不无裨益。

鞠躬尽瘁无私奉献一生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他必须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图安逸、无私奉献，忘我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操劳工作的人。

周总理早在 1946 年说过：“ 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 ”，“ 应该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20 年后的 1966 年，周总理又说：“ 一个人应该不怕死。如果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同敌人拚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工作，拚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

周总理的一生，彻底实践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彻底实践了他自己经常讲的话。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不论任何情况：黑天深夜，风沙雪雨，困难险阻，年高体弱，病魔缠身，他都在利用每时每刻不停地工作着！奋斗着！用自己的每一个实际行动，谱写着他的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献出了毕生精力，为我们树立起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民公仆形象。

不灭的灯光

周总理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操劳着，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黎明。

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里不灭的灯光，已是家喻户晓的事迹，周总理没有假日，他的工作日程是以分秒来计算的。他经常通霄达旦，甚至昼夜不眠，沉浸在习惯性的忘我的工作中，他常常是在经过一个下午的紧张工作之后，稍事休息，又从晚间八点多钟开始投人工作：或召集会议，或批阅文件，或研究问题，一般都要到第二天大亮之后才休息，有的时候，竟一直延长到中午，连续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之久。这样，他就只能睡三个多小时，下午不到三点钟，又得起床准备出席会议、作报告或接见外宾。在那长达十七、八个小时的连续操劳中，总理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超越常人，有的华侨赞扬总理是“ 钢人 ”。

在北京如此，到外地视察工作、陪外宾参观访问时， 在宾馆、在旅途中，同样是灯光伴随着总理，从夜晚到黎明，不分昼夜地工作着。

1961 年 4 月底至 5 月中旬，总理带领工作组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进行蹲点调查。他白天进行调查，晚上处理公文。这是 5 月 7 日的一天工作日程记录：

晨二时	与汉夫就老挝问题通电话
三时	向主席作口头报告
上午十时	与许明、马列谈食堂菜地问题
十二时	出发涉县
下午三时	到涉县县委谈话
三时四十分	与堰头干部、社员谈话
六时	参观食堂
七时五十分	始返

古稀之年倍辛劳

1966 年 3 月邢台地区两次发生地震，周总理先后三次亲临震区视察。4 月 1 日那大，刮起了六、七级大风，总理视察了宁晋和巨鹿两个县的重灾社队。这一天，总理从早晨五点钟，直到晚上九时，整整 16 个小时没有休息。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讲话，又开座谈会，又到各家慰问，他的腿跑累了，嗓子也哑了，饭也顾不上吃一口。

在我们党和国家遭到危难的年代里，即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尽管处境十分困难，以古稀之年，更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重担。他从黎明到傍晚，从夜晚到凌晨，一批又一批地接见群众，一次又一次地找领导干部谈话。有一位外地负责同志回忆说：

有一天夜里十一点钟，我们去人民大会堂向总理汇报工作。到达时，总理正在听取另一个部门的汇报，他的秘书告诉我们暂回招待所等候通知。由于那个部门的问题极为重要，从下午四时一直到深夜二时才结束。这时，我们得到通知去福建厅见总理。当我们走进福建厅时，总理正坐在沙发上闭目打盹。我们不想打扰总理的休息，可总理睁开眼睛，示意要我们坐下。我们不忍心让总理继续谈下去，便说：“总理，你太劳累了，改时间来谈吧？”总理说：“哪能行呀，工作多啊！怎么能休息呢！好，谈吧！”谈完后，总理交代我们上午九时再到他家里研究。然后，总理又开另外一个会议去了。上午九时，我们准时到了总理家里，总理又仔细听了我们的意见。这时，总理看了一下表，说：“现在刚好是十一点半，休息半小时，吃点饭，我们再谈。”半小时后又交谈，直到下午三时，把事情定下来了。离开时，我们计算了一下，从昨天下午四时到现在的三点多将近二十四个小时的紧张工作中，总理只打了一会盹，中午只休息了半小时。按照总理的工作习惯，再过几分钟（到下午四时），他新的一大的战斗就又开始了。

“文革”期间，象这样的事例，简直是举不胜举。

1972 年，敬爱的周总理不幸得了癌症。病魔侵袭着他的肌体，但是，并没有夺去他那颗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疾病作斗争，在严重的疾病面前，实践着他曾说过的“我多活一大，就能力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的话。

请看他 1974 年 3 月 26 日这一大的工作记录：

下午三时	起床
下午四时	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七时	陪餐
晚十时	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半	约民航局同志开会
晨七时	在七号办公
中午十二时	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和工后
下午二时	休息

整整连续工作了 23 个小时！当时他己是七十六岁高龄的老人，而且已经是癌症缠身！

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

1974 年四、五月间，周总理由于病情太严重了，曾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有一次，他连续工作了三个昼夜，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他累得犯了病，就站着用椅背顶住腹部，继续听工作汇报。同志们请他坐下，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在这种情况下，他同意住院做手术。但他在随时可能发生休克的情况下，仍坚持按原计划妥善办完了最后的公务。5 月 29 日，与马来西亚总理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 31 日，他又同马来西亚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之后，于 6 月 1 日他才住进医院动手术。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住在医院里，敬爱的周总理并没有静心治疗。他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不被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破坏；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这伙反革命集团篡夺，他继续战斗着。从 1974 年 6 月 1 日住进医院到 1976 年 1 月 8 日逝世，总理在医院动过六次大手术、八次小手术，平均 40 天就要做一次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仍然不停地找同志们谈话，接见外宾，参加会议，处理日常工作。据统计：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 161 次，同中央各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谈话 55 次，接见外宾 63 次，与陪同人员谈话 17 次，在医院召开会议 20 次，离开医院外出参加会议 21 次，找人谈话 7 次。

全国人民都不会忘记，就是在这个期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个庄严的讲坛上，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向全国人民响亮地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宏伟目标。

周总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是这样的一个“钢人”、“超越常人”的人，不论在健康的时候，不论在病中的时候，也不论是在多次手术、病魔严重威胁生命的时候，他都坚持不懈地工作着，工作着，为人民的利益，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工作着，直到最后一息！

编后

本书材料主要编选自：《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1—3 辑（人民出版社）、《人民的好总理》上中下册（人民出版社资料组）、《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国防工业出版社）、《财贸战线纪念周总理文集》（中国财贸经济出版社）、《春风化雨》（春风文艺出版社）、《人民的好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周总理的故事》（天津人民出版社）、《周总理的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周恩来》（山东人民出版社）、（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等书，以及近几年部分报刊杂志刊登的回忆周总理的文章。对这些出版部门和有关文章的作者表示衷心地感谢！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关怀和支持。李先念主席在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中央机关的有关同志和解放军出版社的编辑，对本书内容进行了认真地审核考证和编辑加工。中国革命博物馆、新华社照片档案馆的同志提供了有关照片。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有不足和失当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九一年五月